

李润湖作品选

方修主编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馬華文學六十年集

李潤湖作品選

方修編



1980·5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李润湖作品选
方 修編

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出版
81,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63-C, Jalan Sultan, K. L. Malaysia.

东艺印务公司承印

1980年5月第1版，订价 S\$5.5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ISBN = 9971 - 906 - 02 - 3

前言

方修

(一)

战前的马华文学作者，有相当大的一部份，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多，完全是靠着恒心与毅力，刻苦自学成功的。李润湖便是其中的一个典范。由于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学习，他不但奠下了坚实的中文基础，同时也具有很好的英文程度；不但有了深湛的文学和史学的修养，而且取得广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此外，由于当过一个时期的律师馆书记，他又吸取了丰富的法律常识，写起有关法律问题的文章来也都头头是道。最重要的是，他虽然全靠个人的摸索而跨进本地的文艺界，但他没有摸错门径，没有坠入邪魔外道，他走的一直是一条正确的文学和人生的道路。

李润湖，或署陈建、林曼、华尼、英英、建汾、邓匡君、柳红玉、陆幼琴、梅颂明、文淑娟、庞曼坚、江上三郎、欧阳寒吟、尉迟华非、陈玉琼、严韦蒙、宋千金……等。原籍广东潮安，一九三四年前后出现于本地文坛，在南洋商报的「狮声」（李铁民编）、「展望台」各版撰写散文，如「峇六甲桥之夜」、「趋热记」、「苦也斋随笔」等。一九三五年以后，投稿园地扩及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星中日报的「星火」、以及檳城光华日报的「檳风」。所作多为杂文及短论，间也有少数小说创作，如「王

昭君出塞」等。一九三六年初，因发表「南国文坛报屑」、「关于几个副刊」等报导文字，与「狮声」编者李紫凤及其周围的一批作者发生论争，一般认为是空前剧烈的一场笔墨官司。同年年底，进新国民日报工作，先后主编「新路」、「新光」等副刊，除了大力提拔新进作者之外，写作仍甚勤快。杂文如「洋货和国粹」、「世界大同」、「日本的搬场艺术」、「东京军部的欺世狂言」；论文或资料性文字如「马来亚文学的正路」、「文学口号问题评议」、「一九三六年的马来亚文坛」、「一年来副刊编务检讨」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品。其后，「新光」改为「新园地」，编者易人，润湖调编国际新闻版，写作时间少了，但不时仍有若干作品见于「文艺」（新国民）、「狮声」（楚琨编）、「南洋周刊」……等刊物，如「退化的危机」、「批评与打倒」、「新启蒙运动的主题及其前途」等。

战后，润湖继续在报界服务，先后担任了多家报社的外勤记者，采访法庭或政府部门新闻，也用严韦蒙、烟波（？）等笔名撰写有关法律或经济问题的论文。最后以宋千金（宋迁金）署名写的杂文，每篇五七百字，针砭时弊，泼辣锋利，尤为各界注目。

润湖于一九四八年初病逝星洲，年仅卅余岁。当时由本地文化界人士联合主持丧事，料理善后，并出版特刊纪念，誉为「新加坡文化斗士」。出殡之日，执紼者空前热烈，备极哀荣。

（二）

就李润湖在文化岗位上的表现而论，「文化斗士」这个称誉，他的确是可以受之而无愧的。我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给他这么一个光荣的称号，此人对于润湖的生平显然知之甚深，不是一知半解者随便套个成语来加以褒扬的。我相信这至少是从三个方面来看润湖一生的业绩，然后得出这么一个总结性的评语。

首先是新闻工作方面。新闻工作是润湖生前主要的活动部门。他在战前已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为本地的正义事业而奋斗不懈。挨过了惨无天日的三年八个月之后，他依然选择新闻记者为职业，尽其「民众喉舌」的天责。虽然有个短时期一度想投笔从商，经营影片生意，但结果仍旧安于原先的岗位，以新闻工作者的清苦生涯终其身。更值得一提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不以在大报馆打工为荣，不为个人的「钱途」而见利忘义，而是以是否符合自己的旨趣为去就的标准。因此，他所服务过的报社，有大规模的，也有中小型的，但都能够让他很好地发挥才能，作出贡献。

其次是副刊编务方面。李润湖战前主持「新路」、「新光」、「现代妇女」……等副刊，内容严肃，精神健旺，培养新进作者，尤其不遗余力。他自己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编半版小小的副刊，其艰辛的滋味，决非局外人想象得到的」。由此可以见出他对于工作的认真。这些工作，对于当时当地救亡运动的推进、健康文艺的发展，都有莫大的帮助。又据熟悉文坛掌故的人士透露，润湖主编的副刊之经常易名，如「新路」改为「新光」、「新光」改为「新园地」、其间都有一段曲折。主要是这些副刊登载的稿件，比较敢怒敢言，常常因此开罪一些社会闻人，引起了麻烦。记得导致「新光」改名的原因，是一篇叫做「一元三味」的杂文。该文讽刺某些侨领，出了一块钱的救国捐，却要捞回三笔本钱：爱国、慈善、慷慨的美名。较早的「新路」的改名，情形也复相仿，但有关稿件则是一首短诗。

再次是文艺写作方面。这是更重要的一面。虽然由于他所涉猎的知识门类比较广泛，以致在文艺写作方面可能不太精纯，但他的「斗士」的形象却是显得更完整、更突出。他的写作的目的性很是鲜明，他不乱写、不滥写，不无病呻吟，不无的放矢。早

在他开始其文学生活、投稿「狮声」、「展望台」等副刊、文字还不见得成熟的时候，他的作品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战斗倾向。例如，他笔下的「峇六甲桥之夜」，里面并没有什么幽雅的桨声灯影、月色波光，而是舟子、苦力、小贩等等，到来寻找一天操劳之后的休息；是二位讲古先生在搬着板条和草席，等候听客的光临，预备赚取明天的三餐。作者指出：在「贫与富划成一道鸿沟的社会，富者消遣的地方特别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什么什么俱乐部，兴之所至就可如愿以偿」；而「贫者只可望高墙而兴叹」，只有陆陆续续来到这河边消解劳累，「忧暗的面庞挂着一丝笑纹，显示他们得着闲憩的欣慰」。这里可以看出，润湖是一开头就不把文艺当作消遣品的。

随着他的思想和文字的成熟，他的作品的战斗的气氛就渐趋浓郁。他的「南国文坛报屑」、「关于几个副刊」等文章的引起剧烈的论争，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那一年，正是马华新文学的繁盛时期即将到来，而低潮时期尚未完全过去的新旧现象交替之际，有不少的报章副刊已经渐形积极，但也有若干刊物始终抱残守缺，死气沉沉。如此情形，一般曾经沧桑、老于世故的作者，可能会见怪不怪，习以为常。那些安于现状、一味抗拒新生事物的文士，更可能认为这种冷肃的景象倒是恰到好处，正合孤意。然而这个时候刚刚走进文坛，朝气蓬勃、正想为马华文学献出一点力量的李润湖，可就有点看不惯，希望有所改进了。于是他为文呼吁：「报纸的副刊，为报纸本身计，或为社会文化着想，无论怎样，最低限度在环境许可下，总需要保持严肃的态度，登载一些有点社会价值的文字，给大众一些有益的感觉」；「我们极端赞成一个报纸的副刊，有一个主张，以免象野马乱跑，常常打自己的嘴巴……。」这话自然有「狮声」的影子在内，主要却是泛论一般，并非完全针对「狮声」而发，但李紫凤

把「狮声」编得十分芜杂，漫无中心，几乎成了当时一般落后的报章副刊的代表，看了这类批评，难免会认为有损尊严，面子过不去，一怒之下，也就调兵遣将，对这个文坛的后生小子发动大围攻了。这是安于现状与要求进步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李紫凤说润湖「挟私憾以骂人」，固然是有意的诬蔑；李润湖怀疑某些人「想以笔战起家」，其实也是不尽然的。

马华救亡运动期间，李润湖的视野更开阔了，文章的战斗性进一步提高了。他斥责侵略者的野蛮与暴虐，揭露无耻汉奸的无赖丑态，嘲笑本地日文报章「南洋日日新闻」的搬场艺术，戮穿东京日本军部所谓「重行建造中国」的欺世狂言……，真个是弹无虚发，每一篇短文都是扎实有力的一击。

润湖不仅在创作上始终重视文学的社会战斗作用，他也不时写些文艺论文，直接地向文艺同好强调这一意义。例如，在「陈炼青的论创作」一文中，他说：「我们不是机械的极端主义者，要用某种固定的题材来限制作家写作的范围。创作的自由是需要尊重的。但这自由有着存在的条件和要素；不然，做皇帝世家赞、颂扬战争的文豪们，不是也可在这自由名义下，逃避群众的裁判么？文艺创作的自由，是建筑在生活的斗争和正确的世界观的统一上。现阶段文艺作家的世界观应该是拥护人类和平、反抗法西斯蒂战争。」

又如，在一九三九年的「新年试笔」中，他呼吁文艺作者投入大时代的洪炉，锻炼出「千百个新的荷马、新的普希金」；呼吁大家以新的战斗来纪念这新岁序，努力催促新的时代更快来临。同时，又提出写作人的气节问题：「在动乱的大时代里，人，都应该要有气节的。有了不屈不挠、富贵不能淫的气节，然后方能在大时代洪炉里锻炼，成为一块不怕冰霜压迫的钢铁」，「气节是每个文艺家的精神，有了这精神，然后才能战斗，不然，见利

忘义，才能怎样好又有什么用呢」，「张资平现在跑到东京军部指挥刀下的王道乐土去做官儿，正是好例证」。

润湖从事文艺写作，立场一贯、言行一致。战后初期以宋千金的笔名撰写杂文，批评当时许多不满人意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不惜面对又一系列的笔墨官司，可以说是他的「斗士」精神的持续。他所批评的现象，就当时一般副刊谈论所及的范围而言，算是比较重要的，而地方上的保守意识又坚固如旧，因此那时候引起的论争，战火之烈，比起昔年的「关于几个副刊」的一役来，似也未见稍逊。

总之，李润湖在本地的文化阵地上，可谓战斗终生。说他是文化斗士，看来并不为过。

(三)

润湖逝世后，星华文艺协会一度公开登报广泛征求其遗稿，准备进行整理，出版纪念文集。后来时移世变，纪念文集不但没有出成，连搜集到的遗稿似乎也没有了下落。听说他的遗属本来也曾保存一部份稿件，但最后终于也都散失了。本书所辑录的，祇限于一九三九年以前发表于南洋、星中、星洲、新国民各报副刊上的一小批作品；较后期的更精采的文章，一篇也无法找到，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卅日)

目次

前言.....	方修.....	1
---------	---------	---

第一辑

「趋热」记.....	3
峇六甲桥之夜.....	7
伤雁先生小史.....	9
阿娥和伊的表妹.....	12
慧.....	16
悲秋.....	19
拿镜自照.....	21
新年试笔.....	23

第二辑

「读者会」之又一建议.....	27
〔附录〕促进南洋读者会的建立（姚寄鸿）.....	29
「九一八」五周年.....	33
身边琐事.....	34
马来亚文学的正路.....	36
马来亚文学的特质.....	42

悼鲁迅先生	44
写稿和投稿	46
一段悲剧	51
南洋文艺界与批评	53
「洋货」和「国粹」	55
怪事	57
世界大同	59
题外的话	61
论「可以前进」	63
陈炼青的论创作	66
「今代妇女」发刊词	70
日本的搬场艺术	72
东京军部的欺世狂言	75
无赖	77
「新光」编后	78
〔附录〕给别客君（文翔）	79
答文翔君（别客）	81
文学口号问题评议	83
新启蒙运动的主题及其前途	89
退化的危机	93
批评与打倒	95

第三辑

一九三六年的马来亚文坛	101
我的话	138
〔附录〕读「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坛」（汇东）	139
一年来副刊编务检讨	142

第一辑



「趨熱」記

据说华人是最善「趋热」的。不论那里有些骚动，猫亦来狗亦来猪哥牛弟亦来，大家围在一起，瞪眼相顾；若问他们在看什么，大家都觉茫然不知所答。记得在一个晚上，行经某路，见一大群人围得团团圆，大家你看我我看他，究其实里面不过一老妇在牵挽一啼哭着的小孩，但大家却以为那是一幕「夫妻相骂」的「趣剧」，不看，死难瞑目。忽然一顽皮朋友高喊「马打」来了，大家即一哄而散；那里依然老妇在发气，小孩子在撒野，「马打」却不见来。再如偶然听到救火车当当的奔驰过去，大家都不察那是救火局长电召练操，或真的何处发生火警，都匆匆的尾随，有的还花数占搭上电车或坐脚踏车直追（！），各抱着观「火」是顶好的玩意儿的「盛意」！

最使我们痛心的，就是每当市政局勒令警察车出来围捕小贩，大家亦「照例」的环立争视，「如蚁附膻」！

昨天据说是什麼「九皇爷」圣诞，后港居民自数天前就闹着搬戏庆祝的怪剧，昨晚是最后一晚了，热闹当然是「格外」，既有钱又有锣鼓，亦有「土景」，「老爷」亦被抬出游，于是大家又得到一个「趋热」的机会。

昨晚独自一人坐在卧室里，苦闷，寂寞，无聊的情绪充占了心田。忽然朋友某君来寓，说后港是怎样热闹，「游人似鲫」，

「士女如云」，「一年一度」，错过这机会，就要等到明年方有「缘」欣赏。言下真有「良宵不再」之概。经他「甜言」的诱惑，再三的敦促，动了好奇的心，终于披起外衣同他去「趋热」。

电车里的搭客，可以一句「水泄不通」来形容。甲腹挤乙背，乙腹又挤丙背……大演「三挤」活剧，大家一身汗油油，呼吸有些困难。电灯光，热，汗，气喘，打成一片。

但大家都抱「趋热」的「诚」，没有半声愤怒。在途中当车将行至红柱的电车站，因见那里有大群人在举手要求电车停止，大家不约而同的争挽催行钟，并高喊Go head！怂恿司机者不要停歇向前驶去。司机者因见「车无虚位」，如命直驶过去，大家以为「要求」成功，皆发胜利的大笑！

二十世纪的所谓文明社会，「万物之灵」的「人」，到底远不如「兽」类的一条狗，或家禽类的一只动物！山巴兄挑了一篮鸡或鹅鸭只多放三五只，来到「巴杀」或在道路上，就有「人道」的君子出来干涉，将之拘捕，置于「法律」的制裁下，其罪曰：「虐待牲畜」！但电车载二脚的「人」载得那么多，多到电下车弹弓受过度重量的压力，沙沙地和胶轮蜜吻着，却无「人道」的君子出来，「顾全人道计」仗义执言，说这样拥挤有碍人道、虐待人类！我们若果真的承认「人」亦是动物之类的话，则同一动物，「人兽之间」的待遇，就那么不平等，未免太滑稽！要摇首三叹息！

好容易的挤到了目的地——后港，下了车，觉得格外凉爽。我和他二人无目的地东混西穿。游人接踵而至，真的「士女如云」。

这里有男有女，老的小的，有穿纱郎的，有穿旗袍的，亦有红毛，亦有吉宁，总之新加坡各色人都有。江湖卖艺者，贩卖劣货者，饮品摊、熟食档，遍排各处，真的「万商云集」。

无数的人从这边挤过去，无数的人从那边挤过来，汽车又从中间昂然忽速忽缓的驶过，坐在车辆的，骄骄然喜傲之气溢于车厢之外。又有无数的货车，一车车载着老妇、女子、孩童，车上挂着五光十色精致的纸灯，在繁杂的人群中忽左忽右蹒跚的向一条树木苍鬱的道路驶去，目的据说要去参拜「九皇圣公」！道路的两旁又停放着很多汽车货车，坐在车里面的有「娘惹」，有穿旗袍头发蓬蓬的摩登少妇，手里执着粗大的焚着的香，据说她们在求「九皇爷」赐福，但不知「九皇爷」见了现代猛虎般的汽车会不会将「福」赐予？这等举动是何等可笑！货车上搭着竹棚布幕，在预备抗拒雨的「侵略」；满吊着纸灯，上面坐着一堆一堆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喜气洋洋等候「福」之降临，这又是怎样的可怜可笑？很多女孩子穿红戴绿提花灯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倒是一种神秘的举动。

一瞬间忽地里前面拥来一队人马，灯火辉煌，鼓乐喧天，万头拈动，有的说那是「九皇爷」圣驾来了，有的说是要去迎接「圣驾」的音乐队，一时人声鼎沸。但究实是一辆二吨货车，顶面装着一座纸城，电炬皎艳夺目，将数位小孩饰成一出什么戏，并将他们的手足加以困缚，使死坐在数枝假缀成为莲花、荷叶之类的铁柱上，以表示工巧！我认为这样的「活缚」，在人道上亦有些不该！

在距离某英文小学数十步的山坡上，一班鼓乐「浪铮浪铮」着，围着一大群人，里面雇了四位「烟屎」瘪三，在演着所谓「土景」的丑剧。「烟屎」瘪三不怕羞，装出「娇饶」的令人见之作呕的丑态，随着鼓乐的拍奏一捏一摆的「搬演」，围观的人亦不怕羞的环视着。四周数个乌皮吉宁头顶置着煤汽灯，照得他们的丑态毕呈，但又有兴都教徒大宝森节意味！

总言之，我们在那里所见到的是封建，迷信，时代的怪剧丑

态，无耻的表现！南侨文化的低落，这正是一个铁证！

我们混到八点半尚未见「九皇爷」尊驾出游，只见一班班鼓乐忽续忽断。问了某位老客，他说「九皇爷」须至十一时许才被抬出来「游街」。我们以为光阴可贵，种种「怪剧」也看得腻了。问一出税汽车，车夫说要「落坡」，我们就坐上去。一切的怪剧，和坐在路旁货车上「等福」的女人渐渐在车后消逝，但电车上「趋热」的人依然非常拥挤，道路上一阵一阵的人群向着后港接踵前进。他们大概亦是为着「趋热」而来的。这「趋热」在南侨社会中一年年的继续着，我觉得是很可悲的现象！除非南侨文化提高而使普遍化，这「趋热」定无一日或休！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稿

（载南洋商报副刊「狮声」）

峇六甲橋之夜

你将会搅起一种喧嚣的情绪，当薄暮黄昏电炬初明你行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所麇集的全是「下层社会」的劳动阶级。他们坐，踞，倚，立，或亲热的相偎着，或无意识的踱来踱去，统无秩序的，随心之所欲，任情之所至。有的高兴地唱唱几声俚歌，念念几句俗曲，音调粗陋，无拍奏，无抑扬，讲不到五音六律。有的谈着邻鸡近狗的屑事，口里含着纸烟，白烟缭绕，旋伴着笑谑的声浪在空气中消逝……

人类的情欲是无贫富的分别的。除了患着灾难的时候，一天劳苦，晚上谁亦晓得寻些消遣，以调剂操作疲惫的精神，不过有「高尚」「下流」之别罢了。但那班醉生梦死，以昼作夜，狂舞终宵的糊涂虫又应作别论。在贫与富划成一鸿沟的社会，富者消遣的地方特别多，只要兴之所至就可如愿以偿。俱乐部，戏院，游艺场，挂羊头卖狗肉的什么什么，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贫者只可「望高墙而兴叹」。但贫者会因不能到戏院，游艺场，上俱乐部，而能抑绝寻消遣的企望，静悄悄坐在屋里活活闷死么？不，他们寻求安慰的情欲亦和富的一样呀。

当太阳落山，地球上部份（东半球西半球的时刻不同）的活动渐转入静穆的境态，富者的汽车很匆忙的奔驰，寻求他们「消遣」的对象的时候，这里已有很多人鹄候夜的来临，找寻一

天操劳的安慰。舟子，苦力，卖零食的小贩，售烟枝的老妇，零乱的坐着，站着，歇着，排着，近桥的河岸，二位烟油满面的讲古先生在搬铺着板条，草席，预备等候听客惠临，十分劳烦而又盼切地；因为这一晚的入息就是他们明天黑白米粮的代价。

夜的黑幕展开了，桥的四端直立的铁柱上三百烛光的电灯明燃了，整天劳碌的他们渐渐地陆续地来这里集合攀谈，解解劳碌的辛苦，在晶莹清亮的电灯光下，个个面呈枯槁的神色，身体似很沉重疲乏的要移动着，显示他们的奔劳的艰苦；忧暗的面庞又似挂着一丝微微的苦笑纹，显示他们得着闲息的欣慰。十数个顽皮的小孩，在桥面的中央画了几个圆形或方形的白粉圈，跳跃着，追逐着，嘻嘻哈哈表现他们的天真，黄金时代的骄子，他们不知道这人间有悲哀，有罪恶！

讲古的冬烘先生燃着一盏烟灯，出力地使起嗓子，喊叱着：「今晚讲的是仁贵征东；花田错」，以作号召的广告。数十分钟后他的周围就站着穿著黑衣的人群，「洗耳恭听」着他精彩的演讲。讲到紧张处，他拿起一支烟吹指东击西，神采飞扬。

新加坡是东方的一个大都会，大都会里的夜生活是神秘的，繁杂的。我所写的这峇六甲桥之夜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代表一小小的角落的夜生活而已。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六日稿
(载南洋商报「展望台」)

傷雁先生小史

一九二九年春天某一清早，我悄悄地坐一辆人力车到距离星市区半英里许的一间小茅屋，怀着热烈而带几分惊疑的情绪，去探望这和我有四五月友谊的伤雁先生。因为前一天接到他一封写得十分草率的信，说他迁居那里。晓风冷冽，热烈惊疑之心怀又有数分寒意，下车后嘴里频频打着寒噤。行了几十步，望见一间矮小的茅屋，右边植着二三株芭蕉，后边一根挺着腰的栲栳树，晨风绿叶，娑娑作响，我近前察看它的门牌号正和他信里所说的符合，无疑的那就是伤雁先生的住屋了。门隙中我窥见里面一张四方桌上面安着一枝燃着的蜡烛，残光摇曳，将告灭息。敲了柴扉数下，他就来开门，让我进去。

「啊，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现在你尚在甜梦吗？」我似开他的玩笑说。「湖，别要再这样顽皮了，」他忧丧着脸打我一下臂说，「我这『伤雁』现在中了利箭了，我的生命或许不能维持！」他的声音忽趋沉重，感伤的成份十分浓重。我本知道他的迁居这里，一定是不妙，听了这二句话更使我忧惧起来，很温细的问他道：「你究竟为着何故才脱离C校，学生们不是很爱敬你吗？」「唉，小孩子的感情是纯洁的，诚挚的，我那样真心的教导他们，和羈地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塾师狰狞的鬼容，亦没有洋秀才的架子，在课室里是他们的教师，出课室外是他们的好朋

友，他们怎样不会爱戴我呢？但可恨……」他忽拉住话线，显现十分愤懑的神态。

「既不是学生们捣臭蛋，同事和你的感情亦十分和好，你为什么这样粹然脱离C校呢？」「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他的话音忽变成豪壮，凄鬱的面孔现出一丝的苦笑。接着他又说：「我之脱离C校全不关系学生或任何的同事。校长沅君的辞我，出乎不得已。他对我的离别万分伤心。因为他受了校董兼总理的某君之压迫和指使，不把我革退，他先得先尝失业的苦汁！在他接到某君命令的那晚，他气得连晚饭亦无心吃，来在我的卧室，商筹对付的方法。他愤慨地说：『这样的傀儡生活，我觉得十分可耻，我宁愿和你同时脱离，尝了失业的苦汁，不愿再作冯妇，做他们镇寨土地爷！』我装着笑容徐徐的告劝地道：『沅兄，你最好还是忍耐一下，现在商情凋零，华人经济日渐破产，要寻一吃饭的地方难如登天。我为环境所不许，先自离开，你在这里或许可给我一些帮助，另谋出路。』『唉，做个饿死鬼比较这样的僵尸不是更英雄吗？』『需要求饭于人如何说上起英雄二字呢？』他听我说得有理，就让我先离开了。但我现在移居这里，我觉得前途十分危险！」伤雁滔滔告诉我他离开C校经过情形。

「但你究竟和那校董兼总理的某君是为什么起冲突呢？」我又探问伤雁被某君指使革职的原委。「并不曾起什么冲突。不过听说他有一位在中学毕业的亲戚最近由中国南来，这或许就是他指使校长革退我的真因。他致校长的一封信亦不过套着官样文章妄加我以莫须有的罪状，十分荒谬的写着：『……据查教员方立坚（伤雁的正名——湖注）最近有越轨举动，某种进行的图谋更属显露。且在暗中企图推翻本校。予忝为本校董事兼现任总理，不忍本校为方某所摧残，使数百学子失学嬉游，貽社会以巨害，今为本校前途计，为学子学业计，仰请校长即时将方立坚革退，

否则校长亦难辞其咎矣。』唉，在这恶劣的社会，傍人门户的教书匠太可怜了！」

他念了某君的「告谕」发着牢骚。我听了他的话，亦是十分愤恨，但想不出什么话可来安慰他。啊，你这中了利箭之「伤雁」呀，不必愤恨吧，你有科学的头脑，丰富的新智识，在这黑暗团中讨生活终要受这样的气，还是奋发前进，另觅新生的坦途！

（展望台·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



阿娥和伊的表妹

一九三二年，正是「黄金窟」里冒着腥臭的黑烟的凶年，人们都被这黑烟压迫得颠颠倒倒，涕泪滂沱地。但少女的心灵是纯洁的，无知的。阿娥那时是个十四岁的女孩，具着纯洁的无知的少女的心，人间的辛楚与烦苦，似不曾袭击过她这圣洁的心。她借父亲的福荫，和她的表妹阿迁在某女英校六号班读书，很快乐的过着无愁的绮丽的学生生活。

她的表妹阿迁，年龄也和她不相上下，一对小妮子，怪亲匿的，随伴着。阿迁没有父亲的，自他死后，她就随着她的母亲来姨丈——阿娥的父亲——处居住。因为是至亲，意气很相投，都似自家人一样。阿娥的父亲陈××，是位老中医，颇有资产，很珍爱她们，每天都令车夫，驾他那半旧的汽车载她们上校。下午亦教车夫在校外，等候载她们归家。

陈老医生是很和蔼慈祥的，她们也觉得他是位仁慈的姨丈，顶好的父亲！在校里，她们常睁着眼斜着头，向同学们夸示她们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一位姨丈。一次她们的一位同学露茜——一位和她们年纪相若的混血种姑娘，蓬松的曲发掩抹着粗密的浓眉和深黑的眼眶，面上现着愁闷，看去似抱着甚么忧鬱的心怀似的，因话家庭细故，她们知道她今天早晨因在家里打碎了一只茶杯，给她父亲打了几下，现在她还觉得被打地方很痛，她还怨她

父亲是个凶暴的人！……她们听了露茜的话后，愈觉陈老医生是世界上顶好的人。勿说打碎茶杯，阿迁因戏要打坏一只花瓶，也都没事呢。从此以后，听到关于同学们父亲的闲话，她们感觉很兴趣，耸着耳朵，倾听着，相观而笑，欢形于色，有时更张着小嘴，点着头，表示一下骄傲。

一九三三年春，她们已考过了某女英校六号班的功课了，住在家里，辍学了。辍学的原因，是她们的母亲觉得她们都已成人了。「女子应该守规矩的，这样大的年纪，抛头露面，总是一件不体面的事」，她们的母亲都常这样说，叫她们坐在家里学女红。但她们辍学的真因，还是经济关系居大半。因为「黄金窟」的繁荣，都给那腥臭的黑烟吹散了，陈老医生的入息，日减一日，那辆破旧的汽车也已卖给人家拆做推销货物的轿车了。有时他竟在诊寓白坐了整天，也没有病人光顾。树胶落价，连人也不会生病吗？这在陈老医生是个谜似的难题，常盘绕他脑际。

腥臭的黑烟，吹散了「黄金窟」的繁荣，「无耻」的消化器官，唆使人干出「无耻」的勾当。这「无耻」或许是先圣的经书不能解救的。陈老医生先前曾做过塾师，对先圣的经书，纵使不如西南要人那么「瞭如指掌」，但总有一知半解之明，「道德」「四维」常不离嘴，而现在竟想干出这「无耻」的勾当来，真能够使人大叹「世风浇漓呢」。自「树胶无价，连人也不会生病」以来，他的经济就渐渐发生恐慌了，那么大的家庭负担，他觉得年老不能维持，终日深锁在卧室中徘徊着，慨叹着。在这徘徊慨叹中，竟给他想出一条计来。把阿迁许嫁……做……！但他觉得这是不体面的事，有点难于说出口，虽说那家伙托人向他请求着。

后来不知怎样，陈老医生的廉耻心，竟被金钱征服了。他瞞

着他的妻妹——阿迁的母亲，把阿迁嫁给那家伙了。自己得了二千大洋，又得着一个黄金靠山，今后经济当可无问题。老人家想到这些，也不觉莞尔而笑，难为情的。不体面的……呢，他都忘记了。

阿迁嫁后情形怎样，人们多不知道。有人说嫁后不久，已经为着流产死了，但实际情形怎样？至今尚没有听人确言过。

阿迁嫁后，阿娥很觉寂寞的，勿说要再象当阿迁未嫁时，两人互相磋切学问那种心情去温习旧时功课，就是连女红都觉学得不耐烦，终日给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缠绕着心头。但心灵深处的愁闷，要向谁人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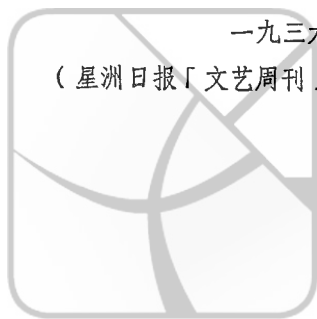
在一九三四年六月间，我听朋友说，阿娥又被陈老医生嫁给某杂货店的老板了。此后关于她一切的消息，我却不曾听过。

去年十一月间的一个晚上，我在C游艺场散步，恰逢着朋友K君，给他拖进跳舞厅，欣赏「跳舞的艺术」。其实这「艺术」的妙处，我是不懂的，亦没有资格懂得。坐了一会，我手里提着一杯咖啡要喝的当儿，忽然传来一种妙媚的声音在呼着我的名字，我一时有点惊愕起来，心想这「火山」我很少到过，怎么有人认识我？抬头一看，啊！原来是密斯娥，我不禁惊喜的呼出她的芳名来。姗姗地行到我的桌旁坐下，「唔！我现在叫做安妮陈！」她操着英语告诉我她现在的新名，说着又笑。「这个名字很美丽」！我喝了一下咖啡，放下杯对她说：『你为甚么要改用现在这名字呢？』『来到这儿，必需用外国名字，不然，人家会耻笑的』。她说着打下手里烧着的香烟的灰屑，望看我的面。我看她两只眼眶涂眼墨涂得黑油油地，心里似有点害怕，觉得现在的阿娥和年前的变得很多了。

由她的谈话里，我知道她爬上这『火山』的经过。自从她嫁那杂货店老板后，不到几个月，为着某椿事，不见容于那老板的

家庭，终于由家人和解，拿得了五百元离婚费，和他脱离关系，回来在她母家居住。住了两三个月，她的父亲死了，付出了这场丧葬费用，她的家庭更加贫困起来。她的母亲和母姨——阿迁的母亲，又不知怎样因吵闹而分居了。阿娥为着赡养母亲和解决自身的生活，终于经人介绍在M跳舞学校学了三个多月，来C游艺舞厅当舞女了。人事的变更，真够使人慨叹呢，一个天真美丽的小姑娘，现在竟做万人搂抱的舞妹了。

舞场里『天佑我皇』乐声歇后，阿娥的矫健的身影在人群中消逝了。我心里忽涌起几个疑问：廉耻？面包？阿娥？阿迁？陈医生？安妮陈？



一九三六，初春

（星洲日报「文艺周刊」廿四期）

慧

素芳跑出去后，我又陷入深度记忆中……

一本初级英文教科书，一个三尺许高的娇小身材，当在我的面前出现的时候，两个灵活的眼珠，伴着一个端正的鼻子和殷红的小口，眼睛在笑，小口也在笑。这样一个星期三四次，给我感觉到人类的可爱与和平。

今天，她跑出去，依例返身替我关上房门。

我望望台上的书，拂去影镜的微尘，一点怔忡，给我带来轻微的悒鬱，无意中我叹了一口气，「这人间的变化真太快呢！」

镜里嵌着慧的影子，五年前的我的友人，当时她有点象现在的素芳，伶俐，天真，娇憨，不过年纪大点。她教我说广州话，我教她读英文。那时候，我住在她父亲开的商店的楼上，和现在我的寓所的情形差不多。她在附近的女子小学读书，我却落魄跟着一个侨生读英文。无知，寂寞和人间不幸的凄苦，紧密地袭击着我幼弱的心，使我感觉到我的生命的存在有点困难，但坚强和自信，支持了追求光明的意念，在黑暗中摸索，在危崖绝壁间低首前进。象一只受伤了的野兽似的，跌倒了给荆棘刺出了血，就躺在芦苇里，用自己的舌舐去了血污，让热热的眼泪滴在创伤上。群鬼啾啾的可怕幽音，蛇蝎虎豹的鸣啸，都不会使我寒颤，瑟缩。舐乾了血污，依然一步步的向前行。

离开了温暖的母亲的怀抱，只有十余年呢。我象失群的孤雁，在流浪的征途上自己寻觅生命的依托，却开始吻了世态淡薄的苦杯。冷落，讥讽，象冰雹似的，落在我的头上，我的身上，一阵寒风掠过，脸孔起了一阵烘烘的热似的。我没有哭，眼泪好象来到眼眶又淹进去。

是一个下着微雨的深夜。在一盏煤油灯的旁边，我披读着古典主义的莎士比亚剧作「*Reomeo and Juliat*」，喃喃的诵读，伴着窗外的雨滴声，从屋后山林吹来的风，有些儿冷，从窗隙进来，使我感到寒意与凄清。

慧忽然悄悄的，象蹑足似的，从她母亲房跑出来，没有声音，在我面前站着了，给我一点小小的惊悸。

「为什么你还没有睡呢？」我心里似乎想要对她这样问，但没说出来，只是望她绯红的脸，她却了解我的意思。

「是的，你为什么也还在读书呢？」声音微静得叫人听不清楚。」

我没有答，点点头，打了一个很长的呵欠。

她在我对面的椅坐下来，又和平时一样，拿起笔在纸上写字，递一条纸条给我，上面写着一个「慧」字，我知道这是她的名字，但我不知道她的意思。

我拿过了纸条把它挟在书册里，她娇憨地望我，弄着手里的铅笔，什么话也没说。

「慧，我要走了！」

在寂静里，我有点痛苦的对她说。

「什么？你要走。」她象有点惊愕，眼睛睁大了。

「是的，我要走了，这地方我住不下去！」

「为什么呢？」

太痛苦，书没有人教，钱用光，人没有职业，再住下去有点

危险，要走到新加坡去，找点事情做，然后再进夜校读书。

「几时要走呢……」她有点咽哽，眼眶也红了。我极力忍住内心悲哀的冲动。

「恐怕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九一八前的一个星期我来这里，现在已经十五个月了，真想不到苦到这般……」我的声音有点模糊。

「……」她没说话，用衣袖拭着眼睛。

从她的表情，我知道她在悲哀着将要失去一位坚实的朋友。但为了生之磨折，我怎么能够不离开她呢。

时间老人终于带走我们的离愁别恨，把我的记忆罩上了灰尘。到现在我们离别了六年，在变化这么急速的人间，她成为了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一九三八，十一，廿一。

（新国民日报「文艺」六十八期）

悲 秋

人的心情总是随着景物而转移的。中国古今很多诗人墨客，对于「感时」一道特别起劲，杜少陵的「感时花溅泪」已经「脍炙人口」，我家清照：「……佳节又重阳，……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更是使人「莫道不销魂」！现在呢，不要说「诗人」，就是富翁显要，有时「心血来潮」也会哼哼几声平平仄仄之类的。

秋这季节的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和女人的眼睛一样，占着一个重要位置。在赤道线下的南洋，本来它的气候分不出什么「季」，但到底有的。根据「一年皆是夏，一雨便成秋」这两句，「秋」实在也和唐山腊肠一样，由中国被运到南洋了。

最近几天，看看街上什么糕饼店热闹情形，「秋」已爬上白布招牌了：「中秋月饼」。中秋么？是的，这时节实在动人的，很多人对她陶醉地微笑，很多人对她默默祝愿。其他呢，倒先要摸一下他们的肚子，才能够知道，中秋的动人处是在那玉盘般的明月。隋炀帝，虽然糊涂，平地里要凿成运河来泛舟，明月在他心目中倒也来得特别雅致：「暮江平不动，春色满真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这世界是多么和平！但在梁任公的眼中则变成「无情月，挂在奈何天」了！

中秋的月，据说总是圆而明亮的，可是昨晚的月偏躲在黑云

里，大地有点萧瑟，有些人对之不高兴，其实未免太「粗心」。黑暗是光明的反面，这点正和满面忧愁的人之痛苦，远不及面露微笑的来得深刻一样，眼睛看得到的黑暗和痛苦，不过是那看不见的之表面吧了。

眼前的黑暗不值得悲的，未来的黑暗和痛苦，才值得人们悲！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新路」）



拿鏡自照

春风容易又一年！伟大的一年，我们在民族战争的烽烟里又渡过一年了！我们应该自己检讨一下自己，这一年我们替民族，替自己做了什么工作，够否？有没有违背良心的地方。

忝为一个文艺爱好者的我，在这一年中，生活的遭难，和所做的工作，一加回顾，真是有点感慨，但却也有很多使我欣舞，奋励的地方。

在生活上，我常痛恨自己，同时也痛恨社会和这世界。我的性格，是四方的，在这圆的社会里实在有点不行。但这圆的社会对于青春和气魄却是个可恨的魔窟。这一年中，个人生活的难苦和忧患，使我深切的了解它的真面目。

文艺，是己之所爱，也是我的精神活动主要课题。可是配合着我的生活和职业，好象一个跛脚丑妇似的。我的文艺活动变成了多样性的了，从编综合性副刊，转变到青年与妇女，电影与戏剧周刊，以及国际新闻，使我的日常研究课题，和注意对象，起了重大的变化。

报纸综合性副刊，虽然有着青年生活的反映，但它没有象青年与妇女专刊，那么专门化，问题那末多。自己虽是个青年，但编起这专门性刊物，非对这问题加以特别的研究和注意不可。于是分去了我一部份对文艺问题的注意力和时间。戏剧与电影也

同是属于文化部门，然而它的专门性，亦与妇女青年差不多，不多注意点影戏的理论，活动，和趋势也是不行的，于是我的时间和精力又被分去一部份。

和我的日常研究对象距离颇远的是国际问题。活在现在，虽然对国际问题，要有个根本的认识，但要编，要写，非对它加以深切研究却不易为了。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有所限，职业生活这么复杂，精神当不能集中于诸问题，结局一定象一只杂菜桶，什么东西都有，但没有一件可口的佳味。这么说起来，可以算是我个人的「悲哀」。但为生活，我是愉快的做下去，觉得这种多样化的生活，倒有点趣味。

只要主题不变，一切工作都可在各种方式下进行的。一年来，我学习了这点道理，这正是我感觉欣舞奋励的地方。

（狮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卅一日）

新年試筆

新春，新春又来了。

赞颂春风的诗人现在没有了。中日——文明与野蛮，光荣与无耻的搏战，正是新的中华民族的锻炼洪炉。抗战以前，无论你的书斋摆得怎样的幽洁，怎样标榜着什么超然的唯美或者什么鸟主义，只要你不是钢铁，在这洪炉里便会宣告灭亡。其实虚幻的「美」不过是丑恶的骷髅的外套，张资平们现在跑到东京军部指挥刀下的「皇道乐土」做官儿，正是好例证。而吴佩孚老将军购置棺材拒敌利用，也正显示他的气节可风。

在动乱的大时代里，人，都应该要有气节的。有了不屈不挠，富贵不能淫的气节，然后才能在大时代洪炉里锻炼，成为一块不怕冰霜威迫的钢铁。

气节是每个文艺家的起码精神，有了这精神 然后 才能够战斗，不然，见利忘义，才能怎样好又有什么用处呢？

目前，每个文艺工作者，是民族文化的保护人，要发扬民族文化的战斗气质，保护我们的锦绣山河！

盲目的歌颂春天的美丽，现在要不得了，但现在要悲叹春光之易来易逝亦是要不得的。我们睁眼看看吧，在民族革命战争烽烟里，旧时代是一天天消亡了，我们的新时代是一天天的到来，我们要努力促其更快来临！

诗人是时代先驱者，亦是时代先觉者，有灵敏的头脑，更有锐利的眼光和笔尖，到时代的前锋来吧，替我们的战士写下锦绣的史诗！在我们这伟大时代洪炉里，我们将有千百个新的荷马，新的普希金！

一切的歌者和剧人！唱，演吧，喊出我们民族的心声，呼出我们民族的怒吼！创造我们新的精神典型，表现我们新的民族姿态！

新春，新春来了！一切文化工作者皆要以新的战斗来纪念这新的岁序！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新国民「文艺」）



第二辑



「讀者會」之又一建議

文学底发展，基于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结构，况定于历史的进化。一切没有社会基础，违背历史进化的文学，不过是返照的回光，断不能存在的。昏愤的文学待从们，出卖灵魂的奴才论客，无论怎样企图掩饰现实，遮瞒大众的视线，是徒然的，必定会给时代的洪流卷去！

当前中国之国防文学能够奠定坚强的基础，拉丁化运动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迅速的发展，并非偶然的，它有着社会的迫切的需要的条件，与历史进化的必然性；不论法西斯毒魔的手段是怎样凶暴，也决不能扑灭这历史过程的巨焰。相反的，这个对立的毒辣的压迫，更刺激这历史进化的迅速，大家急剧的完成历史阶段的任务。中国文化界在严厉的残酷的压迫之下，不断地展开神圣的新生运动，很多前进刊物一灭二生的出现，就是很好的明证。

时代进展到危急紊乱的现阶段，一切社会的发展，不是个别分立的；一切的力的动态有着密切的关联，个人的一切要依靠集团而存在，离开集团，马上会有「孤掌难鸣」的悲哀。当人类大屠杀的惨剧在酝酿，地球上数千年坚苦缔造的文明将被毁灭的现在，征服毒魔的文化斗争，需要集团来领导，增长力量扩大战线。每个有正义感的人，都要看轻个人，牺牲个人的一点自由，予集

团以发展的力量，那末我们才有看见光明的曙晖的一天。

南洋为世界之一环，寄居南洋的我们，民族的兴亡，社会的发展都影响到我们一切。整个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没有自由，个人也没有自由的。要建造个人的自由，须把个人投进集团里去。

最近本刊之提出集体创作理论，以及华德胡桃谛克诸君之倡组「读者会」，不是无端的幻想，而是和中国文化界之奠定国防文学一样，有着社会的需要与历史的条件。的确，在光明与黑暗搏斗的现阶段，寄居南洋的有正义感的文化人，都要牺牲个人一点精力，为乡国求解放，为人类文明谋保护。

因为有着客观的迫切的需要，华德胡桃谛克诸君的理论都能得到成立的坚强的基础。不过据笔者意见，这儿「读者会」的进行，有着很多阻碍和困难。这，我们于悲愤之余，还要冷静的考虑。

我以为形式虽可决定内容，但在某一场合，内容能脱离皮相的形式，而着实地发展的。「读者会」的进行既有很多阻碍和困难，必也不能得到美满的形式，所以「读者会」的组织的形式，在我以为不甚重要，可以废去，着实地秉着确定成立的理论，恒毅地从内容——实质的发展，使素来荒芜凄凉的南艺园地，得到繁荣的机会。现在为省篇幅把我的意见归纳如下：

一：读者作者编者应切实地合作，沟通彼此声气。读者对作者作品有批评的义务和权利，作者随时向编者提出意见与要求，编者站于评判地位，接受及评判一切意见，提出具体问题公开讨论。

二：「读者会」的理论确定成立后，读者对作者应时时予以策励和批判；对某篇作品观感怎样，随时寄信告诉编者，编者认该信可代表一部份读者意见（不管前进的或落后的），可把该信

公开发表，或直接寄给作者。

三：读者得有选读文字的权利，随时向编者要求或反对登载某类文字。

四：编者斟酌情形介绍作者与作者通讯，互相勉励与切磋。

五：作者与作者间应筑上坚强的合作基础，真诚地互相批判。对文学界的动态和趋势，最好时时检举，讨论，以使读者大众对文化界有深切认识与了解。作者与作者间应牢记，努力的目的是谋求社会文化的进展，不是企图个人友谊的产生。

这些小建议，望大家予以讨论和匡正。

（星火每周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

〔附录〕

促进南洋「读者会」的建立

姚寄鸿

吟风弄月，游戏文章的时代，已经埋葬在历史的深渊里。文化人的立场，也已从「士大夫」阶级，踏进教导大众，为个人的永生，和民族的永生而斗争的康庄大道了。值得作为现代文化人的青年，无疑的，都应无条件的扬弃一切过去的错误观念，歪曲思想；以及加紧克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重新认清自己的立场，体验现实，接触大众，尽可能教育后觉的民众，及提醒那些躲在艺术之宫，或酒色窝里的文人，和走错了路的哥儿小姐，使他们觉悟过来，集中于新的世界观和正义感的旗帜下，一致的改造这行将总崩溃的旧社会，共同建设合理化的新社会，实现平等自由的大时代。

然而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现阶段的一切，还操纵在特殊层的掌握中，他们为要保持爆发前的火山般的权势地位，所有的措施，当然而必然是非常反理性的。生活在这种局面下的文化人，

因不甘拍卖自己的灵魂，贱售自己的人格，无论环境怎样困难，他们都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它奋斗。目前的失败，早在意料中，可是未来的光明，已得力在挣扎下的耕耘播种。哥德说得对：「只有必须每天力争着自由和生活的人，才应得自由和生活。」「五四」以来文化人的努力和牺牲，所欲争的，不单是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而且是大众的自由和生活。罗曼罗兰在本年一月廿九日，庆祝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曾在瑞士无线电台演讲，其中说及他两个基本思想，是值得现代文化人的注意：——

「第一是和所有生活着的人类共存——作为一切时代，人种，国民中之人类结合之深刻而不变的感念。

「第二是思想和行动是不可分离的。我自少年时起，虽浸身在精神的泉源——诗与音乐中，但在观念之中，决不许自己关闭于高大的象牙塔中。我嫌恶为艺术而艺术，嫌恶如消化蟒蛇似的，团团的围绕着自己的周围的思想。所谓思想者乃是从大地的深处涌出来的流泉。那细流虽不深，但是现露在表面的流泉却随着活动，不得不越山过谷，开辟大道，灌溉了大地，势必长育起来。言而不行的思想，是不足月的婴孩，又是背信的事。」

凡是有正确世界观的文化人，都应有如罗氏般的两个基本思想。这不是好高骛远的论调，而应是身体力行的方针呢！

从各方面的观察，大家都可知道自今年来，南洋文化人受大时代的昭示，和民族危机噩耗的刺激，都似乎服了兴奋剂般一齐紧张起来。一方面尽量介绍新知，发扬正确的理论；另一方面，极力的铲除含有毒素作用的汉奸理论，及它的播音机（代言人的刊物），处处都表现蓬蓬勃勃，发荣滋长的现象。同时，有不少的副刊编者，和作者互相策励地朝着合理的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前进，不但跟着历史的巨轮跑，而且提供很多有意义的主张给读者和作者层。这种努力迈进的好现象，不啻为南洋文化界开一新纪

元！

五月十八日谛克君在「星火每周文学」发表了「南岛作家的两大任务」后，更加引起各处文化人的注意，而积极努力于他所提供的两个任务。最近有华德君胡桃君先后建议组织「读者会」，尤为当前的急务。作为文化人的一份子，笔者对于胡桃君的「关于『读者会』的一种建议」，除深切赞同外，还想补充几句话，以促其成。

关于第一点的「集会组织」，我的意见，以为征求的办法分两点：（一）志同道合的副刊编者，以期普遍推行；（二）读者和作者。这样一来，参加的人数必多，所得的效果必宏。目前，愿改弦更张和和大众接触为社会民族谋出路的副刊编者，当不在少数，那末，对于使编者，读者，作者打成一片的「读者会」，必定踊跃参加，而底于成的！

关于第二点的「通讯组织」，我的意见，凡是「读者会」一份子的编者，对于作者和读者通讯，无论事务怎样忙碌，都应在一个礼拜内直接答复，或间接在他所编的文学专刊内「代邮」栏答话。如系读者托为转寄的信，马上应代为办妥。读者或作者对于某篇文章有意见，尽可用通讯体裁投到副刊去发表，公开地切磋和检讨。编者也应在信末参加自己的意见，使读者得以判别谁是谁非。每个月或三个月内，由编者出题征文，发行专刊，既可引起作者写作的兴趣，尤可使读者得着「集思广益」的好处。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胡桃君在建议之后，并「很希望这问题能作一公开的讨论；而这小小的建议，很希望同情者的赞助。」这点热情的好意，是值得大家文化人接受而加以促进的。笔者万分盼望能有人采纳各方面的意见，把「南洋文学青年的读者会」建立起来，使编者们作者们和读者们，能够在最近期间，在意识上互相检讨，感情上

团结一致，学识上互相策励，共同实现「永生」的社会，和「永生」的民族的伟大企图。

六月七日寄自棉兰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五日「星火每周文学」）



〔九一八〕五週年

自从敌人炮击北大营，占夺东北数省以来，到今天经已过了五个整年。时光流逝的速度，真和敌人的炮烟幻灭一般的快！

在人类历史上，五年的时间是渺小短暂的。但我们东北同胞遭受的蹂躏和痛苦，敌人暴力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之加紧，使每个不做亡国奴的中华民族份子心中都象利刀刺着一般的痛。这痛是深刻的、永远的、必有一天会激成一种力量，杀退我们民族的敌人。而且到了那天，我们心里这痛才能够消灭的，换回光荣的安慰。

我们清清楚楚地晓得，敌人的侵略我们，是他们数十年的国策，亦是他们的国家发展的必然的结果；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必需把我们开刀，为的是要解决他们自己国度里的一种矛盾。这种必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进化途程中的必经阶段。我们相信在我们能力做得到的一天，用英勇的行动斗争，必能够促动这必然关系的转变。

在中央政府威力统驭之下，我们的民族统一局面欣幸告成，我们希望驱逐这民族敌人的行动，一定会开始。

明年此日，我们希望不会再用『九一八』这题目来写文章。

（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蕉影」）

身邊瑣事

在动乱矛盾交错着的现在，作家的笔头应该描写十字街头的动乱和矛盾的事态。这是真的，亦是一个有着锋利的笔头的作家应负的任务。不过这任务是重大而繁难的。一个作家要来描写这人间发展着的丑恶的和严酷的事态，应该先有相当的「修养」，可是这「修养」并不是吃黑芝麻糊之流口中所说的「修养」，而是实际生活的锻炼；严谨地体验生活，观察人生，深入社会去和人群接近。然而，在这里研究一点社会经济哲学以及自然科学更是需要的；因为没有这些基本知识作基础，无论怎样一位「才子」，也没有能力看出事物发生的本质，发展过程的相关连系，而去分析，去道出它矛盾的所在的。

根据笔者一个月来的经验，这里一部份要想去描写十字街头动乱矛盾的作者，的确没有这几种学识之基本的「修养」。这并不是故意奚落，铁一般的事实，可作明证的。得到的稿子，除几位特约撰述员及一部份稿件外，积至现在已有半抽屉了。看看篇数，倒也有几十篇，每天总是抱着一颗象要寻找珍珠般的心，把这大堆稿子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翻了又翻，满想在这里发现一颗「珍珠」，然而事实总是使我失望！有时时间充份点，拿出几篇里面有着生活实感的，改了又改，甚至用剪刀把它剪开贴接稿纸，添了一段又一段，这种傻瓜的笨重工作，有人说是浪费

精神，我自己也觉得近似，而且有些不应该，但我再想不出其他办法。

这些投稿者是值得敬爱的，他们有着奔放的热情，坦白圣洁的心怀，他们所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不过他们太缺乏基本学识的修养，描写手腕太弱吧了。他们所采取的题材是好的，主题也正确的，可惜在处理题材的过程中，太急性了，没有刻划出事情发生的本质，发展的关系。换句话说，没有经过艺术的象形描摹就把主题马上开刀！这怪不得他们，造成他们这么「浅薄」的，是缺乏基本学识的修养，和对生活没有体察，对社会没有深刻的认识。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值得敬爱的投稿者，应该努力于基本学识修养，深入社会去体察人间诸般形态，在开始练习写作时，不要乱跟人家喊口号，谈思想。先行描写自己熟识的「身边琐事」，以磨利手里的笔尖。对于这点，张仲实译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值得深切的研读的。

（新路·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五日）

馬來亞文學的正路

平素沉寂得象死水般的馬來亞文壇，最近又似乎要翻起一些微浪。曾艾狄君在「出版界」發表了一篇『馬來亞文藝界漫畫』，這篇文章有點象一粒石子，自從投下去以後，浪花雖然沒有即時翻起，却在裡面醞釀着。直到九月廿二日，一礁君在晨星上發表了「關於馬來亞文學的諸問題，這浪花就爆發起來。接着勞先君又在「星火」抬出了一個「反響」，這問題似有擴大討論的趨勢。本來任何問題，沒有討論，不能夠得解決的，馬來亞華人文學問題，倘沒有人提出討論，永遠也許是這麼死寂的。所以筆者冒用這個「荒落」的筆頭，寫出一點對於馬來亞文學問題的意見，請求大家指正。

一、文藝批評的建設

這兒的文壇需要批評的。呈現在這兒的文壇的，是幼稚、紛亂。沒有勇敢精明的批評來鋤除莠草，灌溉新苗，這幼稚和紛亂，將永遠是這樣繼續下去。因而，在這兒批評家的責任就更加重大了。

我們這文壇需要怎樣的批評家呢？那是要有嚴肅的態度，冷靜敏銳的頭腦，正確精湛的理论，和科學的剖析能力。對於一切糊塗昏蟲的腐論濫調，固應予以无情的指摘，那些努力向上，有

追求光明的志愿，而因教养关系，被认为「幼稚」的，应予以和霭温挚的指引与提携。文学系社会阶层意识的表现，一切意识上的参差，由作者所属的地位去考察，就可得到其意识发源的总关键；不过客观的影响更要谨慎顾到，不要拖泥带水吹毛求疵地单向一方面去揭发和检讨。

在马来亚文坛中，负着重大任务和我们殷殷倚望的批评家，的确未能尽职尽责。我们对批评家固然没有怎样的奢求；文学的进步，批评家固有相当助力，然而主导力量还在作者方面的。马来亚文艺批评者虽然有一部份能够负起相当责任，但一些曲意的学着李逵式的批评，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在纷乱幼稚的这儿文坛，批评家更应虚怀的，能够接受他人的意见，不要一味根据着自己的主观意识，自己的批评有时更要他人来检讨指摘的。

马来亚的文艺批评，要怎样建设呢？我们下文要来讨论一下。

我们要来建设马来亚的文艺批评确是一件繁重的工作。整个马来亚的华人思想界，在种种关系控制之下，还是停留在封建意识的领域里；文艺上的表现，相连地也在水平线下。所以现在的文艺批评之建设，还是重乎「启蒙运动」的工作。换句话说，那是需要保姆式的扶植，撒放新意识的种子，灌溉和培护新的芽苗，在检讨分析作品的过程，不能过于「严格」斤斤于作品本身的估量。简单说一句，不能移用中国的文学批评的尺度来衡量这里的文艺作品，不然，要想作为文艺批评家，时时都要愁眉蹙额的。

马来亚文坛的文艺批评家需要严肃和宽宏的。

马来亚的文艺批评之建设，需要什么主题来作主导呢？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一般批评家更需要深切地去研究的。有人说马来亚和中国，在地域上，政治经济上，社会生活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要紧随中国文坛的跟后起来提倡「国防文学」，在逻辑

上是矛盾，理论更是走不通。这话在表面上似有几分理由，但究实仍然说不过去。这怎么说呢？马来亚和中国虽然在政治经济上，社会生活上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对于我们华侨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中国一切的兴替都影响到我们华侨的一切。在日本侵略主义者魔手劫夺下，中华民族的性命已濒最后一息的关头，不但侨居马来亚的我们，就是寄殖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华侨都要负起一点「救亡图存」的责任。一切文化工作者，有正义感的，不愿意沦为没有乡国做亡国奴的，都要在他站着的文化岗位，挺起胸磨利自己手里的笔头，竭尽所有的心思力量指示大众认识现实，揭发在日本侵略主义者蹂躏下的民族危难遭遇。这些归根到底，都要归纳到「国防文学」的主题上去。或人问曰：马来亚是英帝国殖民地，「国防」二字的采用在逻辑上不是一个可笑的矛盾吗？是的，我们退一步承认它是一个矛盾，反对「国防文学」在马来亚华人文化界存在的先生们，理论和意识的根据，都是建筑在这二个字上。但那是一种偏狭的浅见。「国防文学」的主题和内容，并不是单纯地局限着描写东北义勇军，各界救国的运动，而是包括着整个危难民族的一切。每一篇作品只要有「正义感」的主题，不屈服不投降的意识，都可算做非常时期的「国防文学」的作品，并不是要在作品的末尾地段「插起一枝民族革命的尾巴」才可称为「国防文学」的。我们倘明瞭「国防文学」的理论之内容，不囿于「地域」「政治经济」偏狭的浅见，「国防文学」之存在于马来亚华人文化界，确无反对的余地。

简括说来，在现在，马来亚文艺批评之建设，应该用「国防文学」的理论来做主导的。

其次要论到文艺批评家的态度。批评家的态度，我在上文已说过，需要「严肃」和「宽宏」的。在这里「严肃」「宽宏」，似乎需要下个界说，以免被误会到我是个投降主义者。所谓「宽

宏」当然是对「有追求光明的志向而因社会教养关系被认为『幼稚』的作品」而言的，并非一般地对乱放毒霉的奴隶文艺，也予温情主义的「宽宏」，使它能够得到存在的基础。

然而批评家的态度更需要严肃的，在批评一篇作品的过程中，要摒弃主观的人对人的一切，从作品的本身上，替客观真理去执行批评的神圣任务。

二、我们需要什么题材的作品

要丰富我们的文学，光有了文艺批评家和文艺批评的理论建设，是不够的，根本还是在作品的产生。然则在这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促动作品的产生呢？这是一个大问题。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社会经济的条件的束缚，我们相信任何文学的拥护者，谁也没有力气——其实绝对不可能——去做 P·W·——专业写作者。这里倘曾在报屁股上投过稿的，都感到一种窒息和某种愤恨。编者的故意摆架子，实在使人感到冷冰冰的鬼气。投稿者有时被当作「文丐」看待的。在冷冰冰的情势下，读者不要说了，编者和作者永远划着一条鸿沟，还说起什么合作？名字生疏的投稿者，被编辑先生看不起，的确有其自身的缺点。然而因为这缺点，就连被睬一眼的资格也没有么？编辑先生之放弃责任，确也难辞其咎的。我们知道，「幼稚病」，是每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都要犯着的。身当编辑的，艺术的修养总较这班被看不起的投稿者高一级。编者以自身所负责任，从推动社会文化上着想，应该用这高一级的艺术修养，尽可能地来提拔指引这些「后进」。然而，事实上真够使人痛心的，一坐上编者的交椅，即意态傲慢，对名字生疏的文稿，连翻阅一下也感到不高兴，懒。能够对这班热情的「初出茅庐」学步者，予以扶掖和关心的，确属少数。这文坛的「高墙主义」，在中国如此，在凄凉寂寞的马来

亚文坛也是如此。所以在所谓文坛上，只有几位『老作者』在支撑门面，目空一切的翻筋斗，严格点说，这班先生可以称声「文阀」。所谓推动社会文化的责任是繁重的，单靠几位『老作者』当然不能为力！记得月前某君的统计，马来亚的写作者教育界占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一个危险的惨象！加之在这数字中，『老作者』又是占着绝对多数，这更是惨象中之惨象！在这大群热情的文学爱好者，倾心练习写作者中，我们相信编者倘予以相当指导，不难跳过「天才停滞时期」，成为文化斗争的勇士的。在连带论及写作者的这里，笔者诚恳地对编者先生们提出这个要求和希望。

话说得回来，在这寂寞贫弱的文坛，我们需要什么题材的作品？曾艾狄君所痛骂的「搬」，我们觉得需要的。「搬」也是文化斗争中工作之一部。要负起这工作，全非没有写作经验的「初出茅庐」学步者所能负起。在我们这文坛上，几位老练的作者，骆驼一般的努力干着「搬」的工作，那是有着「启蒙运动」撒播种子的意义，那种不怕繁难的精神，真值得我们钦佩。不过那些「滥竿充数」，没有自己的见解，以他人的意见为意见的「搬」，我们要说一声「不敢领教」的。

「搬」之外，我们需要的题材十分广泛的。我们不能向作家注册：请专门描写某种题材。南洋是个文学宝藏的处女地，她的题材任写也写不完；我们祖先在这里开垦的劳绩，欧战以后之社会的递变，一九二九年以来的社会生活各种情态，教育界，商界以至马来村里的椰风蕉雨……，这些都是极珍贵的值得作家去埋头努力描写的题材。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的是作家对社会文化所负的任务。作家每一篇作品，对社会文化都要尽相当的推动作用，能够这样也才不浪费搔首苦思的心血。现阶段的南洋华人思想界，所表现的，是这样的纷乱和幼稚；而客观形势，是这样的严

重与残酷，文学当然应该负起神圣的任务，正确地去指示大众认识严酷的现实……。所以我们希望有个文学主题来作这儿文艺创作的主导。这点，笔者认为『国防文学』的理论，能够负起这个责任，不过在原则上而已。

马来亚华人文文学之有其特质，我们并不否认，而且十分重视着。文学为现实社会生活之表现，倘失去它所属的社会生活的特质，就即失去它崇高的意义。

南岛的文艺工作者们，意识的斗争是需要的，但斗争的过程需要一个主题来划一战线，那末斗争才不致沦为浪费。现实是这样严重凶恶，我们的笔头需要针对现实的。这儿是个文学宝藏，描写的题材十分珍贵和丰富，以现实生活作题材的作品，都是我们需要的；但在五色缤纷的题材中，我们需要正确的积极的主题来统一我们的文艺战线。在纷乱危难的现世界里，人类社会一切力的发展动态，都渐归群体化，文学为社会的产物，它也需要群体的力量来领导的。我们承认作家的创作能力必需让它自由发展的，然而我们更要知道，作家的力量不是凭空而来，它要社会的教养和栽培，才能发展长大。群体性的积极的主题，就是用来辅导对他的教养和栽培。换言之，是要使作家的力量在正确的主题统驭下，健全地集中起来，集体地走上推动现实克服现实的积极轨道上去。

总之，我们希望努力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地努力描写现实的题材，写出马来亚以至全南洋华人社会生活的特质。任何一方面的题材都是我们所祈求的，但我们希望有个正确的积极的群体性主题来领导，使这所谓文坛跳过幼稚的，纷乱的阶段。笔者要连带说的，这篇文章是在极匆忙之中写成的，其中不健全错误的地方当然很多，希望热心的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讨论，给予指正。

（新路·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九至十月三日）

馬來亞文學的特質

人类历史进化到现阶段，由简单而复什。在复什的中间，它有着一种统一性，那是一切社会各部门发展的相关连系。明白点说，现在社会的进展不是个别孤立的，无论政治的经济的之变迁，都影响到其他一切，而使之随起更动。譬如说，在马来亚山巴里割树胶的，距离西方三强英法美等国是多么远，但英法美三国货币协定签订的成功，都会给予他生活上相当的影响；至于荷币的贬价，住居新加坡的我们间直接受到它的冲击，更不用说了。

文学方面更和世界一切变动有着密切的连系，它随着世界思想主流而起波动，那是当然的事。现在我们这里的文学，表现的是受到什么影响？封建臭渣在污秽的泥沼被翻起，造成一部份淫靡与无聊，争以色相示人，虽然它伴着片面庄严的工作。那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这是马来亚文学底颓萎之一部份内在原因。外来的呢？世界和平与侵略两阵线的对垒，日本黠武主义疯狂的侵吞中国，使每个寄居马来亚的热血的中华民族份子，都感到亡国的悚惧与愤恨；而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矛盾，不景气的加深，使一般人生活起了质的变化。这些复什的情绪，化在意识的表现上，是反黠武主义侵略战争，郑孝胥式的卖国奸贼的卑劣行为，和对现世界经济制度的不满，其他一切失败主义的伤感与呻吟也可归纳到这一类。然而在很多不同现象笼罩下的马来亚文学，它

的特质在那里呢？严格说起来，现在幼稚地发展着的马来亚文学，没有什么特殊的显著的特质的。有之就是随着中国文坛跑，随着世界思想主流而起些微的波动。它还没有特殊的创造力量，足称为特质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地的文学必有一地的特质。马来亚文学的特质在那里呢？那是需要一切文艺工作者去努力的！

（新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



悼魯迅先生

今天清晨三时，户外，雨在霏霏落着，风呼呼地吹，雨滴洒在柏油路上，答答地响。大地投在夜的怀抱里，黑幽幽的，路灯和黑暗斗争似的射着猛烈的光芒。景致是这样的凄凉，惨淡，人的心灵是这样的寂寞，悵鬱。悲愁的世界呵，人的心悬系着大石似的沉重，周围的空气冷冰冰的——这样的严酷！

在这幽暗的夜里，距离黎明两三小时的夜里，凄凉，寂寞，悵鬱严酷的周围，忽由我们的乡国传来一条悲惨的电讯：文化斗争的勇士鲁迅先生逝世了！这是多么使人悲痛的消息呵！

户外呼呼的风声，答答的雨滴，悲凉幽暗的景象，伴奏曲似的，随着我们披读这条电讯的悲痛的情绪，波浪一般的起伏，冲击着我们的心，震荡着我们的头脑，这是多么残忍严酷的情景呵！心在跳动着，泪滴在稿纸上，热烘烘的，活象露珠，一刹那间流散了，流乾了，剩下痕迹，我忽感到一阵羞愧。流泪，太懦弱了。我严肃了，瞪视着纸上的泪痕。

鲁迅先生死了，这是多么悲痛的消息呵！

「鲁迅是非常寂寞的；新青年的同伴，有的飞黄腾达了，有的回到书斋过隐士生涯去了，只剩他飘泊在沙漠上。『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人生途中，而生人并无反应，非赞同，也无反对，如

置身毫无边界的荒原，无可措手的，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呐喊自序）。」

是的，鲁迅先生是寂寞的。在人生战斗的征途上，他象孤独的骆驼一般的寂寞，既无赞同，又无反对，是怎样荒凉，怎样悲哀！然而这世界从此更寂寞，荒凉，悲哀了。但在人类精神未停息的时候，人类思想主潮会再生出巴比塞，高尔基和鲁迅先生的！

也惟有这样：人类思想主潮生出巴比塞，高尔基，和鲁迅先生，才能给予这骆驼一般的文化导师以寂寞和悲哀的安慰，世界的荒凉和寂寞也才不会再继续下去。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日晨五时稿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一日「新路」)

寫稿和投稿

(一)

「……我不是亦不会自谦：我是一个失业的小教书匠。我曾受过小学教育，亦曾在×中二年级的椅子上坐过，因为没有钱缴学费，只好兴叹而退。说到文艺，我也爱好，翻译的小说我读过不少，尤其是在星洲某书局担任了四阅月店员的时期。可是我不会写。但是我很想学习学习。我的朋友也曾鼓励过我，洪××先生也教导过我，然而我太不争气，数年来，一点也写不来，只好愧对诸先生和朋友了。」

「我很希望先生能够告诉我些关于写稿或投稿的智识；让我在新的路上学学开步吧！……」（节录心波先生的来信）

我们很感谢，心波先生从老远的P城寄给我们这封信，措词是这样的诚挚。笔者认为他的垂问有点意义，所以在这里公开答复，如答得不对，恳希朋友们来信给予正确的解答。

心波君和我们一样，同是一个青年，而且属于「社会花边」的所谓智识阶级。在老大的中国，青年人曾读过一点书，打句老话是「鹏程万里」「前途无限」的，真正原因是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读过书的可称为「士」，「劳心者治人」，读了书的「士」应该夸耀一世，——或腰弯弯的跑路。然而「秀才造

反，三年不成」，世界上最不中用的，也就是这班跑路腰弯弯的可怜士。现在呢，「士」在社会上「生活优先权」的宝座，因「时代转变」被击碎了，所谓智识份子和被前人鄙视的挑粪夫一般可怜。象心波君一般的失业教员，现在我们相信多得很，那正可映现这个世界的真面目，而心波君「因没有钱缴学费」，中学二年级的椅子坐不稳，这也可代现代教育制度下注脚。

在这危难的时代，智识份子，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智识份子，是怪可怜的。然而这危难的时代也正是智识份子新生的时机，关键在他们能否抓住当前的机会！

(二)

我们拜读了心波君的信，很欣慰的看出他具有文字组织能力。他是爱好文艺的，曾读过不少的外国作品，他的文学基础更是使我们钦羡了。然而他既具有这样的文字组织能力和文学基础，但为什么他「数年来一点也写不来」呢？这原因或许是他「惧怕」创作，把创作看做太艰深太神秘的东西，误以为能够写文章的，不是「才子」，就是有「天才」的，自家须这样等下去，等到「天才」来临，或到达了「才子」的阶段才开笔写文章。这错误正和我几位朋友一样，有点可笑，但也有点可敬的。可笑的地方是象上面所说的，把创作看得太艰深太神秘，可敬的是敢埋头努力，虚怀学习，没有象打手之流，读了一两本概论之类的书籍，写了几篇谈什么之类的文章，就满想摆起「文豪」的架子之丑态。我那几位朋友也和心波君一样，努力求知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但他们都「惧怕」创作。每劝他们拿笔写文章，都说还学不够。还学不够么？这够有什么界限呢？要「学」到什么时候才「够」呢？这「够」的标准——可以执笔写文章的标准是怎样的？写文章虽然和读书有相当连带关系，但不是绝对的需要

读尽「五车书」而后才能写。那些死信读尽「五车书」而后才能为文的，多少是中了「科举屠场」时代的毒害。「科举屠场」时代的所谓文士读书所费的精力多半是浪费，一味依随古人，一切学理都不另寻途径，加以精密的思辨。但在那专制的暴君时代，这情景原也是可怜的。倘你对学理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见解，必被目为异端邪说，非被屠王送上断头台不可。所以当时写文章只要学会一套作文公式，把古人的「名句」拿来应用就可了。王念孙序汪中述学云：「合汉魏晋宋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渊雅醇茂，盖宋以后无此作手矣。」这几句话是颇可代表先前崇拜读书人的「拟古」和「集成」的。皱眉塾师推崇一部「燕山外史」了不得，五四时代钱玄同（？）就骂它全部不通。我们现在拿它来披阅，燕山外史「博」固「博」矣，但是很难叫人读「通」。一词一句的用典，注释者引证典籍，长篇累牍，尚不能解释明白，中国人读那类的文章实在比读什么外国文更困难。但那类文章，先前（现在还有些活着）的子虚上林赋崇拜者，则视同诗猜一样可贵。十几年前粤东某「神童」，年才十余，不知怎样把肚子装饱「诗书」，用燕山外史的体例写成一部「绮琴泪史」，论者咸称「神童」，「字字珠玉」，「继燕山外史之绝作」。倘真的有那样的「神童」，我们很觉可惜。他的天才，他的颖慧，倘从现实文学的正路去发展，或将成为中国的高尔基，莫泊桑，或沙士比亚。然而他竟在破纸堆中掉了性命，未到廿岁就死了。

这正是「科举屠场」的流毒，提倡「读罢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成绩。

高尔基云：「人生是创造」。诚然，文学也是创造的，不然断不能称为创作。一味摭拾古人的「珠玉」，只可称作「拟古」。我们由这论点推论下去，就可得到一个结论：文学创作绝对不能单只依靠读书来完成，要写作也不能在破纸堆中翻筋斗，守株待

兔似的等候。地底的宝藏原是珍贵的，但你不去发掘，珍贵的宝藏和你永远没关系。总括说来，文学创作和实际生活有着重大密切关系，没有实际知识，没有生活实感，就是你能够「拟古」，拾尽先前文人的「珠玑」，写成的文章，也不过是一堆空洞的废话。所以要学习写作，不能一味等候，只有从实际生活中去体验人间一切动态，努力写，从和朋友的通信，随笔日记学习起。

只有站在唯物论的正确立场，站在革新的否定的立场，辩证地体察，否定，创造，才能达到文学创作发展的正路。

(三)

写文章并没有什么神奇秘诀，也并不是要一味把书本向肚子里装，装得满了，而后才能写文章。英国有句俗话「傻瓜要学游泳，才去读游泳须知」。市上「小说作法」「文章作法」一类书籍，不过是书贾的赚钱法宝，我们去依靠它，相信它，就上了大当。写文章倘是这么简捷，坐在家里读「作法」一类的书籍就会成功，则滔滔者天下尽是纪德，罗曼罗兰，高尔基。我们华人素来最不讲文法的，但同时却又极端拘泥「文法」的。现在通行祭文讣告之类的文章，诸多瑕疵，但你不得不依样画葫芦的摇头摆脑去做。文章作法一类的书，据我知道，编得最好的要算夏丏尊先生的「文心」，但也不过指导我们一些通则罢了。

写文章并没有秘诀，学习写文章更不是专靠书本所能做到。这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现实生活领域里，就是我们的文章的宝藏。只要我们从现实中去奋斗，体验生活，观察人生，和一切人群接近，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严密体察事物发生的本质，不性急，不好高骛远，不一味模仿抄袭，努力把自己熟知的事物，生活的实感，经过严密的思考，而后写出来，就可成为一篇文章。初时「幼稚」「不成样」当然难免，但我们要知道人类也是由猿

猴进化而来的，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经过「幼稚」「不成样」的阶段，只要我们不灰心，不怠惰，我们的作品自能超过这阶段，而「登大雅之堂」的。

浅识并非我们的罪过，有机会而不学习，才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投稿也并不需要什么知识，只要稿子写得好，字迹不要过于糊涂潦草，一纸不要写双面，题目之下加署名，这样寄去，当然会被刊出来和你见面。但「法律」，副刊的体例，字数的长短，编者的思想，当然也需要知道一点。不过爱摆臭架子的编者，非必要时，不要太常写信给他。

心波君：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而且是在极匆忙中写出来的。那只是我个人一点经验和感想，说不上什么理论。你可拿它做点参考，但不可完全相信它，最好还是请你运用自己的头脑。

（新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廿——廿二日）

一段悲劇

在中华民国廿五年九月份的「麻疯季刊」上，读到该社的一篇「社论」：「对高要县捕杀大批疯人之感言」，有云：

「本会在过去一月中，叠接关于广东高要县捕杀麻疯病人的函件，具名者：一系石龙麻疯院同人，其余函件，为高要县公民之报告，及呼吁文。所述情形，大致相同，惟主要则谓：『高要县马县长下令对境内麻疯病人，拟彻底铲灭，自实施以来，为时不及二月，竟枪毙无辜疯黎达二百余名之多；其尤令人惊骇者：不问本身有无疯疾，苟被查悉为疯人之家属，亦予同样处置等语。』全文语语血泪，不忍卒读，其丧心病狂，儿戏人命，有如是者！

「该报告又称：『马县长恐属下奉行不力，特规定捕获疯人一名，给奖赏二十元，因此挟嫌诬报者有之，贪金妄报者亦有之；此端一开，疯民人人自危，强者远窜他乡，弱者投河自杀……』噫！惨剧之造成，谁实为之，孰令致之？马县长岂无父母伯叔，兄弟姊妹；毋乃不思之甚耶？又云：『马县长为地方根本除害，非将境内所有疯人，完全铲灭不止；且对民众故放空气，谓所捕疯人非经微菌专家检验确实，决不轻予处置。』观乎上述，吾人未尝不佩服马县长之具见地，匠心独运，与其麻麻烦烦，筹集经费，招致人材，设立医院，耗费无谓金钱，不若将麻

疯人斩草除根，免留后患之为乾脆也；然而宇宙间，果真有此灭绝人道，荒诞不经之事理乎？考之中外，稽之古今，敢谓绝无仅有也。……………」

「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到现在已达到「滑稽」的阶段了。染着麻疯的，做不得人了。「灭绝人道，荒诞不经」，「考之中外，稽之古今，敢谓绝无仅有也。」真的，「绝无仅有也」！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九日「新路」）



南洋文藝界與批評

文艺运动的本身需要批评来检讨的。为要使文艺阵容的严整，理论的正确，用淘金的功夫介绍出真实而完美的作品；为要评判作家们的思想及创作的技巧，艺术上的成功与失败，我们需要批评，同时更希望伟大批评家多量的产生。

近阅狮声（十月十九日）谈批评一文，里面说：「……至于南洋文坛，不，说时髦点（也可说摩登了！湘），是『马来亚文艺界』呢，那简直没有批评可言，更没有所谓批评家了。」

南洋文坛没有批评可言，我有点不同意。这也许是该文作者眼睛看不到，也说不定。

目前的马来亚文坛是否「没有批评可言」？

我以为我们对南洋的文艺批评，不能一概抹煞的说「没有批评可言」。相反的，南洋的文艺界，现在已注意到批评工作的重要，开始纠正过去擂台式的挑战寻衅，而作着学术问题的讨论及对作品的批评工作；如最近星火发表的谛克君批评林参天的作品及过去侠夫君批评张明慈君关于文化界说的论戏，水源君对志生君关于读庄子文选的理论错误的批评。……我以为这些批评工作在文化的运动上是有相当的贡献的。我们能够说没有批评可言吗？

至于批评家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说谁是个南洋文艺的批评

家，南洋是否会产生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我觉得目前南洋文坛文艺阵容的不严整，创作家与批评家思想水平之太低，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我们应当确信在不息的学习中，从创作的生活中，理论的斗争中，时代思想主流的推动中，将会产生南洋文艺的伟大批评家或作家来的。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启蒙时期，发展到现在来，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不是进步得很快很快么？不是从十多年的运动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成功的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同时从理论的斗争中奠定了伟大的基石，国防文学与新文学运动已向前开展吗？南洋的文艺也应受历史所决定的。一方面是表现旧的或死的文学的没落，那才是新兴文艺的开展。南洋的文艺必然从长期的苦斗的过程中，奠定他的基石。

因此我以为象该文的作者那样的见解是不对的。南洋文艺不但不会「没有批评可言」，它正相反的开展着批评的工作。除开了供人家驱使，专向人漫骂寻衅，企图在笔战中出风头的人们而外，我们相信有许多的前进的作家正开始执行批评的工作任务。

（新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一日）

〔洋貨〕和〔國粹〕

中国的绝对主义的极端思想固是十分发达，但外国也有。可见世界到处不会寂寞的，人类也在这不会寂寞的状况下，不断地进步。然而也演成很多可怜的悲剧。澳洲蚂蚁式的吃着自己的肌肉，忘记自己，错认了娘家之类的例子举也举不完。那是显示聪明，但也流露着苦恼。人类到底有点可怜的，所以『文豪』的苦肉计终于没人欣赏，什么台也无从架成了。这尤其可怜。

外国的东西大多比较「国粹」珍贵些，但有的也很污秽。中国『逐鹿不见山』的极端派机械思想，造成了很多不幸的悲剧，外国的极端主义也把人间涂得血淋淋，墨索里尼和希脱拉两位将军，在表演上何曾不是威风凛凛呢，然而内里的贫困也够使两位将军『绕室彷徨』的。法西斯蒂主义的致命伤，就是它本身包含着矛盾的。此所谓『物必自腐』吧。但却有很多人看到他们的英风，而看不到他们的愁眉，这又岂止『逐鹿不见山』？极端派的机械思想，原来也就是吞噬自身的毒魔！

记得在某周刊上看到，那是去年十一月间安尼达社的消息，意大利古代名画家密芝朗琪罗在大教堂中的著名壁画，中有裸体人像，教皇说是淫猥，请了一位画匠给画像『穿上衣裳』，千余年的宗教艺术名画，现在被蹂躏了。这也算是奇迹，要叫『艺术至上主义者』痛哭流涕的！圣经不是明白告诉我们吗，阿当和夏

娃不是裸体住在『天国』的「乐园」么？教堂的壁上画了几帧裸体人像，正合宗教的意旨：『淫猥』呢！然而负着宗教使命的教皇却这么说，并已代裸画『穿上衣裳』了，也许是忘记自己和上帝吧。这正和禁止男女同行同浴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亦证明外国的东西不一定会胜过我们的『国粹』的！

（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卅日「新路」）



怪 事

『尔雅以守官为蜥蜴，以益母为荒蔚，诗义以蝻为蝼蛄，荀卿以兰根为芷，高诱以乾雀为蟋蟀，蔡司徒以螳为蟹，何逊以拥剑为鱼，蔡中郎以反舌为虾蟆，淮南子以蛭为蚝，孙思邈以合欢为萱草，郎仁宝以蚌肉为淡菜……………。』

且住，一不慎又是抄古书来了。引些古书论点今事，给自以为坐在大炮口的『革命家』看作复古，原是不足怪的。上面『抄』的很多古人错认娘家的活剧，且勿说，三四年前刘煜生因一句『地上泛起了一片红潮』，顾祝同将军说是在『宣传过激主义』，刘君于是被牵上断头台。再几年前，一位读『马氏文通』的倒楣客，官家误认『马氏』即马克思，说他是恐怖党徒，被捉去，结局怎样，我倒不知道。根据这些聪明人发明的聪明逻辑，演绎下去，刘别谦是刘煜生的同宗，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是张学良的叔父，萧伯纳是最近在马来亚视察领馆的萧恩承博士的堂兄，李维诺夫，李滋罗斯又一定是李逵的同乡……………岂非咄咄怪事！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律既有人把它和二元论一视同仁，自以为前进的革命家，以引古论今为复古，攻击机械主义的极端思想是中庸，自然，连骂左倾幼稚病的也必定是希特拉的诤臣了，那更是天大的笑话！然而在这笑话里自以为革命家的却飘飘然了。

革命么，对的，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必定会革命。秦

始皇倘不暴戾到那样程度，陈胜吴广必不会成功；法国路易十四，如无『朕即国家』的念头，卢骚的民约论一定落了空；俄国沙皇的蜘蛛网如非缢得那么紧，十月革命的烈焰也无由燃起；满清若不是昏庸糊涂，孙中山先生必难缔造中华民国，……。一切主观的矛盾都会促动客观的突变。但世界上很多无耻和罪恶，也借『革命』二字以存。第三种人从某一本书里发现了杀尽改革者的学说，亦高举革命的大纛；神经衰弱者流，一时兴致来了，或者学着『文豪』读了一本『革命学概论』或『革命学A B C』，睡了一觉自以为得了天神附体，成为革命家，于是拿起李逵式的斧子乱砍一阵，不合他手里的量度的，尽是反动，斩平之，以示一律平等，完成『革命』的精神。不过使人感到缺憾的是这类革命家好象炮竹，起家易，塌台也不难，一阵毕拍过后，剩下一撮纸灰，连（硫磺）气也没有了，于是重新跑到啤酒间谈革命事业去，这真是革命的『佳话』。

生在封建社会里，封建毒魔的巨爪伸及每一角落，要想和封建魔王搏斗的，在手里的笔未变作来福枪之前，需要沉着战斗，永远的战斗！战斗的方式是多面的。放放爆竹，寒寒敌胆壮壮士气，原也可以的，但要每个人都一律这样做去，却非高妙的手段。

在这里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愿以革命家自命的，不要跑到千里以外放飞剑！人家的文章的题目和内容，更要先行弄个明白，以免弄出象很多古人错认娘家的怪事！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新路」）

世界大同

「天下本无事」，世界上要想做正人君子的人一多，就多事了。例如「文学家」，原也顶呱呱的一流，但想做「文学家」的一多了，其价值遂乃「江河日下」，「文学家」几成「骂」的代名词。但还有「求之不得」而大骂批评家的人在，这也是证明宇宙永远不会寂寞之一例。又如「男女之私」，圣人也承认的，很平常而合「王道」，但给想做圣人的一提，遂神秘了，神秘到有关国家的兴衰，甚至人类的存亡。人类的存亡么？原也对的，没有「男女之私」或许连「人」这东西也没有。且倘若没有女人活在世界上，「正人君子」非但做不成，也不一定会那么起劲地提倡复古，传布王道。做中国的女人原是倒楣的，男人要用她们来粉饰太平，「保护文化」，但却又要她们活受罪，爬上断头台。甚至有时做了祭品还要挨骂。象吴淑姬，「阳春白雪」的首创者，中国女词人之一也，社会不给她过「廉耻」的生活，迫她出来干着正人所不齿的卖笑生涯，但富人又想把她一口吞下，强纳她做小老婆，于是追逐之流控她「淫荡」，「有碍风化」，不予严办，「国家将随之俱亡」。幸喜那位做审判官的王龟龄是文学家出身，有「怜花惜玉」的善心，叫她在酒席之前做了一阕「长相思」，就恢复了她的自由。但骂她「淫荡」「无耻」的还如苍蝇之争咬臭羊肉：嗡嗡然。危文绣做了黎元洪数十年的玩具，一旦

「所天」死去，连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于是迫而改嫁了，却惹起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震怒：下令逐出境！说得近些，以「一弱女子」而保存皇城的赛金花一死以后，墨客们对她过去私生活大加添油加酱，发扬而光大之，这又是什么？

然而，可以叫人愁眉开展的是，我们打开历史来看，罗马时代有贞操带，丈夫发现妻子的贞操可疑时，可把她切成碎片；印度有女人跳火殉夫的义行……；近日广州却开了一家处女「保家馆」。这些又是「洋货」不一定会胜过「国粹」的例证。——谁说世界不会「大同」呢！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新路」）



題外的話

我頂崇拜為「真理」而脫下大衣肉搏的戰士，我尤佩服歪曲「真理」的「糾正」者的「英勇」。

既云為「真理」而肉搏，態度就該光明些。自己的志願他人沒權可管，人家的筆名，至少須注意一點，辱罵和人身攻擊，甚至連筆名也加以沾污，不僅是無聊，而且是无賴。這種「英勇」距離「主題」和「真理」很遠，我願歪曲「真理」的「糾正」者，注意這些。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是理智，含血噴人固可算是「革命」的「英勇」行為，要先塗自己的嘴臉，我也不管，但要催人作嘔，我就不贊同。自命懂得辯證法的「真理」鬥士要注意這些，更要明白這些。

其實很可憐的，所謂「真理」的「糾正」者原來是這樣的。「曹阿瞞」的鬼計倒騙人不久。齊天大聖變成廟宇，而被揚二郎所破獲，就是它背後拖着的尾巴。那樣的狂喊，真所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然而「刮目」之余，我失望了。虛偽者的「假面具」，就是他本身的卑劣行為所拆穿的。泼婦式的狂罵，不會叫人服氣的。所謂真的鬥士，所謂前進革命家，原來是這樣的，我僅付之一笑。自然這笑不是好意的。

我願意接受一切的教訓的，但尤望「糾正」者注意理智兩個

字。既是从「啤酒间」走出来，为「真理」而脱大衣肉搏的英勇战士，就该把本来的嘴脸拿给人家看看，不要化做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正是真理战斗的原则，以示负责任亦示光明的态度。我虽「浅薄」，但我不愿接受不伦不类的东西的教训的。虽然前进革命家几句「过火」的话，能够叫自己塌台。

我盼望真理的战士注意理智二字，摆出光明的态度来。

我愿这希望不会落空。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新路」）



論「可以前進」

太阳先生寄给我一封信，说：「某副刊编者是可以前进的」。这话说得颇有趣味，世界上「可以前进」的人多得很，但借「前进」的美名以起家，自己以为很「前进」，而为着个人的禄位，挖空了心思，放毒霉，想把人类赶进森林去做「虫沙」的，也很多。所以人间「笑料」不会断绝。

现实是不息地在变动着的，为着应付这变动的现实，真理的战斗的策略和方式，自然地要随着转换，可是这转换不是「太阿倒持」的一种妥协主义。唐玄奘要到天竺国去取真经，遭了几许波折，遇了几许危难，他的路线变更了，但最终目的要到天竺国则没有改变。辩证法的哲学理论，不是死的机械理论，它要从现实的斗争中长大，发展。斗争的实际行动，脱离了理论，便空虚，不会发展，但理论也要实际行动和教训去充实内容，向更高度发展。极端派的机械思想，在危难变动的现世界里是要不得的。它用直的视线来观察世界，把人类社会看作死的静的东西，可用「叱责」和口号来改造。在两个对垒摆得十分清楚的现世界里，「前进」和「革命」是两个动人的英勇表号，但无耻和罪恶也就在这两表号下生长起来。第三种人从什么主义里发现了「自由学说」且勿论，那些刚从屠户跑出来的无耻骗棍，一戴上「前进」「左倾」的高帽，居然也大摇大摆，表面是「革命」，内理却代屠户

做奸细。×派的口号是「左倾」「革命」，表面好像是英雄，但这极端的浅狭的「左」，结局是和封建势力妥协，出卖了民族，引进敌人的王军到自己国内来。

「前进」是值得崇拜的，但有时也和洪水猛兽一样可怕。

人民阵线的建立，是当前世界觉醒的大众，为求生存 求和平，制裁战争发动者的集团……。但在中国情形就差异。中国固占着世界的一角，中国人民大众，也属世界的一部份，但中国当前的问題，是民族复亡的危机。最大的民族敌人是东方侵略主义者，在东方侵略主义者压迫蹂躏之下，封建暴君的法西斯阵线是无由建立的，人民阵线在现阶段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国是不需要的。现阶段中国所需求的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同一战线。是的，人民阵线的理论，是现世界前进的思想理论，有着无穷的光明的前途，但我们要回头看看自己民族所处的地位。

可以前进的，但要看前进的目标和路线。

在不息地变动的现实中，一切苦难的打击和预感，促动着每个神经未曾麻痹者的心，我们相信很多人愿意「前进」，做个时代的斗士的。太阳先生所说的「某副刊编者」，我们相信他先生是此中的一个，或者是带动他人前进的领导者，我们也在等着他来领导。

然而思想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它需要现实的教训而后才生长。前进的思想更是从现实的生活斗争中挣扎出来。对现实没有感应，没有深刻的认识，绝对不会生出和现实相呼应的 前进 思想。坐在深闺里的小姐，也想学摩登的，但摩登的进步学不到，学了穿旗袍和烫头发，依然进庙拜佛，她自己想来也算摩登的，说严重点是「前进」的。

可以前进的，但要得其道而进。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在急剧变动的现实中，人，谁也

免不掉错误。只要有正义感有良心，不赖谎，不撒烂污，任何错误都容易克服的。可怜而又可鄙的是，遗老遗少们，连面上那个创痕斑斑的面罩，也永远不愿撕掉，招摇过市，欺骗人们，在自己或许觉得光荣，其实催人作呕，要负相当罪过的。要前进而走错了路，是值得原谅的。歪曲了现实，连自己也歪曲出卖了，谁也得加以攻击的。梁得所说过，自从修辞学发明，世人良心死了一半。这「慨乎言之」的说话，有相当理由的。为着自己的风头，为着支离破碎的面罩，忘记了自己，歪曲了自己，借着笔头欺骗人们，确是一种失去了人性的行动。

没有第三种人的，世界分划得清清楚楚，没有中间站立的余地。不前进就是后退，不能站住观望的，一站住总要给人家拉去。一切神经不麻痹的人都可以前进的，但不要自己撒烂污而躲在远远的一角冷笑他人。把前进的人当作敌人也可以的，但也不要挂起「前进」的招牌。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新路」）

陳鍊青的論創作

陈炼青先生的作品，我平素相当注意的。他有丰富的写作经验，相当熟练的技巧。七八年前的「椰林」时代，他努力的成绩，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虽然没有什么出色，但在那时，却叫人崇敬的。自从他回归「韩江堤畔」，躺在书斋里玩小摆设，给人呼作「阿爷」后，他「转变」了。「觚不觚夜话」，写得相当「浩然」的，他有闲适的生活环境，充分时间以作推敲，庸俗幽默贩卖者林语堂先生的「人间世」「风摩一时」时，陈君亦曾代它卖过一点力，谈性灵，讲闲适。陈林两君的趣味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的，「名士」派的生活更有很多接近的基点，这我们怪不得的。奇怪的是这庸俗幽默的余绪却蔓延到南洋文坛来。「落荒」文豪登启事代他捧了一阵，某副刊的「约法」正是地道脱胎「论语社同人信条」的，风头世家的飘零子弟，悲哀的没落文棍，正「迎头赶上」，追踪这缥缈的快将断绝的幽默余绪。陈炼青君倘不至神经麻木，失却了时代感应性，把「椰林」时代的热烈情形来和这夜鬼啾啾的世界一比较，当会「戚然以忱」，「若有所失」的罢。

陈炼青君的「理论」，最近已得到「反响」了。好象是太阳和林之间在晨星上就曾批评过，新路上非闲君的「奇葩与野草」，也是陈君的理论反映出来的。这是希望和劝勉；重重点说，是时

势的需求，客观情势的策动。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陈炼青君的「理论」还有存在的余地么？据说陈君还年青，富于热力和感应性，南洋文坛希望于这「老前辈」——陈君者实多，陈君读到这些批评的文字，至少要加以考虑，作个「自我的批判」的。这是一个献身文化工作的学者之起码精神。

三月廿五日晨星上陈君的「论创作与体验」，是一篇有意义而重要的文字。大体上是「不错」的。「苏联文学顾问曾在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公开信里，告诉人们以高尔基的创作之能在通俗上，影响上，社会意味上，任何人都难与之匹敌者，是因为他不特具有权威的描写天才，而且对于所写的东西异常熟识。是的，这『对于所写的东西异常熟识』一句，便是他写作成功的焦点。凡高尔基的作品，其题材的资源，全是他一己所曾体验过，他毕生的学力全在乎体验……。」不错，「生活的体验」是成功一件作品的要素，没有真实的生活经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空洞。

他又说：「懈怠，苟且，无恒，畏难，那是不成的。单靠天才，凭恃书本，也是不中用的，高尔基的成功便够我们模范。为什么有志创作者不深入辽阔的生活中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正确的教养者与广博的体验者呢？十余年来文坛上人人嚷要获得大众的意识，要抓住时代的核心创作，然而实际上只是嚷嚷而已，『到民间去』恐怕百无一二罢。这岂不是迷信书本，轻忽体验，使一般作家以为仅捧陈着书本挥笔而可写成获得大众的意识，抓住时代核心的作品，致造成过去对文艺认识的错误么？走入实生活里，是目下前进的作家一个普遍的觉悟，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我愿初从事创作者抛开迷信书本的成见来走这条路」。

这也是对的。但我们拿他下文一段来作个比较，就显见他的「矛盾」了：

「文艺是社会的产物，凡社会上各种形态，皆一一摄入作家

的镜头，经过一番选择与蒸馏的工夫，而后用文字曲折反射出整个活跃的生命于纸上；不管所抒写是什么超人的，象征的，唯美的，一样都有点社会性。」

这是「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混合而成的谬论，作家在生活的体验中，倘没坚定的立场，胡涂乱「摄」，他会给「材料拖死的」。

文艺，不但是「社会的产物」，而且代表着文艺主体——作家本身所属的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就在陈君所引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里面也说「……文学乃训练群众的武器，认识现实的工具——深刻的研究现实世界之工具。」要使文学完成「训练」和「认识」这两种任务，作家单单把「社会上各种形态，摄入镜头，经过一番选择与蒸馏的工夫」，是不够的，何况「反射于纸上」的是「不管什么超人的，象征的，唯美的」呢。「超人」的，「象征」的，「唯美」的，在现在还值得歌颂的吗？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创作理论，到现在，除了小部份的破落户的飘零子弟，谁也知道那是才子的说谎和梦呓了。然而陈君这段理论正是得着这派的真髓。陈君也说，「即使极端个人主义者，自也会呼吸多少的社会气氛」。人，不会「超然的」，生活的全面总和社会气氛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这「社会气氛」扩大一点说，就是「政治关系」，绝对不会超然的。文学者对社会现实，负责改进的以及维持的任务，前者象罗骚，易卜生，屠格涅夫，高尔基以及中华民族思想导师鲁迅先生等，后者象墨索里尼的「诗囊」——诗人邓南遮，「汗血社」诸君子，新月派诸文豪等：做皇帝世家赞，颂扬战争，拥护「优生」学说。第三种人以及没落的无耻文棍，歪曲自己出卖自己的文艺喽罗，多少地间直接都是帮助后者的。

「纪录」固是文学本身应负的一种任务，但文学的伟大价值

是在推动现实，促进新的世界建设工程；「训练群众认识世界」，培养群众的智力，也是文学的真正作用。要发挥这作用，不看事物发生的本质，发展的规律性，简单地把一切社会形态「摄入作家的镜头」，是不能为功的。「选择与蒸馏」，不过是文学组织的一种手段，不够叫读者明了「社会形态的构成原因」。文学的社会机能，是建筑在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上。缺乏正确的社会主张，「艺术」要失去生命。同样的，在社会的倾向性中倘没有「艺术」的创造成分，社会的倾向性也要失去活跃的动力。

我们不是机械的极端主义者，要用某种固定的题材，来限制作家写作的范围。「创作的自由」是需要尊重的。但这「自由」有着存在的条件和要素；不然，做皇帝世家赞，颂扬战争的文豪们，不是也可在这「自由」名义下，逃避群众的裁判么？文艺创作的自由，是建筑在生活的斗争和正确的世界观的统一上。现阶段文艺作家的世界观应该是拥护人类和平，反抗法西斯蒂战争。

陈炼青君无意拥护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的，但「书斋」的生活却叫陈君做了「文艺自由论」的俘虏，这是很可惜的。

陈炼青君要怎样「冲进现实的生活」，恢复已往的战斗精神呢？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新路」）

《今代婦女》發刊詞

宇宙間的一切都從戰爭肉搏中長大的，空氣中倘沒有電子和原子的火種滅亡，那末連空氣也停止流動了。有生命的動物，更無時無刻不在和周圍的一切搏戰着。人類，自從和自然鬥爭，並推倒封建魔王，逐走專制暴君，建立民主政治，其間歷程，都是充滿着肉和血的苦鬥，血和淚的迸流。整部人類歷史是時代英雄用血和力一頁一頁寫成的！我們所經歷的這一頁，正需要無數的時代英雄，用血和力去寫，写得燦爛光輝！

作為人類社會一半成員的婦女，自封建制度興起，母系社會崩潰以來，她們是人類鬥爭史中的被戰勝者，被征服的奴隸！一切的权利被遡奪殆盡了！她們低首，馴良，悲哀，遭受着殘忍的欺凌，侮辱，蹂躪，壓迫。她們不是先天帶來缺憾的弱者，但環境的驅逐，都使她們一天一天低能了。被征服了的奴隸怎樣不會低能呢？然而奴隸們不會願意永遠做奴隸的；當她們覺醒，知道迫使她們低能的桎梏，和這桎梏之所以形成，她們會起來向這桎梏的支配者宣戰，對不公平的制度搏鬥，奪回她們的一切权利！她們知道沒有鬥爭，不會進步；沒有鬥爭，永淪奴隸！她們現在也正需要無數時代英雄用血和力去寫成光輝燦爛的歷史！

誰是這時代的英雄呢？誰應負起這時代英雄的任務？

在世界法西斯蒂黨聯成一條侵略陣線，威脅全人類的生存與

和平，企图用恶毒手段，恢复封建统治的现在，妇女们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他们奴役妇女，他们制造战争。所以现在我们的妇女运动的最高目标，就是要面向这最黑暗的一角进军！

南洋华人社会，因为客观和历史的的关系，它的社会经济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结构，但思想界却是十足封建的意识形态！整个妇女界，除了一小部分外，差不多茫然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她们受到的教养，使她们不会瞭解当前世界的动向；她们所处的地位，使她们低首，驯良。然而，这行吗？不行的！她们倘永远这样，我们的华人社会一定不会进步的，至少她们也是进化的阻力。南侨妇女界的奄然无生气，固是特殊环境所造成，但妇女界本身的贫困，也是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妇女界的先觉者，要怎样奋起领导呢？

我们得着本报增版的机会，发刊这「今代妇女」，倒也没有什么奇伟的奢望。我们只想尽我们所知道的，所做得到的，对南侨妇女界提供一些切实的小贡献，也可算是在黑暗里企图投下一点萤光。我们不想研究治家法规，我们也不想教人怎样去管理丈夫，但我们却想诚恳的和大家讨论人生几个切身的问题，可能时，我们将尽所有力量帮助大家去解决。生儿育女，是妇女对人类社会的责任，也是现在妇女最感苦恼的问题，我们要请大家来讨论妥善的处置办法，但我们不愿大家专作「育婴指导」的宣传。

我们的力量微薄，但我们却愿尽微薄的力量来工作，更希望能够得到同情者的切实帮助和督责！

一切都需要斗争才会进步的！我们在这里先向大家致个胜利的敬礼！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新国民日报「今代妇女」）

日本的搬场艺术

日本的搬场艺术，到现在已有相当进步。

但有时「搬」得很不行。最近东京举行的「御前会议」，日皇「殿下」也参加了。日本军部的喇叭放出空气道：「对支宣战」！「宣战」么？好个吼声的恫吓！

这空气放出后，东京的样子怎样呢？我们住在马来亚，不知道，但也许有人在银座啤酒间里显示威风吧？

这是日本人的「聪明」。

九日本坡反日示威游行举行时，那种惊动寰宇的力量和声势，我们相信「聪明」的日本人不会舒服的，但因不良份子和奸细渗杂其中，致发生了不幸意外，日本人在笑了。十日本坡日文报南洋日日新闻的「评论」说：「战败国国民的悲哀」！中国既是「战败国」，那么，日本就是「战胜国」了，好不威风！

这又是日本人的「聪明」。

但这「聪明」却还不够标准。

我们还记得，前些时，日本「进攻华南」的锣鼓也打得很紧密，而且起劲。东京几位文武小生和丑角唱拍得很出力：「进攻南支切断支那外援」呀，「快点结束战争，快叫支那屈服」呀，使我们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但结局怎样呢？据东京军部正式宣布道：「为避免牵动列强起见，暂时停止进攻华南」。这宣布未免

有点叫人面红。最近日本军部无力南侵，撤退了南侵根据地的金门，却说金门空气不好，疫症流行，给养缺乏。于是日军悄然引退了。这好象是「聪明」的办法，却叫人面红之外，皮肤都起了粟粒。金门四面环海，空气怎样总比陇海路山西一带好点。「疫症流行」，日本医学发达，「给养困难」，日本运输舰很快，我想是不成问题的。但它却这么说。这正象马来西报所说的：「不会丢面子」。

这回「对支宣战」的流产，据说也是为着怕惹动英美的震怒，这调子也叫人听了耳朵起厚茧。

杀英兵，炸大使，撕国徽，沉战舰，毁商船，打警长，并不怕「惹动英美震怒」！对华宣战却怕他们的震怒！「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要学聪明，还是少发空炮的好！

日本的以『战胜国』自命，并非本坡日文报开其先河。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拜受日本军部命令，向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说和时也说：「日本并不以『战胜国』的态度求和的。」蒋委员长庄严地给陶先生一棒道：「难道我们是战败国么？」本坡日文报不过拾了陶先生的唾余。

这是搬场艺术，但太贫困。

更低能透顶的是，日文报也学着自由西报，刊载了九日本坡反日示威游行的相片和标语：『各民族一致团结起来歼灭这只东方的疯狗』，『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侵略中国』！

『英语』，『印度语』一齐录下，这他们叫做『写真说明』。我想示威群众，要把示威标语做电版登日文报广告，至少需要几元，但他们却「义务刊登」了！这些标语就明白地说明着中国绝对不是战败国！但『饰词』却成了日本掩住尾巴的杰作。

『宣战』流产，『进攻』停止，都是『怕惹英美之忌』，搬

来搬去，不过几句肉麻当有趣的饰词。幸喜金门的退兵，和『英美之忌』无关：是『病疫流行』。

这搬场艺术的贫弱，说明『泥腿』的原形！

一，十三。

（新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東京軍部的欺世狂言

東京軍部的喇叭又响了。据十六日上海路透社消息，日本「内閣」之对华基本政策宣言，宣称以后停止与中国国民政府来往，另设立中国新政府，而与新政府合作，重行建造中国。该宣言称，此举将不变更日政府尊重其他外国在华权利之政策，日本负东方和平之责，较前更重，日政府诚恳希望日本人民更加努力，以便完成此重要工作之义务。」

这「基本政策宣言」的发表，我看是多余的。杀戮、抢劫，强奸，焚毁，不就是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吗？满洲脓包仪的沐猴而冠，蒙古德王的「独立」，冀察傀儡的出现，华北王克敏，齐燮元诸贼的跳梁，以至上海小丑的跋扈，不就是侵占中国的土地，分裂中国的主权，企图倾复中国政府吗？

日本军部常常要用喇叭威吓世界，糖衣掩住尾巴，这手段多么的低能！日军最近对待英美法诸国的手段，那野蛮与无耻，就是洋娃娃也是明白的，何况矜持的西洋绅士？本坡的老牌英文报「海峡时报」，就是以绅士的姿态和人们相见的。我还记得上星期它一篇社论，题目是「门户开放」，说它曾收到「满洲国」的「经济部」的情报，说满洲与华北，门户是依然开放的，意思是白种人还能够在那儿做买卖。但这欺世狂言却给事实粉碎了：美国国家城市银行分行和几家大公司，渐渐关门回去了，累得这老

牌英文报大喊「还要好点」。这和日本军部同样低能的懦弱叫喊，对于我并没有什么感动，但从这绅士的喟叹里面，却给我知道西洋绅士不易再受骗了。

「重行建造中国」？自然，中国太老旧了，需要重行建造，但这是中国人民大众的责任，用不着日本军部的七手八脚。全中华民族现在对日本军部的抗战，就是建设新的中国的初步工作。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得太悲惨了，近四十四年来更在日本刀丛中偷生。

伟大的中国，现在正在「重行建造」中。新中国之完成，就是「东方和平」之基石。日本军部的所谓「东方和平」，正是奸淫，杀戮与燃烧！

「和平责任」现在变作日本军部「恐怖政策」的代名词了！

万千的日本大众，莫名其妙地给东京军部骗来中国战场送死，这或许就是「希望日本人民，更加努力以便完成」「东方和平」的「重要工作」罢。但那也很不行。东京大兵工厂的爆炸和最近训练总部的被毁，都说明日本人民大众并非全是「愚民」，军部的欺骗快要给反战怒潮卷去了！

倘使杀戮与轰炸，就是日本的「和平责任」，那么还是堂皇一点的杀、炸下去。不要说什么「重行建造中国」的屁话！除了汉奸之外，现在中国人民没有一个再会受骗，或怕日本的恐吓与屠杀的！

一，十七。

（载「新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

無 賴

潦倒的人，在无聊的时候，更会想出很多无聊的花样来。在他自己以为很有趣，在他人看来则更显见其无赖，甚至肉麻。

无聊文人江亢虎，一到马来亚，就以为现在这群『南洋伯』还可灌米汤，于是便目空一切，拿了几本古书，当做『米汤』似的想把华人的眼睛掩住了，使『他们』忘记了当前的民族苦难，忘记了当前自身所负的责任，教人安贫，教人乐道，更进步的是教人运动，而更激昂慷慨的是暗放冷箭，骂骂人，骂骂政府，一副无耻的嘴脸，正和东京『远东贸易时报社』那群日本军部的鹰犬一致，尽其挑拨离间的能事！这真使人怀疑到江亢虎这次所肩负的是甚么任务？

但昨日江亢虎却由激昂转向潇洒了，自拟是苏东坡和朱熹。这真所谓贻害今人不足，而污及古人了。其实拿现在的江亢虎和苏朱比较起来，何止虎狗之差！江亢虎想拿他们两人做锦衣，掩住自己的尾巴，但得到的效果，却和江亢虎预期的相反，自爱的，都感觉肉麻和难耐，鼻孔发出哼哼声了。

我真不明白，在这伟大的时代里，江亢虎何以老是向灭亡的厄运挺进，大发和现实绝对没关系的有毒屁话！

但我从这次他的『拟古』，更看出他的无赖丑态了！

（新光·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五日）

《新光》編後

对于文翔君和别客君的讨论，我要贡献一点意见。

在现在，严肃的讨论是需要的，但要极力避免意气之争，因为内部的磨擦会削弱我们的力量。

眼前正是马华话剧运动最高涨的时候，这对于马华启蒙运动以及强化马华抗战力量的助益是极大的，戏剧问题的探讨更是剧运工作同志的重要课题。但讨论问题，自然要避免私人意气，才能够达到美满的结论。

文翔君的「给别客君」一文中，有点论及私人的屑事，这编者也要负些责任，现在别客君的，我也只得照原稿发出去。可是那已成过去了，「往者不咎」，同是一条战线的伙伴，知道了错而承认，谁也得原谅的。

现在是入于真实的讨论。

综观现在的问题，是「扫射」和「放下你的鞭子」两个街头剧的演出研究。而我们要检讨的，也即是南洋街头剧的特殊性，「扫射」为什么适合在南洋的表演，「放下你的鞭子」又为什么适合在南洋演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些问题的切实的研究，对于目前的马华剧运多少有帮助的。但倘不是探讨这些问题或其他有关的更重大问题，而是私人事情的分辨，那末这场讨论这么结束就可以了。这要请大家原宥

的。

(新光 · 一九三八年三月)

[附录]

给 别 客 君

文翔

别客君：

我在拜读你的大作（见二月二十七日「影与剧」）之后，我一边感到惭愧，一边感到可笑，而一边却感到可恨！这话怎样讲呢？现在让我一一述说出来。

依你以讽刺的口气对我所说：「文翔君似乎是以外行而假充内行，」是的，我至今对于戏剧还是「外行」，不过高兴时研究研究而已。然而按照你的说法，我既是一个「外行」，我又何苦来替人家「捧场」而吃你的苦头呢？你说这话是很对的。我不该万不该替演「扫射」那些朋友写剧评。不过，不写又怎样呢？据你说：「而最适合这原则的街头剧，在现有的许多剧本里只有『放下你的鞭子』一剧。」哦！我知道了：我不应该替「扫射」「捧场」，而怎么又不替「放下你的鞭子」「捧场」！是不是？这话我无不赞成，作为一个戏剧「外行」的我，那一个剧本「好」我都是不在乎的。不过，我设想一下：假使我替「放下你的鞭子」捧起来，而有人背地换笔名写文章骂我「外行」，那又怎么办呢？老实不客气的对你说：你已经矛盾了！我是一个戏剧「外行」，最好是让我一切都不要「开口」才好！

总之，我很惭愧，我不该以一个戏剧「外行而假充内行」去批评戏剧。戏剧批评者，是应该让你这样「内行」者去弄的！至于批评的对不对自然是另外一回事。

其次，我怎样感到可笑呢？你在那篇「读『看扫射后的感想』之后」的大作里，开首这样的骂我：『写文章最忌拖泥带水，

尤其是关于类似剧评的观后感或「感想」这一类的文章，往往有人欢喜牵东拉西，如果牵得适当，拉得合宜，还衬得出他的锦绣文章，可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时候，我就不敢说了。昨日（十八）在晨星上看到一篇大作，看「扫射」后的「感想」，作者文翔君。文翔君的这种类似剧评的漫谈或感想的大作，我曾经拜读过好几篇。在我观察，他的作风好象有个一贯的习惯，不是在本文之后重拖一条尾巴，就是在本文之前来了一段前致辞。好了，我在晨星上那篇「类似剧评」的文章，我承认它多少有点「拖泥带水」，但我已对读者声明过，它只是说出我所要说的「感想」而已。现在承你指出，并且称它为「锦绣文章」(?)，我实在有些「不寒而悚！」尤其是读到你的大作之后，更使我有点「背后发冷」了！别客君，你的骂我那些话恰恰是你自己所犯的呵！

说话是不应该客气的，正如你骂我时一样，现在我来检查检查你的文章一下。你的文章通篇程序不是象你说我的文章一样「拖泥带水」吗？不，也许还「过火」一点！在你的「读『看扫射后的感想』之后」里，起初是骂我，然后是借题发挥。发挥什么呢？就是骂『扫射』的不好！再后便来一个『放下你的鞭子』的赞扬。如果用一个好笑譬喻说：你的文章是相当于『正，反，合』这个「哲学逻辑」的！然而说得严格一点，你的文章却暗合于你骂我的「不是在本文之后重拖一条尾巴，就是在本文之前来了段前置辞」了！别客君，这难道是我冤枉的话吗？依你说你的通篇文章有资格够得上系统吗？说它是「剧评吧」，然而开首却骂我一大堆；说它不是吧，后面却说许多「扫射」的不是，说许多「放下你的鞭子」的长处，这实在使我看你的文章后，再想起你骂我的话，不觉教我发笑起来。

自然现代的作文方法已经容易得多了，象散文之类，不必死板板的应用「起头」「结尾」的定律去写的。好在我也不计较这

点。不过，你要重读你的文章一下，然后再合眼想你骂我的话一下，不然，你只记得骂我，却不知原来是骂你自己呢！还有，我的文章的主要点是「捧场」（依你的口吻）「扫射」，虽然上面有涉及「放下你的鞭子」，但还不至于象你把「扫射」骂得一钱不值。而你呢？我不必说了！你应该认识：作为一个「内行」的戏剧批评家需要慎重的，在作批评的时候，『最适合这原则的街头剧，在现有的许多剧本里只有「放下你的鞭子」一剧，』这样的武断说法是最忌讳的。

最后，我更不得不进一步的质疑于你了。你说：「文翔君的这种类似剧评的漫谈或感想的大作，我曾经拜读过好几篇，在我的观察，他的作风……，」对「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者及全业余的朋友，我自信除了你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和我有这样现象吧！至于我的「批评」「扫射」，是因为我参加那些朋友的「捧场」工作，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所请，盛意难却，在作为「外行」的我便只好献丑一下了。

现在，话已说得太多了，就此带住吧。我现在有一个最诚恳的希望，即是奉劝你口里天天在说「救亡统一战线」的时候，不要忘记统一战线里的重要因素。自然，象我这样的人是不足道的。但是假使对于我以外的每一个人这样似乎却不行了。

答 文 翔 君

别 客

文翔君：

我很愿意和你多多的讨论，然而时间上不允许我多写一点，不过为了要免去许多无谓的摩擦，现在简略地回答数事：

一，首先对人和对事需要分开，如果把它拉在一起，永远是弄不清的。我那篇「读『看扫射后的感想』之后」，前段实在有点过火的地方，也正犯着「拖泥带水」的毛病，这点我是承认

的。不过「它只是说出我所要说的『感想』而已」，别无恶意的存在，所以这一点属于人事方面的，我愿负这失检的责任。

二，三月五日在新光给我的文章，一点也没有讨论到「剧评」或「街头剧」，整篇充满着意气的漫骂，我是欢迎的，不过要骂得对，骂得有意义。可是那种除了骂之外，于我不得到一点有价值的讨论，我是不敢同意的。因此，希望先生来一点比较合题的讨论；就是引起人事上的误会责任，我可负全责，希望关于街头剧的意见多发挥一点。究竟我是不是把「扫射」骂得一钱不值，你认为那一点我说得不正确，请尽量的提出来研究。如果属于我错误的，绝对不会不接受。可是要请你注意，我所提出讨论的，只属于街头剧剧本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扫射」是否适合在南洋的街头演出的问题，并不否认它在舞台上的价值。至于关于演出者及其演出的批评，并不包括在这问题之中。

三，「放下你的鞭子」，你说我武断它是「最适合」街头剧原则的剧本，那末你一定认为这剧本尚有不适合的地方无疑。如果你不吝惜请指出，让大家来讨论。或者你知道的有比「放下你的鞭子」更适合的剧本，也请介绍出来给大家采用。

四，谁都不是挑拨者，我那文里所讨论的，祇关于剧本的问题，没有牵涉到两者的演出人。而且两剧的演出人，和我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当然没有彼此之分。就是我和先生也是朋友，不过我们只是对于街头剧的意见稍为不同而已，各人没有什么敌对的成见存在，所以说谁也没有挑拨的嫌疑。

末了，希望我们能够诚恳的讨论，保持着我们的友谊，互相纠正着，勿使牵连到人事的摩擦。

文學口號問題評議

沉寂很久的华侨文学口号问题，最近又经多人提出讨论了，而且相当的到了一段落。有些朋友向我责问，为甚么对这口号的讨论这样「冷淡」与「缄默」，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答曰：这『缄默』也就是我对它的批评。

几日前铁马先生把他写给狮声编者楚琨先生的信剪给我，我颇知道他的意思。他从暹罗到星后，我和他会面很久了，却很少谈到华侨文学问题。现在在匆忙里写出我一点意见，算是答复朋友，亦即是给予这问题一个评议。

华侨这二字，在地域的定义上是很广阔的，散布在中国区域外五大洲的每个角落里的，所谓黄帝子孙都称做华侨。但寄居在海参威至莫斯科一带的华侨，和在美洲，巴黎，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以至暹罗安南的「不能相提并论」：政治经济文化，在本质上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艺术上的要求当然也因地而异了。虽然从历史关系上说，华侨对于乡国的历史使命是有一般性的，但思想斗争的方式却不能尽同。所以「华侨文学」的口号之决定，就要费点精力去考虑了。但我现在想将地域的定义缩小，简单地以马来亚作讨论据点，比较能够避免广泛。

关于马华文学口号问题的讨论，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在中国展开剧烈的论争时，这儿也曾激起讨论的波

浪。初期是属于流派的讨论，及后认为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即进一步讨论到地方特殊性的问题，到底这儿的环境和中国有甚么不同。这讨论是进步而且正确的。但到现在还似乎成为悬案。

铁马先生在和狮声编者的通讯中，曾提及「渔光先生甚至竟提出了『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来，我觉得这个越弄越把目前的严重的主题迷失了。」使我忆起两年前的一段小故事来。那时，大概是学校放假吧，渔先生来到新加坡，在会晤的时候，他向我说：「文化丛报要我写篇关于两个口号的文章」，我答以微笑并且赞成。接着出于意外的，他颁定我为一个「派」，说「文化丛报请我写这题目的文章是有意思的，因为你和寄鸿是国防文学派，马达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这至少真「派」得我莫名其妙。但渔光先生自己呢，据他说是「介于两者之间」。后来他那篇大作在文化丛报发表了，文化丛报编者加下按语，请读者参加讨论。但却沉寂得很，并无人提供意见。过后不久，文报停刊了，这事也似乎成为悬案。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渔光先生对我说，他眼见马华文学口号有点分歧，要另外提出一个新口号，并且说他曾经和林参天先生讲过了。我问他要提出甚么文学创作口号，他用笔写一片小纸递给我，是「反法反封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问学」。我接过后，答以沉默的微笑，全无表示意见。但心里想，这真是渔先生的创见，一个文学的口号，居然亦有标点！这回据铁马先生所引的却是十二字，少了四字，这或者又是一种进步。这是一段南洋小文献。

这「反法西斯反封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否是这里当前所需要的呢？铁马先生说得中肯：「越弄越把目前的严重主题迷失了」。我个人的意见却是「何必另起炉灶？」

到了最近「南洋战时文学」的争论，使我发生一种感想：我

们的朋友，为甚么老是要讨论口号问题？

根据我个人的经论和观察，文学创作口号、对于马华文艺界影响极小，最大的关键不在口号正确与否，而是在能力和环境。要研究这问题，我们要深切考察目前马华社会的文化程度，文艺读者群那个社会阶层的份子占多数，文艺作者是属于那一社会阶层，能力怎样，环境怎样？而要解答这问题，当然要从马华社会经济，社会组织机构，以及殖民地的特殊政治形态去解剖。但要解剖这个复杂的多样性的社会结构，并非刚从中国跑来的智识份子或在教室里跑来跑去的教员们所能够做得到。皮毛的观察并不能捉及问题的中心。这现象在文艺的表现上，是流于单纯，浅薄和公式。眼前以及过去所讨论的文学口号问题，只是瞭解历史的一般性，而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我们第一个要瞭解的是现在这儿有坡督，镇守使，参政司，顾问，苏丹，储君，港主，「班龟鲁」（会长），太平局绅，……一副特殊的政治形态。这特殊政治形态的基础又是一个多样性的经济结构：「斋治」（高利贷）经济，控制着商业资本，商业资本统治着市民群以至手工业者劳动者。另一方面，这儿也有独立性的金融巨头的踪迹。

依存着这多样性的经济结构的社会意识形态，有受外国教育，不识本国方言，而穿中国服装跑中国寺庙的峇峇，和穿亡清礼服举行婚礼的「约翰」和「露丝」，有憧憬着三朝威风的遗老遗少，和仰慕「綵楼」「赠金」的公子小姐，而且还有顽固的矜持的封建绅士。这种东方封建主义和西方文明交流而成的特殊意识形态，和中国思想界比较起来更加复杂了。和这黑暗面对立的是一群站在时代前锋，追求未来光明的热血青年，而残酷地遭受着商业资本经济剥削和压迫的也就是他们。他们大部份是教员，自由职业和失业的智识青年。马华各报副刊的作者读者——所谓文坛的基本干员大部份是他们。此外即是一部份进步学生和少数

店员。目前马华文化活动尚未突破这界线，文坛上问题辩论的影响也仅及他们，其他社会阶层根本上就不知道有什么问题的论争在发展着。这是马华文化水准低落的现象，不能够否认的事实。

在这特殊的政治形态，复杂的经济结构和低落的文化氛围里，当然很难养成高超的文艺人材，于是在文艺的表现上是浅薄和公式，这也就是吴天先生所问的「为甚么南洋没有伟大作品」的原因。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三年前曾经争论一时的「地方作家」问题，一翻旧案，真是使人有点啼笑皆非之感。

最近金丁先生指出当前马华写作人的危机说：「由于最近看到星洲的写作人，于文学路线之争（战时文学与华侨救亡文学）、教育的口号之争（抗战教育与生活教育）、而至于讨论『郭沫若是不是好人』的这些文章，容我放肆地说一句，对于那些讲口号路线以及夫妻枕头边上都谈不到的问题文章，究竟能够找到几个读者，是很成疑问的。我觉得就连我们这些甚么文章都喜欢看的人，对于那类文章也都不愿看了。我请教过许多朋友，他们都摇头；他们说那些美其名为讨论或批评之类的文章，使他们看不懂。他们说，就譬如生活教育和抗战教育这类不成问题而又居然成了问题的文章，竟会你来我往地打了近三个月左右的笔墨官司，打到现在除了作者之外，旁人都摸不清头绪……。」这是眼前的事实，同时亦是三年前的事实。我们这里常常有很多不成问题的问题都成为双方论争的焦点。

这「危机」，我们的朋友，应该用自我批判的伟大精神去克服的。

此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才子派风气之滋长，把文艺工作对社会的任务和私人的友谊汇混了，一有质难，往日感情破裂，造成私人间的对立，于是讨论常常失去了中心。还有一种「作家热」，写不上几千字，就自以为是「作家」了，这结果是造成一

种「超然」的偏见，而成为关门主义的俘虏，轻易以「没落」甚至汉奸的罪名加在他人的头上，渐渐地和现实社会隔离起来。记得鲁迅先生在某篇文章里曾指摘过，新时代的青年有一种共通的弊病，即是仅明瞭自己阵线的情形，而不明瞭敌人，愈是敌人的东西，愈是隔膜。我以为眼前马华写作界亦有这现象，同时亦是危机。一部份青年作者，因为过于痛恨腐旧的封建社会，于是社会上一切现象，只知痛恨而不去观察，以致只明瞭自己阵线的情形，而不知道对立阵线中的漫天罪案，愈是敌人的东西更愈不懂。报纸上社团议决案启事之类的文章勿说吧，最近被一部份人视为「盛事」的特种博士江亢虎，到星后所放的演说词，我问过几位青年朋友，读过江亢虎的演词没有，他们都说，要读它做什么？一片狗吠声，读了有甚么好处，浪费精神！这种敌汽同仇的精神是值得崇敬的，但这种行动却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知道，愈是封建社会集团的代言人的言行，我们愈更要注意，因为它正是我们进攻的对象。马华文化工作者当前最大的任务是消灭帮派的存在，肃清汉奸捣乱份子，以及防止汉奸理论之出现，这当然先要明瞭它们的一切。倘只有痛骂，而不考察解剖其言行是不能够做到的。而眼前一部份马华文艺作者的作品的表现，所以流于幼稚，浅薄，浮夸，单纯，公式，缺乏一种坚韧的「咬着不放」的斗争质素，亦正是忽视敌人的言行以及有关情形的缘故。

要弥补这缺憾，当然要一面加强自己阵线的组织，提高理论水准，锻炼斗争意志，一面勿以超然的智识阶级自居，和封建社会接近，深入各社会阶层，实际考察一切生活动态。此外我们还需要有眼光有修养，不死抱某种「理论」尺度的忠实批评者，亲切地剖析作品的缺点，和指出怎样才能写得好。

总之，当前马华文化活动正是朝向正确的大道前进，缺点是免不得的，但和「口号」的因缘很少，较大的关键还在能力

问题，所以怎样提高写作能力才是当前重要的工作。倘把创作口号孤立起来，作为单独的讨论，满以为口号编得好，门路弄得正确，就可使文坛活跃起来，不过是一种幻想。

一九三八，三，廿九，写完。

（新光·一九三八年三月廿八——卅一日）



新啟蒙運動的主題及其前途

南洋周刊第二期里黄石先生的『马华新启蒙运动的进展』，提起了过去的新启蒙运动的推动与讨论，真是有些使人「感慨万千」。时间的飞跃，实在太快了，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到了现在似乎只剩下一些历史陈述了。

几个讨论这运动的报纸副刊，到了最近很难再看到怎样展开和推进启蒙运动的文章。然而这并不是启蒙运动之消沉，相反的，新启蒙运动已入于实践的时期，这一点黄先生的观察和估计是很正确的：话剧运动的急速开展，小孩，工人，女佣，以及智识份子救亡统一组织之实现，这些都是证明马华新启蒙运动之发展，已达到一更高阶段。

这一进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历史的坚实基础，和广大的社会背景。

谁也承认，由于经济政治的关系，和历史上之渊源，马华文化运动是极度深切的受着中国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新启蒙运动之被提出及其发展，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所迫成。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政治史上，虽然不能说是成功的一页，但它是中华民族民主政治革命之一桥梁，却不能否认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里的一把烽火，燃毁了几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大统，——满清江山塌台了。从革命的本质上说，它有着相当强烈的市

民阶层的民主革命意味，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之建立，亦是以这意识形态为基础，虽然这市民阶层的民主革命意识形态，是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烈影响，动摇而没有坚韧的持续性。

但这市民阶层的民主革命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要追溯这一发源，应该明瞭晚清时候的一些「名臣」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人领导的维新运动以及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戊戌变法之孕育者，戊戌变法却是这运动之一「突变」阶段。在那时候，欧洲帝国主义的大炮已轰开中国海禁的土堤，中国古老的农业经济组织，已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士大夫自身的生命财产，已和皇帝的江山同受到莫大的威胁，「名臣」们，头上纱帽已戴不稳了。从这时候起，士大夫阶级的「革命」意识，逐渐地在发展，扩展到了市民层。民八前后的文化运动，已把中国新启蒙运动推到另一更高的阶段上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北大营，中华民族给敌人赶上刑场了，我们不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了！中国文化界于是提出了强烈的抗日要求，发动了光明灿烂的救亡文化运动。随伴着日本帝国主义利刀之逼近，造成了坚强的民族意识阵线，全中华民族的儿女，要求独立，生存与自由；要向日本帝国主义清算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四十余年大血账！九一八以后，中国新启蒙运动是达到民族文化斗争运动之最高发展阶段。有一时期，在表面上，它是受到摧残，但里面炽烈的火流，却是急速的扩展，因为民族危机袭击着每个神经健全者，再没有什么其他的東西，可以用来欺骗和掩饰了。这一发展，到了两广事变，福建人民政府之崛起与消亡，以至西安事件促成民族抗战统一行动，我们的文化运动，是一步一步向着光明的坦途前进。

上面这一段史实的引证，是中国文化新启蒙运动之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社会背景之一简略说明。

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马华新启蒙运动，它之形成和发展基础，当然也走不出中国政治变动影响的途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马华社会和中国社会虽然有着历史的统一性，却也有其社会的复杂性，所以发展的形式和中国不同。不过在目前，它的主题和前途，不但和中国相一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发展中，也要受到中国政治运动的决定。

目前马华启蒙运动之实际发展是一可喜现象，显示着未来马华文化之光明前途。但我们要郑重的指出，目前马华启蒙运动是失掉了理论和实践的互作用了。这，一切文化工作者，要急速的纠正过来，把它充实起来。我们承认，目前启蒙运动的突击队，是向着阴森愚顽的进军，新的文化种子在下层群众，工人，青年，学生群中广播，但这一下层工作却和上层的意识斗争失去了联系。由于汉奸理论的不断出现，文化强盗之意识毒素的散布之活跃，中上层的意识斗争理论还是目前启蒙运动之重要课题。谁放弃了这一意识斗争，谁便使启蒙运动的推进失了一点力量。

根据上面引证的中国及马华启蒙运动的基础和史实，我们当然明白马华启蒙运动，绝对不是能够和目前的抗战分离的超然东西，而是要在这战争的烽火中，使它广泛的发展，健全，成为未来马华文化运动之先导。目前我们对日的抗战，在本质上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是要达到民主政治所必经的苦难阶段；绝对不是步欧洲「民主革命」的后尘，将来坚固的国家基础奠定了，要向其他民族侵略；更绝对不是「中日两国的亚洲大陆争霸战」。只有深中官僚主义的浓毒的论客，脑子里才含有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要奴役太和民族的观念。我们要坚定的认清：我们现在对日的战争，在自身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是建设民主国家的前哨战，直接的敌人是日本军阀，间接的敌人是世界法西斯强盗。对世界，我们这一战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搏斗，是民主国家

消灭法西疯犬的前卫战。从最高的意义上说，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真正实践与最高发挥，推进世界大同之初步战斗。

基于这一论点，马华启蒙运动在目前的主题，应该是发扬民族主义的最高原则，构成强烈有力的民族思想，以扑灭当前的最大民族敌人——日本军阀，以通过这一战争，达到民主革命的道路。对世界是澈底的真诚的拥护和平的民主国家阵线，坚决的拒绝对法西阵线妥协、让步，更进一步的英勇的消灭对法西阵线妥协和让步的言论和倾向。日本军阀是目前全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只有集中一切力量向这敌人进攻，才能够促成马华救亡统一阵线之建立。为了澈底的根绝官僚主义和帮派思想，我们更要展开广大的民主政治讨论，使官僚主义与帮派思想失去了根据。民主政治要求和抗日战争并不冲突，相反的，民主政治要求之实现，会增加了抗日斗争的无穷力量。同样的，官僚主义与帮派思想之根本肃清，亦会促使马华救亡统一阵线之实现。

马华启蒙运动，能够捉住正确的主题，采取正确的实践路向，展开上下层的意识斗争之联系，是有着无限灿烂的前途的，它将成为未来马华更高文化运动之前卫挺进队。

一九三八，七，十九。

（载「南洋周刊」第三期）

退化的危機

目前前线英烈的抗战，是民族灵魂的醒觉和发扬，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新生的前奏。配合着这前奏，我们要扬弃一切旧的生活传统，精神和习惯；从新建立新的人格，道德和情操。简略的说，我们的一切需要新的「作风」。

为了迎接这伟大的时代，完成这新的使命，每个马华文化工作者，再不该咀嚼酸腐了的「冷饭」，再度跃入泥沼打滚，应该用新的民族精神来健全自己，充实自己。

民族战争爆发后的马华文化界的活跃姿态，是一项可喜现象，我们再看不到拖泥带水的撒烂污，也没有看到灰暗的脸谱和无聊的供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坚强的呼喊；虽然在这呼喊声里出现一种微叫人感觉不舒服的恶倾向：「抗战八股」的流风：例如「自从七七……接着八·一三……蒋委员长的报告……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打倒……！！！」的「文章范例」。文艺作品之流于「文范」机械形式是应该迅速纠正的。

但我们并不是「肃清主义」者，以为凡是抗战以前的旧的东西，应该即时把它消灭干净。相反的，我们要用「现实主义」的辩证法则，尽量采用旧的形式，只要它能够帮助目前的民族战争。

从马华的文化立场上说，一切文化运动在原则上都要和抗战

的活动和形势紧紧地相配合。但绝对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因为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和情形有多少和中国不同，甚且有些相反。过去的事实正证明了这「搬」的不妥当。在紧张的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形式」和「内容」。死硬地坚抱过去的作风，只能够使我们退化。

我们会进步，同时也需要进步的，只要我们英勇地正视现实，和现实形态及变动相连接。

在新的时代里，新的民族精神影响下，倘再不能求进步：则只有一条路：「退化的危机。」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狮声」）



批評與打倒

批評是一事，打倒又是一事。

阿三批評阿四，是阿三對阿四還抱着希望，至少要他「做得象樣點」。阿七要打倒阿八，卻就不同，阿七要阿八的命了。

西班牙「編輯室」主筆說：「沉默是最高侮辱」，做錯事有人批評，還算幸運；否則，如果四周圍的人都靜悄悄，那就可悲了，人家在等待你的死亡」。

魯迅先生說：無毒不君子，給我看不起的，我連眼珠也懶轉過去的。一個人到了人家連一顧也不願意，那才淒涼！

我們應該感謝人家的批評，甚至諷刺的。諷刺雖然有點叫人看不順眼，但到底它還是一種最高的愛的發揮。心理學家告訴我們，愛與恨是兩個絕對對立的东西，恨的情緒發展到最高峰，被恨者的一切都給恨者忘記了，他要把被恨者埋葬了，以為他已經死去一般，連提及也不願意，那有心情再來對他諷刺？世上最使人害怕的是「冷笑」和「沉默的侮辱」。象東洋流寇，它炸毀了中國一切重要文化機關與設備，却還要「尊孔」！屠殺了中國無數良民，奸淫了無數婦女和占去一大片土地，燒毀千萬田園……，却要來談「和平」甚至「親善」和「提携」，用愚弄替代屠殺，這是多么陰毒！公開的批評，以至公開的諷刺，我覺得都不是對一個人的「侮辱」，而被批評甚至被諷刺的也并非失掉面子。要

做模特儿也要先有模特儿的样子，痰涎和脓血并没有资格给画家拿来作模特儿；要拿A来做模特儿，至少A是一个典型或典型之一部分。一个人连一点「特性」也没有，还有什么好看？我想，或许外国人的「量度」比我们好吧，他们对于批评和打倒分得非常清楚；他们并不会因为受了人家一点批评而便面红耳热起来，硬要批评者的命。远的不要说，象前任本地总督金文泰爵士，素有「老虎政治家」的称呼，因为提倡马来文教育政策，给本坡几家西报批评得很不象样子，但他老人家看了，依然笑笑，在考虑他的政策，并没有觉得难于做人，要批评者的头。前年秋间本坡乡村局举行会议，为的什么事，我一时倒忘记了，但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会议的翌日，本坡太晤士报用意大利体字母排印，放在本坡要闻中间的一小段加花边小新闻，标题是：**RURAL BOARD IS RURAL**。这有点「不雅」，带着「山村野蛮」的气味，然而乡村局中西议员，也并没有要太晤士报记者的头。

几天前，本坡太晤士报减价，每份由一角减为五分，马来亚论坛报用大字写了一篇社论，那标题更有些「煞气」：**MALAYA'S SENIOR PAPER DIES**，到现在也平安无事。

再说近一点吧，现在世界政治舞台要角之一的张伯伦，本坡英文报对他的批评和攻击，要是「油皮软蒂」的一定吃不消。象不久以前的自由西报，画了一张漫画，把张伯伦，达拉第和庞莱化装作裸体非洲土人，每人鼻上穿一铁圈，给希特拉代言人高林将军牵着走。上星期六日马来亚论坛报社论更对张伯伦不客气说，张伯伦年已七十，难为伟大时代之英国领袖！

单单这些，已够叫「油皮软蒂」的面红了，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对批评者麻烦呢？原因是他们民主化，有学识，晓得批评与打倒是两回事，不然或为一国首相，或为一地总督，或为高官要人，要置「蚁民」于死地，不是象喝杯茶那么容易么？

「油皮软蒂」是经不起大一点的风雨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统一与团结。我们要统一，我们要团结，我们更要扫清一切官僚气派，遗老遗少气质的残余。我们要坚贞和民主，我们更要沉潜与刚毅；浮夸，自大，好使意气的现象更应肃清！

（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新园地」）



第三辑



一九三六年的馬來亞文壇

前言

一九三六年又是这样静悄悄要离我们而去了。时序推演的速度，真有点使我们感觉象做梦。我们犹记得在一九三五年来，大家都抱着一颗跳动的心，烦恼地担忧着这一九三六年的届临，好象第二次大战的一颗大炸弹要在这年里爆发，毁灭整个人类的文化，甚至整个地球似的。可是这不祥的年头现在静悄悄溜过去了，一股火药和血腥气味在空气中涣散了。我们的心头轻松了很多。然而，看看情景，新的恐惧又袭上我们的心胸。新的火药气味，新的血腥气味，又在我们的周围酝酿着了，那是显得更凶暴更残酷呢——未来的一切凶恶的遭遇和痛苦，那才值得我们去担忧、去斗争克服呵。

虽然人类大屠戮的惨剧未曾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的时序里，可是阿比西尼亚的强弱争夺战，西班牙人民阵线和法西斯的大搏斗，中国以及世界各角落的弱小民族解放的斗争，亦够将人类历史的一九三六年的这一页涂得血淋淋的。那是显示着人类的卑劣和愚蠢，同时也表现着聪明与崇高。黑暗毒魔固想扫灭人间的文明，光明的斗士也用着铁和血争取和平与欢乐。

卑劣和愚蠢，崇高和聪明，光明与黑暗在斗争着，整个人类

社会是这样进展着，整部人类历史亦是这样一页一页的完成。

我们寄居着的马来亚，是有文坛的，毋庸无聊的文棍们怎样痛骂，亦毋庸低能的「文豪」们怎样抹杀。高尔基说：「在艺术文学底领域内，我们所完成的是什么呢？它又表现着什么呢？我们年青的文学，有人说没有创造出以言语表象的艺术的伟大的巨匠。但我将修正地说：我们是没有创造它的余暇。这是当然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学自生长以来，只有十余年的历史，仅在这样的年龄，要生出巨人来，那是病态的现象。说青年作家们底技术还不怎样高明，我固然同意，但不能过低地评判那种技术。……」（见东京「文物」第一期：论文学）这段话可移用来代马来亚文坛「解嘲」，解释马来亚的文坛的。我们知道文学的发展要通过社会的运动而长成，而文学的长成要以社会的经济结构来做基础。马来亚因为有着各种历史关系，一切的进展还脱不开封建意识的控制，文学的发展和长成依然在污秽的池沼里挣扎着。我们要理解它的质素，需要从它的历史关系，经济基础去寻求解答，才能得到理论之成立的正确的基点；不能执着李逵式的批评家的斧，乱加斩杀一阵，那象是「逐鹿不见山」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伴着封建意识的压制下，要怎样会「生出文学艺术的巨人」呢？文艺作者要待社会的培养和策励的，谁能超绝尘寰挨着肚子去创造艺术呢？我们再从纵的历史去检阅，马来亚文坛的冷落和凋零，正是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因为马来亚之有这小小的「文坛」，到现在也只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在这短短的历史过程中，兼之有种种束缚和限制，当然没有怎样重大的发展。但我们回头看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十余年的进步，也颇有可观的。在十几年前，支持这文坛的也是和现在一样，是几个副刊做主要的骨干。但最初时是连载「名流」的大作，及后才渐渐登载本地青年的作品。可惜笔者这儿没有先前的材料，不

能作较详的叙述。现在我们且看在当时文坛占着相当位置的叻报副刊「椰林」编者的一小段补白，就可窥见先前的一点情形：「……某一个地方的副刊是某一个地方的缩影，所以我们主张绝对不转录一切名流的大作，而主张登载南洋的青年的作品……」。由这寥寥几句话，我们大概可推想到当时的情形有一个轮廓。这「转录名流作品」的腐烂情形，到现在不过十年上下，若是拿来和现在比较一下，则马来亚文坛的有一点进步，就是瞎骂而不负责任的「文豪」，亦该低首称是的。我们现在再来看，当时一位初来南洋六个月者，「时常在渴想有价值的『小报』或报纸副刊看，殊难如愿」，「槟榔屿有一家小报，十之八九的材料都是在攻击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偶像。……不合我的脾胃；马六甲的『洪钟』，『凉桥』却在深山荒野中，命丧幽冥；其他，是没有了。……」（见叻报副刊一七〇期）先前马来亚文坛的情形怎样，这几句话又是可以给我们一点佐证。

马来亚的华人文坛，因有历史、地域、经济、政治、文化诸关系，老是随着中国文坛跑的，现在是这样，先前亦是这样的。一九二八年前后正是我们新兴力量最活跃的年头，当时堪为代表本地文坛之一园地的副刊，亦是表现着相当前进的姿态，我们试看：

动罢我的笔锋；
涌罢我的思潮；
滚罢我的手淫式的文章！……

.....

暴露封建势力与资产者的罪恶，喊出农村崩溃与工人们遭遇的哀声，和十字街头的劳苦群众的呼声；不必掲載那些明月下的漫唱，男女间的蜜梦，暗室里的花香，树林中的低吟……

纠正思想上的错误；

暴露封建势力与资产者的罪恶，……向着唯物方面去！……

我们的声音有如洪钟，有如铜锣，并不象洞箫。要倾听人间婉转悠扬的清歌的，请离开去。我们不屑唱那种曲词。因为它是奸淫人性的媒介物，是有闲阶级消遣的玩意儿。我们的音波荡入云霄，激成狂风、激成暴雨，狂风与暴雨，把污秽的人间一切的恶魔肃清，一切阻碍光明的绊脚石从狂风暴雨里卷到海洋……我们的面永远向着光明……提防黑暗的势力侵入我们的队伍里，准备着我们底拳头……」（同上一七三期）

这种倔强的姿态，反抗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崇敬的。然而那时的马来亚文坛能够有那么活跃的姿态，也是有着它的社会基础的。那个时期正是马来亚的黄金时代，社会经济十分优裕，一般爱好文艺的薪金阶级，因生活安定，有着充分的创作时间，因而一种新浪漫主义的气息弥漫着各个文艺园地。可见文艺的发展，要以社会经济做基础的。不过那时马来亚的文艺，因有主观的历史关系，在创作的技巧上，多显现着幼稚、浮薄。但这是一切事物发展过程必有的现象。

马来亚的文艺，吸取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十余年来有很多进步的。但在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商业资本社会里，它的发展有着很多困难倒也是真的。因而，在这里一切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更加繁重了。

「关于几个副刊」的论战及其他

人类历史是无穷期的进化，人类社会的一切也在这无穷期的历史进化中矛盾地产生出来，人与人之间永远有着意识的斗争，

这意识的斗争永恒地在人类社会中发展着，它是历史推进机，一切事物进展原动力，没有终止停息的一天。作为世界之一环的马来亚，我们这片小文艺园地上，也不断地显现着人间意识斗争的痕迹。虽然，在战斗的方式上表现着相当的幼稚、混乱，但它总是人间意识不调和的表征。去年二三月间，因笔者在「星火」发表一篇「关于几个副刊」，就引起了一阵浩大的风波。谁是谁非，结果都没弄个明白，现在且把经过的大概写在这里。

作为笔战的园地是「星火」和「狮声」。「狮声」在两三年前李铁民君主编时，我就和它发生笔墨关系，及后某君做编者时也曾发表过我几篇稿子，所谓「门户之见」，我可相信是没有的。本年二月间，我投了两篇报导式的文字给「星火」，一是「南国文坛报屑」、一是「关于几个副刊」，都是信手写来。说是攻击某某和某某，到现在我自己还莫名其妙。「南洋文坛报屑」发表于二月廿二日至廿三日，发表时可说没有什么反响。及至三月七日——十日，「关于几个副刊」登完后，战事就爆发了。一群「文坛的战士」左冲右突，情形之剧烈，据老于文坛者云，是历来所仅见的。单只「狮声」就出了三四个「笔战专刊」。然而「战」的是为着什么，我相信以君子正人自命的，也是糊涂的。这情景到最近某期刊出版，里面登了几篇毒骂人家的无聊文字，我才听朋友说，「文坛战士」某君请人写文章反骂他，以便引起「笔战」，既出风头又可借捞稿费。我于是乎才明白，自命不凡的「文坛战士」原是想要以「笔战」起家的。而先前那种剧烈的笔战，人家大出专刊的原因，我也知道了一半。君子之流有时虽叫人肃然起敬，但到底还会给人牵着鼻子走的。

引起那次笔战的导火线的「关于几个副刊」一文，是用通讯的方式写成的，里面没有甚么标新立异的理论，而是几句平凡的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要从他人的文章里面摘出一两句自

己认为有损尊严的文句是很容易的。然而这也有麻烦，而且糊涂，是君子正人所不应为的。每天人家发表的文章多得很，自己纵是甚么文化统制的魔王，也没有办法强令文章作者的笔头不要描到他头上来。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就是自认为「六根已净」超绝尘寰的和尚尼姑拿来读，亦有自己的尊容在里面。这有甚么办法呢？正人君子的震怒奈它何哉？

我们平心来论，人类社会充满人与人间的一切关系，这一切的关系不息地起着发展和变化，我们的生活总是和这些变动的关系发生着连系。自己倘未至「羽化登仙」，人家描写现实的变动的文章，多少必会牵连到自己的，要震怒，认为他人的文章触及自家的鼻子，损及尊严，也须从理论的正轨教训人家。摆着圣人的架子，不会叫人低首的。我那篇「关于几个副刊」，是报导文坛的情形的，多少总和「变动的现实」有点关系，说它和某某人有些牵连，我确没有法子可以否认，其实也无否认的需要，原因某某人是活在这变动的现实中的一个。譬如我那篇文字里面曾说到热带的文人的感觉特别灵敏，讨论问题的所谓笔战的方式太糊涂等，衡之这里的实际情形，亦不至犯了大错。可是有些感觉灵敏的「文坛战士」，「笔战勇夫」等要说我的笔头触及他了，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否认呢？

关于那次的笔战的文章，有些人看了就不相信那是登在以大报自命的副刊上的。如「几个编者之一」的紫凤君的「小小的声明」云：「……鄙人自认学识荒落思想幼稚则有之，若所谓……则尚未学到，……不知是否挟私憾以骂人，既不敢正面攻击，而『一味』藏头露尾的放冷箭。若然，则赵子昂画马、镜子里只是照着自己的尊容。……」这几句反攻的想训斥人家的话，谁也将不会相信是自谦「学识荒落思想幼稚」的编者之一写的。同日登在那副刊篇首一篇题为「猫叫与虫鸣」，墨汁可贵，不便去摘

录，我们只看这题目的含意，就可知道里面是在说什么「猫叫与虫鸣」了。过了一天，三月十四日又有一篇「以椎指地」，末附一条尾巴：「谈副刊兮意洋洋！威加四海兮学捧场！安得美人兮来自四方！」看看这个「结尾」，全文大意，亦无需抄录，我们就知道了。至十五日，因该刊编者曾公开提及我的名字，为责任计，故在「星火」为文答复，解释「南国文坛报屑」与「关于几个副刊」两篇文字，并请他「保持文学编者的庄严，讨论者的态度，严正地给我一些指教」。但在当时或者是自家阅历浅点，对于君子之流的理解程度差些，这个「求教」的希望终于落了空。到了十七日该刊编者又抬出「再来一个声明」，除了把我臭骂「神经错觉」外，还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本人为避免浪费笔墨计，决不愿与『无的放矢』指鹿为马之流周旋。」在这里，我们对于「权威者」又深一层的认识了。同日置于该刊篇首的是一篇「喽罗们的悲哀」，并附三个副题：「放空炮」、「重弹老调」、「中性人走进会馆里」。指骂的不仅笔者一人，尚有其他两位朋友，可见要以「笔战」起家的，实在要多方扩大战线，以呈威风的。此外又有一篇「谈真伪」，这文的作者，是这次「笔战」最低能的一位。他连自己的立足点也认不清楚，由男女的恋爱，提到日本侵略主义者的「亲善」，旁及南洋的文艺批评，劝人家「不必『浪费精神去干』『假面具』的虚伪勾当」。所谓「为批评文艺而批评文艺」，恰好刻划出自己的一副脸庞。

有人说这次的「笔战」，是马来亚文坛近年来最热闹的一回，亦是隐藏在另一方面的真面孔的暴露，连泥塘中的污烂垢渣也被翻起来了。十八日那个「笔战专刊」是这样凑成的：「好一篇大伯公签示式的卷子」、「揭穿西洋镜」、「手执钢鞭将你打」、「忙与闲」、「何必咪咪叫」，末两篇的作者也是低能的两个，在痛骂人家的文章是「油盐醋酱的一大篇」之余，一翻身自己也

承认是「酱醋」的一个：「这篇也是」。但在这「理论的斗争」正当开展的时候，「星火」忽告更换编者，少吾君代替了君苹君。君苹君在十七日的「答辞」里表示他对这场「论争」的意见和态度：「……我不曾有意冷淡这场论争，反之倒在寻觅讨论问题的机会，可是几天来对方刊出的几篇东西，凭你用任何最灵敏的心思，或高明的方法，能找得出一些略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时，我才佩服你。『猫叫』『虫鸣』『安得美心兮来自四方』，这些光怪陆离的字眼……我们要学那种搬弄，固然不屑，……对一个闭起眼睛骂人的人，我们固然觉得讨厌，但若退一步想，你得原谅他们。一篇文章的原意，读文章的人，是起码要揣摩到的，假如你不怕麻烦，请你先重翻润湖君的两篇『南国文坛报屑』、『关于几个副刊』，再来读几日来对方的大作，我敢打赌，你定会将讨厌的气愤，一变而为悼惜的温情。对于一个连脑筋也懒用的人，难道引不起你一些怜悯么？……」然而君苹这篇文章登出后，在对方看来，又是一个机会，这么「委婉其词」说话，非但「扑空」，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且因此也挨了骂。在十九日那个副刊刊首一篇「极宝贵的两封信」，里面用了一大把引用符号，除连带把笔者痛骂一顿外，就紧向君苹君进攻。这在君苹君执笔写那篇文章时，大概不会想到的。这「理论的斗争」的阵线就这样地扩大下去，对它也就多了骂的骂的。十九日对方一篇「奴才们底本色」，非但「无的放矢」，且骂得大背君子之道，指骂得连他自己也忘记了。但这人间不论给人弄得怎样乌烟瘴气，真理到底还存在的，存在于还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心坎里。同日「星火」一篇「狮岛文坛的怪叫」里面一段说得很公正：「所谓一个负有社会文化责任的副刊编者，难道被人希望提高文化水准，都不可以吗？难道指示一般写作者以正确的道路，都不应该吗？假如连一点人家的意见，都不愿接受，试问这样的编者，以

至作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倒非请教不可了。同时，因为立场的不同，自亦不能一致，这在吾人是承认的。可是，毕竟要你们提出具体的意见来，把战线统一起来，免得陷入于混战式的谩骂底统一战线上去。

「时代已经达到了矛盾的尖端，世界是如此的动乱，客观的事实，早已存在着，对一般大众提高文化水准，指示正确的道路，早已不是观念上的幻觉，而是现实的需要了。只有现社会的御用『学者』（？）以及走卒，一听到大众的名词，才会大肆咆哮起来。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空洞的存在，而是充满着人与人的生活关系的。祇在人类生产过程中，才会构成社会不断的进化。社会的进化是建筑在人类不同的集团斗争的结果，谁说人类的英雄不可以造时势呢？不过，这时代的英雄，先要把握时代的需要而已。目前的时代，难道不需要为大众的英雄创造时势吗？……以哲学社会学为金字招牌的人们，用造谣来欺骗一般的大众，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负有维持腐烂的现社会的责任……。」这是正确的理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的公正说话，稍有良心、稍有正义感的，都应接受而自我反省。但不料也成为了「文坛战士」之「笔战」的鹄的，这还有什么「理论的斗争」可说呢？

这场「论争」还是这样逐渐的扩大下去，什么「高帽子」、「中毒箭」、「猴齐天的金刚棒」、「净坛使者的九齿钉」、「近视」「牛屎」……一类无聊的骂语，都给对方用尽了。这实在等于无赖向人乱泼烂污的行为。当时事情是这样的发展着，看样子似乎有点「难于收拾」，但毕竟还是自家阅历浅点，以为人到底是良善的，依然抱着希望的心，在廿一日再写一篇「问题的再提出」，想把「理论的斗争」的战线统一过来，免得多看几堆烂污。这「问题再提出」是把那两篇引起「笔战」的文字里面的意见归纳起来，成为具体的问题：

一：一切副刊编者，对左右文坛动态的力量是怎样的大，好象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警察一样；编者态度转向那儿，文坛的方向就随之……。

二：报纸的副刊，为报纸本身计，或为社会文化着想，无论怎样，最低限度在客观环境许可下，总需要保持「严肃」的态度，登载一些有点社会价值的文字，给大众一些有益的感觉，抓住广大读者群……。

三：我们极端赞成一个报纸的副刊，有一个主张，以免象野马乱跑；常是打自己的嘴巴……。

四：希望编者有「严肃」的态度，来领导一般写作者，为推进社会努力……。

五：副刊所登载的文字，是代表着它所属的社会里的意识形态，自应乘着指导社会和推动文化的使命，予以正确的提示，指引这意识形态，使它所指导下的社会文化走着正确的路……。

六：在以副刊担当文坛骨干的这里，希望几个副刊的编者，不要逸出最低限度的范围；应保持文学编者的庄严，尽点推进文化的责任，指示一般写作者以正确的道路……。

这六个「问题」是笔者信笔提出来的，并不是来自西伯利亚或罗马汉堡，大有讨论的余地，但给「文坛战士」忽略了，自它提出后，似乎连说到也没有，这真是失了一个良好机会！然而「理论的斗争」还是这样继续开展着，投稿「星火」参加讨论的愈来愈多，有小克、翁仲、卫生、水源、阿克、文晖、亚佻诸君，直到三月廿七日这场「论争」终于没有结论的完结了。

这场论争虽然也和过去一样，没有结论的结束，但它总给予这没有文坛的「文坛」上相当影响，那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直到四月三日姚寄鸿君又在檳城光华日报「檳风」上响应了这场论争：「我们需要评判」：

上月初旬，当我读完了润湖君的「关于几个副刊」之时，一种自我批评的意识，马上浮在脑海里。我离开报馆的生活虽已好几年，但和副刊的关系，还是忽断忽续的。自从在苏岛棉兰从商到现在做个自由职业者五六年以来，工余之暇，先后编过「展望」、「热风」、「新路」；现在和「南光」、「南洋青年」都有相当的关系。在事实上说，我也算是一个副刊编者。

「以我个人的见解」，现阶段的一切编者需要评判；具体地说：就是需要重新估量副刊的价值。文学是战斗的武器之一种，它需要评判，是无可疑义的。所以报屁股的副刊之需要评判，也是当然，而必然的事。现在为切磋、讨论起见，谨把润湖君的「问题再提出」文内所说的六点，重新批评如下：

（一）副刊编者虽然有左右文坛动态的力量，但只限于某种思想正确、立场明显的编者，却不是一切副刊编者都有这力量。润湖君这一段话，立论不差，但似应补充为：「一个副刊对于文坛的贡献或多或少，胥视编者的意识正确或歪曲而定。意识正确的，他编的副刊可以抓住广大的读者层，而给以有力的暗示，以及正确的路线。反之，意识歪曲的，以文章为儿戏，以风花雪月或会心的微笑为题材，他不过是有闲阶级的奴才，哥儿小姐的爱好者，而不是大众所需要的文人。无疑的，他简直是文坛上的剩余者，同时也没有「左右文坛动态的力量」。现在不妨把上海申报的「自由谈」（现已停刊）和「春秋」来论列，前者是思想前进的文人编的，后者是礼拜六派的文人编的。前者对于中国文坛的趋势，影响很大，后者虽继续出版，但是寂寂无闻，对于现代文坛的任何问题，都毫无影响。南洋各报的副刊，能否抓住读者群，亦以编者的思想学力为标准，并不是一切编者都有左右文坛动态的力量。

（二）润湖君的第二段话说得很有道理，有思想的副刊编

者，都应接受这忠告。

（三）「报纸的副刊须有一定的主张」，这问题应分两点来讨论。一，主张的问题——有前进的或落后的，事实上，大众需要前者的主张，而鄙弃后者；但，二，前进的主张系于编者本人的意识和客观的环境。如果编者是个思想前进者，而客观的环境又不会给以怎样不便利，那末他的目的不难达到。否则，编者昧于自己的立场，客观的环境又给以种种的威胁，那末，希望他所编的副刊有一贯的主张，是不可能的。凡身为副刊编者的，对于这一层，极需要作一番自我批判的工作！

（四）配称为前进的副刊编者，不但须有严肃的态度，而且对于现实须有缜密的观察，并须领导作家走向正确的世界观去。「作家，因为他们社会地位和教养的不同，对于人生抱着各自的看法、成见和偏爱。如果他没有较为正确的世界观，即使接触了现实，也很可能会迷失在事实和事象的混乱里，把握不住现实的本质的方面，它的趋势的目标和展望。而科学的世界观的力量就在它能给与『看定方向的能力，理解周围事件的内在联系的能力』。自然，强要作家把握得正确的世界观当作创作前提的条件，是不正当的，但是确保和阐扬这个世界观却是诱导作家走向正确的方向的最大的保证。」「现实主义试论」里的这段话，很可作一般副刊编者一种有力的启示。

（五）润潮君说的这一段话，固然有道理，但我以为现阶段还是新旧制度剧烈斗争的时期，也可说极黑暗的时期，副刊不过是推进文化的一种工具，但编副刊的文人，因社会意识和教养的不同，所发表的言论，当然难求一致。犹如在文化集中的上海，有最左的刊物，和最右的刊物对立着。站在同时代的文化人，在无条件之下，当然愿负起他们应负的使命，干他们推动文化的工作。反之，思想落后了，不但认识不清，反而畏首畏尾去干阻碍

文化前进的工作，成为推动文化的绊脚石。所以我觉得润湖君的要求，未免「奢望」一点吧。

（六）「在以副刊担当文坛骨干的这里，希望几个副刊的编者，不要逸出最低限度的范围；应保持文学编者的庄严，尽点推进文化的责任，指示一般写作者正确的路径。」润湖君的好意，是值得我们接受而感谢的。从前见有些副刊，以迎合一般低级趣味为原则，不惜利用剪刀，东剪一段逸事，西抄一节笑话，最高兴转载的，不出于淫奔、怪胎、鬼话、神话等类的记载。似此虽可迎合某一部份阅者的心理，但对于整个社会，不啻灌输一种麻醉剂，推进文化不足，而贻害社会则有余。五年前的副刊，常有这类的文字，如今时过境迁，一般编者也觉悟过来，不再和以前这么「撒拉污」了。况且「目前的现实，正呈现出动和混乱的姿态，知识份子由于他们游离的根性和敏感，在这大时代中经历了未曾有的动摇、苦闷、摸索，民族的灾难却使大家祇剩下了一条共同的出路。」我们需要正确的世界观，作我们前进的明灯。副刊编者犹如批评家一样，应当把世界观放在第一等的位置上，努力研究和渗透现实，时时刻刻在提供一般阅者群应当跑的路线，这才算稍为尽了我们的职责。

最后，我仍旧大声疾呼地说：「我们需要评判。」没有评判，则这黑暗的社会没有黎明的一天，凡不接受评判的，是不长进的落伍者。所谓评判，就是「在分析某种艺术作品时，去决定艺术家所树立的是什么任务，他表现的是什么观念。决定这以后，再确定此种观念，是适合于实际生活还是不适合，此种观念的艺术表现的质量如何，能否为读者所理解，能否发动读者的思想、意志、感情。换言之，评判，可以在理论上修养自己，可以正确地理解和估量艺术的作品。」

关于互相谩骂或挖苦的举动，我又记起鲁迅先生的话来，他

说：「既是笔战，也就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吧，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所以他主张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如因情不可遏而愤怒，至多止于嘲笑，止于热骂，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至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寄鸿君的意见，到现在还有参考的价值，所以把他的大作大部份节抄在这里。由于这我们可以见到，所谓「真理」、所谓「正义」，永远存在人们的心地里，一切烂污所不能掩埋抹杀的。

姚君这篇文章发表后三四天我才读到，读后，觉得他的态度诚恳，立论公正，见解颇多独到之处，于是我写了一篇「评判之评判」，发表于四月十四日「槟风」上：「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十分矛盾，人类经济组织，急呈紊乱崩溃的现阶段，世界上意识的争斗只有两条：真理和黑暗。在真理和黑暗肉搏的当中，必然有两种理论，一种引人走上光明的大道，一种推人跌落熏臭的毛坑。人是聪明的，为着一己的利益，不惜昧抹着良心，把推人跌落毛坑的理论，在口里在笔下，总能说得『头头是道』，迷惑欺骗一般判断力薄弱的人们。这种人非但是历史进化障碍物，且是人类社会的罪人……。」这段文字是我答姚寄鸿君的开端，亦即该文的前提。我除了再进一步，解释姚君对「问题的再提出」一

文的疑点，对当时姚君「措词之亲切，态度之诚恳」，也给予十分同情和重视。但因彼此意识的基点筑在探求理论上，见解相差不远，这个反响也就这样平息下去了。在这里笔者要连带提及的，在距离姚寄鸿君「我们需要评判」一文刊出不久的「槿风」上，有位火人君发表一篇「怎样做一个二十世纪的儿童？」他说要做一个现代的儿童，须有科学的头脑，但养成「科学的头脑」，他说是去弄「科学的玩具」就可以了，并引胡适博士的「怀疑的态度」的思想方法去教训儿童。我当时读了颇觉火人君受了机械论的欺骗，犯着实验哲学的错误。他是做学校教师的，误己误人都是罪过，所以写了一篇指出他的错误的文字，同样登在「槿风」上。但他没有回答，这个儿童思想问题的讨论就是这样没有下文。

也许一九三六年是世界多事的年头吧，这片小小的马来亚文艺园地，就不断起着论争。现在再从「槿风」说起。那是由太阳君在三月十四日「晨星」上发表一篇「读『文学论坛』」引起的。太阳君说：「『文学』」这刊物，本来没有一致的思想，里面有崭新的前进作家，也有陈旧的国故内容，甚至『小资产阶级』旗下的兵卒，也都包括在里头。」并揭穿三月号「文学」上的「文学论坛」里面鼎君的「作家们联合起来」一文的真面目，又指出前一期角君「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学」之理论的歪断与谬误，那是一回「可笑的事」，有点第三种人的卑劣行为。更进一步拆毁源君的「再论翻印古书」一文是代「聪明文人」郑振铎的「世界文库」作辩护的西洋镜。在那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一支流的文化斗争运动的联合战线的理论尚未达到健全的境地，「文学」在那一群的「理论」确是「慧眼别具」的。太阳君这短文发表后几天。「火星」君在「槿风」上发表「读文学论坛的批判」，于是论争又告开始了。好在彼此都有虚怀探讨的态度，在论争的过程中，没有低能文豪那一般胡闹的可怜行为。当时火星君因居住地

关系，对中国新刊物很难读到，所以对中国文坛情势略欠明瞭（这点，火星君曾用文蓬笔名在过去不久的「新路」上发表一文曾自己言及），完全站在「文学」这一方面说话，说太阳君批评「文学」「脱离现实愈远了」，有「推残新文化的发展，或意识歪曲的嫌疑」。太阳君于是在四月六日写了一篇「『读文学论坛批判』的批判」作答复，一场剧烈的论争就这样展开了。当时太阳君主要观点是这样的：「……在全国救亡之运动风起云涌，国防文学和『符咒文学』和『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学』，它（指文学月刊——湖）的动向是怎样？这是很容易看得清清楚楚的。……『翻印古书』的问题……苏联作家的提出『文学遗产』问题，是在新社会基础稳定之后，才没有引导走入迷途的危险。但是这问题一到中国，就变成鼓吹『固有文明』的毒雾了。所以有人说纵使现在需要提出『文学遗产』这问题，那遗产也未必在中国能够提得来的，火星君是主张读古书需要，还是读外国名著需要呢？」

太阳君这段话就是现在看来还有深长的意义。在中国，那班执着封建魔王的大刀的刽子手，伏在古代腐骸的屁股后，不知杀害了几多有为的英气勃勃的青年，有良心的谁都要用尽一切力量，向这残垒宣战、进攻。

太阳君这文发表后不久，火星君又出来「再和太阳君批判『文学』」，这是立场论争接触得最剧烈的一段。火星君在这篇文章里，措词造句态度十分诚恳，完全没有「泼妇骂街」的气概，这点颇可使那一班一味胡闹的文坛打手愧煞的。他在这里除反驳太阳君的论点外，并搜集几个论据以强化他的理论，这很合讨论的态度的。笔者当时读了火星太阳两君的讨论文章，也感到十分兴趣，于是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批判的商榷』，发表在五月一日至二日的「槟风」上，将双方的意见归纳一下，间附进第三者的批评。当日我大部份赞成太阳君的意见，但到底大家意识的

基点相差不远，又没有什么「意气」之争。在我这篇文字未发表之前几天，太阳君已再发表一篇「再答火星君」：「读完火星君『再和太阳君批判文学』，措词和缓得多，也许是火星君对于联合战线的了解，已经认清楚『友与敌』了」。这是太阳君的文章的开头，其中对于火星君所举论据，逐一加以批评。关于「非常时期的文学」，太阳君当时的意见和我一致，都说「非常时期的文学」在名词上在本质上都不矛盾，末后平心静气的说：「这次对于『文学』的批判，我并不是挟怨攻击，火星君未必是『文学』社社员，没有恩怨，这是十分明白的——事实上，火星君和我的主张同一目的，只因引证不同，就好象对立起来了。我们还是暂时的结束，省却无谓的争论。历史是动的，我们且看动的事实！」一场剧烈的争论，就这样完结了。

这场讨论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讨论的过程中没有惹出什么「动机」的枝节问题，而我在当时对「文学」的一群的认识尚不深，在参加这场讨论中也得到不少的教益，这是那场论争给予的实惠。讨论问题互相切磋是十分需要的，我们痛恨的是那些想以「笔战」起家的胡闹。在这里我要补充说，当时关于「文学」的讨论，虽然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但可说给予「同道」者以及非同道者的一个新的认识，对于「文学」这刊物的评价也较明显了。

现在再从「槟风」上发生过的论争说起，而后才及其他。

这是一个离开文学范围，颇使人感到兴味的问题，不过那还是有着讨论的价值。现在把它的论争经过，约略评述一下。七月廿八日有一位常在「槟风」写稿的先生，写了一篇「恋爱和事业」，于痛骂恋爱至上主义和恋爱机械论之后，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相信：伟大的事业，仍寓于伟大的恋爱之中！」我当时读了就觉得作者的观点有点错误，虽然他反对恋爱至上主

义，但说伟大的事业由于伟大的恋爱来造成，充其量也不过是比较至上论更进一步的目的论者，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恋爱和事业」，立论和他针锋相对：「恋爱问题是现代青年最感苦痛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在现在，一切的基础都起摇动，个人为社会之有机组织份子，个人的恋爱问题之随起摇动，感到徬徨与苦闷是必然的。社会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个人的一切亦无法解决的；当然，恋爱问题必也无满意的处置了。」

「人类为情感的动物，青年为情感强烈的人类份子，其需要爱的慰抚是『天经地义』，但在现在一切都商品化，两性间相互作用的恋爱，亦是『非钱莫办』的，一般青年之被排出『爱的幸福圈外』，是十分普遍的，于是徬徨、悲哀、诅咒，甚至颓废自杀充满社会每一角落，这正是这个齷齪社会的特征。」

「爱的抚慰之可贵，被青年目为『枯枝逢甘露』般的珍贵，亦就在于此。——本来在合理的社会里爱是很平常的。」

「于是恋爱问题之影响到青年底身心，与事业底创造是很可能的，但健全底性格与某种紧迫事业底创造亦能够摧毁爱的锁链。我们不能过分重视恋爱而强调恋爱的作用，恋爱有时亦会叫人走进牛角尖。」

这是我立论的前提，并引用高尔基的话，证明事业底追求，能够粉碎爱的锁链。

鲁迅先生和景宋，田军和萧红，欧阳山和草明，我们可以承认，他们的「社会事业目标相同，阶级意识相同」，但我们不能绝对地说鲁迅先生，田军，欧阳山之努力尽是为了景宋、萧红、草明之爱底抚慰；同样景宋、萧红、草明之能够译作亦绝对非尽为他们而提笔的。一生没有老婆的果戈里毕竟能够写出「死灵魂」「巡按」等巨著，为着女人而苦闷的歌德，亦能写出「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名篇。宋朝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是躲在新娘房里写

成的，但瞎了眼睛的左丘明竟会作出「左氏春秋」，断了腿的司马迁，写出一部中国史家所推崇的「史记」，最近苏联某残废作家更受到政府的褒奖。恋爱在一定的场合里对于事业的成败，不过是一种影响的作用吧了。

此文发表后，对方认为不满，于是再来一篇读后感，指我说他「太把恋爱的作用强调」为不当，但一翻身又跑进极端主义的圈套，把恋爱也取消了：「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压迫解除了，那时的恋爱，不但不成问题，即连恋爱的名词，也要和古代的青铜兵器，一样地送进博物院里去陈列。」最后暗暗骂我是个清谈主义者。这个街头，我觉得没有资格可以接受，于是写了一篇「目的论的恋爱观」，和他作个切实的讨论，分为几个小段：一、什么是「恋爱的场合」，指出他只看到恋爱有社会性，但看不到「社会性」在人与人之间生活关系之有机作用。结语是：「眼前青年男女祇能在社会解放斗争底实践中去寻求「一致」，不能在恋爱底热拥中去寻求「一致」。二、「伟大的事业」是否「寓于伟大的恋爱之中」，说这观点是他在理论上最大的错误。第三段我反对他取消恋爱的极端机械论，说在什么社会中，人类男女的恋爱作用永远存在的。末段是说健全的人生观有可能的可解除恋爱的痛苦：「黑格尔云：『无实际的思想与无思想的实际，都是不能想象的东西』。——目的论恋爱观底强调恋爱作用的夸大性也是不能想象的。」

此文发表后，我盼望着对方能够展开讨论，扩大他的论题，可是结果和我的理想差得很远，在「关于恋爱和事业的总答复」里，说什么引起我的怀疑，是他的「幸运」，冷冷地讽刺了一下，就把论题踢开了，最末又来个临去秋波：「我的解答，已尽于此，以后润湖君再有什么论列，恕不复命！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仍为整个社会问题得不到澈底的解决，一切都不能得到健

全的收获。」(原文)这话是否正确，一望就可知道了。一切都要等到「整个解决」，什么也不用谈了。当时我想要来个「论列」，但一转想，终于没有着笔，因为人家既高喊「恕不复命」，恐怕又徒然扑了个空。这场风波至九月十五日谛克君出来作个总检讨，就这样完结了。

「槟风」，素来在这荒芜的马来亚文坛中，算是一个颇为前进的副刊，对于理论的清算颇为努力，除了这几次的论争外，对新兴文艺理论之介绍与推进也颇积极。几月前朱太史之流的昏话，它也曾举起清洗的大帚，及至最近某期刊发表某低能文豪一篇「文坛底新风头」，一种不伦不类的叫喊引起曾艾狄君的反感，也在「槟风」答复一下。

对于一年来的「槟风」，我所知道的是这样，错漏之处，尚希阅者教正。

各报副刊及各刊物一瞥

一九三六年的马来亚文坛，是在剧烈的斗争中开展着，我们且先检阅它的阵容。现在从马来亚北部说起。

檳城光华日报：「槟风」是该报主要副刊，在上文笔者已略介绍了。由于先前它的编者洪丝丝君的努力，该刊颇具蓬勃的朝气，意识也颇前进。自本年春洪君去日留学后，由前任光华报编辑郑绍崖兼编，采稿与编排略有变更，理论与创作并重，极受檳城文艺界之爱护。及至本年秋郑绍崖先生接任该报主编后，编务改由刘洪钟君担任。刘君对文艺颇具兴趣，接编后着重创作之提倡，过后不久又附一「每周文艺」，稿件来源多系该刊经常写作者供给，内容极充实，意识也很前进，且每期常有介绍苏联木刻名作，也为该刊特色之一，最近似乎已经停刊了，那是很可惜的一回事。十二月初「槟风」的编务又改由吴蔚槐君接任，吴君对

理论素有相当修养，今后「槟风」发展的前途当无可限量的。在「每周文艺」出版以前，该报又有一文艺专刊「热流」，为「热流文艺社」主编，田舍郎，实君等主其事，内容颇新颖，出不上几期就停刊了，「每周文艺」于是就出世。

「小天地」也为光华报副刊之一，内容偏重科学常识之介绍，及趣味稿件。但不撒烂污，没有淫靡的姿态，在各趣味副刊中也为特出之一种。

槟城新报：该报年前有副刊「浪花」，内容颇见充实，但可惜寿命很短，出了十几期就停刊了。现在有「新园地」「大千世界」「曙光」以及「学生文艺特刊」等，其中以「新园地」内容略见充实。「大千世界」与「曙光」稿件来源靠剪刀，取材以趣味为中心。「学生文艺特刊」，顾名思义我们就可知道了。至于不久之前停刊的诗词专号，内容极形腐旧，取材着重韵文诗词，描写「送别」「记游」「客中感怀」一类的东西，一种失败主义与逃避现实的呻吟，颇使人摇头的。但在沉沦于封建意识的深渊里的南侨社会，该刊当然能够抓住一小部份读者。

槟城除了光华与槟新两报外，尚有新近创刊之现代日报。该报为一小型日报，没有固定副刊，间或有小品文字散见其中，没有什么可供记述。至于该地有没有其他定期刊物，笔者未详，故从略。但当笔者为文至此，接寄鸿君来信说筹备经年之「现代导报」也迁往槟城出版，创刊号已印出，惟未得谈及，其中详细有待将来另行叙述了。

槟城方面的文艺刊物大略说过了，现在要说到吉隆坡。但一说到吉隆坡，就颇使人慨叹。南侨文化的发展是很困难呢。该坡本有华文报馆两家，一为益群报，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一为中华商报，成立于一九二七年。益群报在一九三五年元月间，因营业关系，突告收盘，闻者咸为南洋文化悼惜，至八月间赖社会热心

文化人士之努力，又重新建立，改组为新益群报，至本年秋间忽又停刊了。吉隆坡遂没有华侨言论机关。因中华商报已早在数年前停刊云。

怡保中华晨报：大众副刊为该报唯一副刊，剪稿与创作兼施，前为李西浪君主编，现在编者为王炎之君，对救亡理论、青年问题都很努力。意识颇前进。

现在要说到新加坡了。宇宙间的一切无时无刻都在变动着，人间世的事物说起来都使人感到「沧桑」，一阵惆怅。新加坡——这片小小文艺园地，一年来也有着很多变更呢。在现存五家华文报中，星中日报年纪最少，看样子倒有点天真活泼，就先从他说起吧。他本来有好多个副刊：文学周刊、文化界、妇女界、儿童、日本研究、南洋通……等周刊和「星海」「星火」两个副刊，到本年春据说为要便利刊载长篇文字计，以上几个周刊被取消了，换做「学园」。「学园」发刊不久也被淘汰，只剩「星火」「星海」两日刊和「星火每周文学」。星火前为傅紫曦君主编，至本年春改胡君荻君主编。傅胡两君，对「星火」都极努力，曾用过重大心力。「星火」的基础可说是他们两先生努力的结果。它最初是以「新写实主义」的姿态出现的，后来胡少吾君担任编辑时也保持着同样态度。现在，编者为胡健人君。

「星海」前系张匡人君主编，刊载有趣味文章，现在是否仍为张君所编则未详。至「星火每周文学」系隶属「星火」的一种周刊，内容以理论为主，闻亦系「星火」编者兼编云。

新国民日报：说到本报，在副刊方面也有重大变更。查本报以前有「文艺」「戏剧世界」「儿童世界」「蕉影」「新野」等，及至郑绍崖先生接任本报主编以后，以上各刊遂尽行废去，另以「新路」与「新天地」两日刊替代，发刊于本年九月十九日，两刊均系笔者主编。前者的姿态是这样的：「当前事实明显地表现着，

世界是这样动乱，光明和黑暗正在作着最后的决斗，人，谁也感到徬徨和苦闷的。这是时代进化的必然现象，用不着诅咒，亦用不着呻吟，诅咒和呻吟都是弱者的表示。

「南洋的文化水准，明显地，是这样地低落，毋庸我们去诡辩，亦毋庸我们去掩饰的，这自有它的内在的原因。然而，世界上的一切进展，都要经过『幼稚』的阶段，文化水准的低落，正是幼稚的现象，实在用不到悲观和失望。只要推进者不断地努力推进，自有冲过幼稚阶段的一天。我们不害怕幼稚，我们所痛恨的是下流与无耻。我们不敢怎样地铺张，我们也不敢向大家预开漂亮的支票，不过希望在我们能力的范围里，尽我们一点忠实的贡献。我们更不想拘牵某个固定的主题，只要有明确的观点，透澈的见解，不论文艺理论、小说、速写、散文、随笔以及讨论诸般社会问题的作品等，都可在这园地里占个地位……。」这是节录笔者在「新路」发刊时的「献词」中的几段。很平凡、没有动人的姿态，亦没标榜神惊鬼号的主义。但在这几个月来，在编辑上遇到的困难的滋味，亦够给人难受的。每天刊出来的三四篇平淡的文章，我们读起来很觉平常无奇，但在编选时，有时几要叫人「绕室徬徨」，一词一字的删改增补，亦要费去相当心血；另一方面，要顾虑到自己刊物的立场，读者的利益，作者的意见。编半版报纸的副刊所受的苦恼，我想未经做过编者的，谁也难以想到的。「新路」发刊到现在，已渡过一季了，「成绩」与「贡献」都摆在读者的面前，这里笔者不想做个历史纪录家，代自己吹牛皮，只望读者、作者都予帮助和合作，有什么意见请写信指教编者，使这小小的一片园地成为大家共有的园地。

「新天地」则注意科学常识和各地风俗人情，创作与剪稿兼施，它的发展也要靠大家来帮忙指教。

星洲日报：「学海」和「晨星」。「学海」系介绍学术的高

级刊物，在当年春已停刊。现在仅存「晨星」。编者为林健庵君。林君对文学方面颇具修养。所作短篇社会什感亦得读者之爱护。他编辑「晨星」的历史很长，取材注重小品文。「文艺周刊」亦为该报副刊之一，编者王哥空君，注重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及作家评传；内容颇充实。此外尚有小副刊「出版界」，为马康人主编，每期虽仅二三千字，内容则颇充实，意识也很前进，共分「文化列车」、「书报介绍」、「新书批评」、「作家评述」、「文化街头」等栏，均甚精警。至于「繁星」，则系剪稿，内容以趣味为中心，编者未详。

总汇新报：前有「文艺半月刊」，现已取消。现在仅有「总汇副刊」与「社会花絮」，皆系剪稿。前者以名人逸事为中心，以及鸳鸯蝴蝶派花月作品，后者则转载桃色新闻，性感强烈。编者未详。

南洋商报：「狮声」，也很不错，现在编者据说是李天游君。此外尚有「晓风」，系剪稿，以趣味为中心，编者未悉。

被誉为马来亚文坛的骨干的副刊，大略有如上述。此外小型期刊，近来突形活跃，先后出版的有「海啸」（据说已停刊）、「大众周报」、「大公周报」、「马来亚月刊」等，在筹备中还有「星岛周报」。查以前本地期刊也曾盛极一时，而相继停刊或暂时停止出版的有「椰风」（文艺专刊）、「新岛周报」、「南洋风」、「新南洋」、「电影与文化」……等，多因种种关系不克久持。现在各热心文化工作者，又重新起而努力，正是南侨文化蓬勃的好现象。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坚毅地与环境搏斗，以期提高南侨的文化。

我们诚恳地在盼候欣赏南侨文化的奇葩。

国防文学及其他

中国国防文学久被提出而迅速地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社会基础和客观紧迫的要求。因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日渐濒于危亡的境地，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民族份子，都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抢救的，文学也自有它应尽的任务，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皆是应这客观环境紧迫的需要而产生的。南洋的文艺界老是响应着中国的文艺运动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后，理论的检讨与推进都曾占过这小小的文艺园圃一席之地。在五月十二日槟风上，德露君一篇「南洋应推行国防文学」，可说是最初向南洋文艺界提供关于国防文学理论的一篇。在这篇文章里，德露君简明地说：

「如果不是文学无用论者，谁也不能否认文学是和敌人抗战当中一件很好的武器。作家手中的笔杆，好象前线武装同志手里的投枪一样，可以用它来进攻，亦可以用它来防卫；因为文学是有一种艺术感染的力量，去扩大巩固自己的阵线，鼓励自己集团内部抗战的精神；同时这种感染的力量，又可使侵略者的民众觉悟到战争当炮灰是为了求一些人的利益，而使敌人内部发生分化作用。

「尤其是在这侵略者疯狂地进攻，民族危机已到空前的紧迫，国难非常严重的时候，民众解放阵线应广泛地加紧，联系团结起来，作集团防卫救亡的英勇斗争。因此更加重了文学的任务——时代付与的伟大艰巨的任务。为要使文学这工具积极地负起完成这任务，配合这新旧过渡的大动乱时代，指示推进救亡运动的高潮，便应动员全体的文学作者，统一在一条战线下工作……

「因此国防文学的被提出讨论，建立和推行，并不是偶然的什么应时文学，而是有它伟大的意义的……。」

在当时国防文学的理论正在着着推行的时候，德露君引用于

必先生的话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国防文学决不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也不是一项偶然的变革。他是超离了商品化的文学与畸形发展的文学底文学常态之回复，从狭的圈子里解放出来，与大众产生密切的关联，以达到文学的感染及指示作用。

「第二，国防文学创作的作者，在实践上必得与大众有相当底瞭解和认识，参加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作品才能充实，大众感到亲切，才能达到指示及影响的作用。

「第三，国防文学不是过去狭义的民族主义文学的重生，它是以浅明而简单的形式写出，以中华大众的立场，发挥它底感染作用，以达到中华民族阵线的巩固。

「第四，国防文学必得采取最通俗而显明的形式，在大众文化灌溉之前，要有渐进的步伐，是逐渐的提高，不是机械的提高或近于强迫的接受。」

南洋的文坛，尤其是马来亚的文坛，是寂寞的，似乎染着什么慢性的病症。「……可怜地现出沉静和寂寞，好象亡国的痛苦不会影响到远在海外的我们……。」它要受国内文学运动的影响而后才会激起些波动，国防文学是这样，「两个口号的讨论」也是这样，新文学，集体创作也是这样。

德露君这篇文字刊出后，至五月廿三日才得到一个反响，黎陞君一篇「南岛写作者与国防文学」，痛惜地说：

『自德露君在「槟风」第一一九期提出了「南洋应推行国防文学」的意见后，乃隔十多天，我们并没有听到有什么回响。虽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武断南岛的写作者太不注意当前的民族危机，然而无可否认的，直到今日为止，南岛有许多写作者笔底下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还是身边琐事，才子佳人式的恋爱题材为多……。』

这样一直下来，关于国防文学的理论尚未有什么具体的讨论。至六月十五日，前渡君在「星火」发表了一篇『国防文学否定论的根源之再检讨』，是响应中国某刊物的，对可怜的『民族主义』派阴险无耻的破坏国防文学，奸污国防文学，都予以无情深刻的剥脱。七月十七日至廿一日，槁风发表掘石君的『从国防文学谈到国防文学的创作』，要算比较具体的一篇：

「……由于民族解放斗争要求一个全民族武装的『国防战争』，因此一个适应的『国防文学』运动就热烈地鼓吹起来，热烈地推行起来。我们知道文学是反映现阶段社会的真实，而且文学当着民族在斗争的时候，它是可以作着斗争的武器，而『国防文学』在目前局面下被提出来，倒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这个应时而生的『国防文学』，从此无疑地顺着中华民族抗敌救亡的运动而开展了，这是中国文学由反帝文学转向更具体的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对国防文学的创作提供很多重要的意见，对中国前进文化工作者的理论也诸多阐发，于初学者给予很多帮助，因文字过长只好从略不录。十月十五日，槁风发表隆君的『关于国防文学』，力主国防文学须绝对大众化，并『须扩充国防文学的内容，国防文学里面少不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意识，否则易流为狭义的复仇主义，黠武主义，和变相的侵略主义。作品中含有这种毒素，不但贻误青年，就是国家的前途，也要受到不良的影响。原来今日之所谓敌人，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压迫者，一方面也即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公敌，所以有人说：『国防运动，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一支』，能够把握住这一点而创作国防文学，方才没有流弊；并且可以有从横的关系方面，发展到纵的方面，而成为正在发展的新兴文学之友军的纵队！……」

隆君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们引了一条实例，这条实例

一切执笔者都有体会的必要：

「去年教师节，我曾和友人原韵，写了一首感怀诗，其词云：『剑气凝虹白，曾磨十万横。青纱连帐隐，黑水旅魂惊。慷慨歌三户，焚沈激众生。黄龙直捣后，痛饮酒同倾』。近日某同事看见了，讶为『大有国防意味，可算是十足道地的国防文学，然而大众能够领略么？这种诗纵然做了千万首，对于大众能够发生影响么？』然而在这里，我们知道，国防文学的创作是有着自由的，并不是要住居在南洋的写作者都要去描写东北义勇军，学生运动，绥东抗战的进行。当然我们更不要曲解了『创作自由』。『文艺言论，彼此自由』这半副对联的意思，和『鸦片落在瘾君子手里是毒，落在医生手里是药』，一样的要从变动不定的事物中，用辩证法来说明的。这句话是对于主张关起大门规定创作条例的作家而发的；是在思想前进意识正确的范围的创作自由，而不是漫无限制的极端放任。倘使不明瞭他的意思，那么看见了反动文字，也可以认为言论自由了。老孟有句经验话：说诗者不可以辞害意。……」

记得当曾艾荻君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一文引起剧烈的笔战时，笔者在『新路』上曾向写作界提供一点意见，主张用国防文学的理论来作文艺运动的主导，颇引起一些朋友的误会，说我跌入『国防』的泥坑了。当时殊觉有苦无处诉，要再写篇解释的文字，又屡因忙而未着笔。因为要解释这个问题，并非千几百字就能说得清楚。现在乘这机会在这里作个简要的提供。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名词，在字面含义上当然比不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来得明显，但在应用上比较来得便当，尤其是在这里，国防文学便于应用，（按『国防』二字用在这里是否会矛盾，笔者在『马来亚文学的正路』一文中曾有详细的解释。）译成英文也是一个普通的名词。至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解释上就

有着很多困难，在应用上更会发生很多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实质』，不是专在名词上用工夫。国防文学虽然有着缺点，但倘推行者解释得明白透彻，提防奸细宵小的混乱黑白，自然不至会叫人跌入『污池』或『泥坑』的。关于这个问题，耶鲁君在十月三十日檠风上发表一篇『怎样在海外开展国防文学运动』，文中有一段可供参考：

「我们的国防文学，必需是抗敌救亡反封建的。但这并不是说，除了义勇军在壮烈的抗斗，大学生运动澎湃的怒潮，群众的示威游行，盛大的纪念会以外，我们的作家绝对没有别方面的题材可以采用。相反的，在被民族敌人全面威胁的祖国，每件大小的事变都可写成抗敌救亡的作品；中国的封建势力向来是与敌人狼狈为奸的，所以不论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我们都可以发见它们那浓重的毒素。作家只要深入现实，便会感到处处是宝藏，样样都值得加以暴露。然而，在这儿，主要的还是这个问题：在海外的我们，当开展国防文学运动时，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已有的理论，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除了公式主义者，谁也不敢作肯定的回答。不错，我们是和中国的弟兄面临着同一命运，应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呼，为他们的挫折而苦痛；可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到底是与他们有点不同的。这正如同一阵营中的伙伴，在农村和在都市工作的，可以有不同的特殊任务一样；国防文学，在其抗敌救亡反封建的总原则下，也可以向我们课以多少不同的特殊任务。只有这样的理解，我们的工作才不致流于空疏，才不致将活生生的行动原则变成可治百病的万应膏。

「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是海外国防文学的特殊任务呢？首先，针对着目前民族统一阵线的要求，我们必须严酷地清除同侨中宗派主义的毒害。敌人如果亡了我们的国家，是否张三可以不做亡国奴，而完全是李四吃的亏？或是林大已经倒霉，而陈三却能自

保？同样，在甲省已经失掉的时候，试问乙省还保得住几时？华北东南和内蒙的快要继东北四省之后走入苦难的地狱，是足够叫一切地域主义者和家族主义者警惕的！因此，对于同侨中这株根深蒂固的毒树，文艺青年有利用种种可能的形式，来形象地加以暴露铲除的必要。在这儿，讽刺和健全的幽默是最有效的表现方式。……」

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意见，突破犯着极端左倾病，被刺在「时代的尖端」者的笼套，把具有积极性的讽刺文学，和国防文学（具有积极的讽刺文学在本质上原是已可称做国防文学之一支流）结合起来。全南洋浑浑噩噩的阿Q正在社会每个角落踟蹰着，他们正需要温热的讽刺文学的药针在他们脑门扎一下，甚至二下以至无数下，直到他们的心房受到热的刺激为止。

南岛的文艺写作者们，正可乘这国防文学的运动，起而扫荡一切无聊下流的以及失败主义的呻吟作品呢。

关于新文字的推行与集体创作的讨论，「槿风」和「星火」都曾有一度努力过，祇是，还没有象荷属棉兰文艺界那么集体实践吧了。槿风上斯奇君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展开」可说是开其先河。关于拉丁化运动，懂得历史进化的都要赞成的，只因客观条件未达致成熟的阶段，运动的进行有着很多困难吧了。四月十七日槿风上面君远君的「谈新文字的拼音」，除新文字的拼音外，对于新文字的理论 and 实践也有很多阐扬，可惜未曾邀得人们的反响。直至五月九日，只有姚寄鸿君提出比较具体的研究方案：「汉字拉丁化入门书」；系根据门外文谈，拉丁化概论，拉丁化课本，拉丁化检字法等书而写的。「星火」对新文字的理论推行也颇努力，可惜也没有得到美满的效果。至于集体创作，除了槿风上姚寄鸿，丝丝谛克等君的理论底推进外，「星火」在当

时也颇努力。

五月廿五日华德君响应『文学』六卷五期的『一个小小提议』的『文坛时评』开其端，提倡组织『读者会』，至六月一日胡姚君赞同这种办法，接着谛克和陈建二君在六月八日也出来提供了很多意见。谛克以为：「通讯组织，应该和集会组织相辅而行。这是对的。不过……只有作者和读者个别的通讯，这显然是不够的。补充的办法，我以为应该由各副刊的编者，每一月或二月划出一些篇幅来发表读者及作者的来信，把他们的意见作为公开的讨论，这样一来，……比较普遍……。」

陈建君的意见则介于两者之间，以为集合组织有很多困难，主张：

「一：读者作者编者应切实地合作，沟通彼此声气。读者对作者作品有批评的义务和权利，作者随时向编者提出意见与要求，编者站在评判地位，接受及评判一切意见，提出具体问题公开讨论。

「二：『读者会』的理论确定成立后，读者对作者应时时予以策励和批判；对某篇作品观感怎样，随时寄信告诉编者，编者如认该信可代表一部份读者意见，（不管前进的或落后的）可把该信公开发表，或直接寄给作者。

「三：读者得有选读文字的权利，随时向编者要求或反对登载某类文字。

「四：编者斟酌情形介绍作者通讯，互相勉励与切磋。

「五：作者与作者间应筑下坚强的合作基础，真诚地互相批判，对文学界的动态和趋势，更要时时检举，讨论，以使读者大众对文化界有深切认识与了解……」

六月十五日姚寄鸿君也赞成这种组织，发表「促进南洋读者会的建立」，对组织『读者会』的需要诸多阐发，并提供几个意

见：

『集体组织，征求的办法分两方面，(一)志同道合的副刊编者，以期普遍推行；(二)读者和作者——这样一来，参加的人数必多，所得的效果必宏。

「关于第二点的『通讯组织』，我的意思，凡是『读者会』一份子的编者，对于作者和读者通讯，无论事务怎样忙碌，都应在一礼拜内直接答复，或间接在他所编的文学专刊内『代邮』栏答复。如系读者托为转寄的信，马上应代为办妥。读者或作者对于某篇文章有意见，尽可用通讯体裁投到副刊去发表，公开地切磋和检讨，编者也应信末参加自己的意见，使读者得以判别谁是谁非。每一个月或三个月内，由编者出题征文」。

现在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已由个别而入于集团了，作为人类争取光明的有力武器的文学，当然也需要有集团的活动，而后才能发生伟大的作用，克尽其所负任务，读者会的组织就含有很多集体行动的质素。人类一切的行动都要在集团领导下才不致会自私，颓烂，而文学作者更需要集团来督促，然后才能跑着正确的途径，而完成自身所负的使命。苏联作家伊凡诺夫在一九三五年巴黎国际作家保护文化同盟会议上说：

「首先，我们的读者是我们的朋友和援助者。苏联作家是经常在和直接参加新建设的大众接触之下生活而且工作的。我们的读者是我们的朋友，同时也是我们极严厉的批评者。和读者来往，是我们最好而且最可宝贵的教育」。

是的，大众的宝贵的教育，是培养文学写作者最重要的资料，「读者会」，正是产生这资料的所自。可惜盛极一时的「读者会」组织问题之讨论，终于成为泡影了。丝丝姚寄鸿，陈建诸君的提倡「马来亚一日」及「南洋的一日」，也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也是很可惜的。以蚊虫扰人见称于世的湄江河畔——暹罗文

坛毕竟能够成功「暹罗的一日」的编制，文艺社蓬勃林立，中华民族的巨人的鲁迅先生之死，也能开盛大追悼会，若拿他来和马来亚文坛比较，真够使马来亚的文艺作者愧煞的。马来亚还没有扰人清梦的蚊虫呢。我们希望马来亚文艺界在不久的将来来个集体运动！

现在该说到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了。关于这论争，马来亚文坛除了阐发了中国前进作家的理论外，似乎还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新路」发刊之初，姚历山君就有一篇很长的介绍文章，介绍「文学界」第三期国防文学特辑。十月廿九日「槟风」上戈克君的「两个口号论争与创作方法问题」，亦根据「文学界」与胡风诸先生的论战为出发点，对以奴隶总管的姿态出现于上海滩头的徐懋庸之流，与「文学界」的「淆乱听闻」颇多抨击。这种「检举」的工作，对落后的马来亚读者是颇多帮助的。归根结底也认为胡风的宗派主义论调带着很多危险性，并认为：「国防文学的创作活动问题，不应死板的受一个确定型的写作方式所拘束，在最大范围的现实活动里，作者是有自由的选择权利的。——当然能采取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好的了——但这是作者整个世界观的活动发展；不能予以生硬之死板的规定的。……」这篇文章主要见地颇可代表好多人的意见。极端派的左倾幼稚病绝对敌视「国防文学」这名词的错误是需要克服的。较长较具体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要算发表在「晨星」的戈壁君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一文。戈壁君参考的刊物较多，所以论列也来得完备一点，对读者有着相当的帮助的。他自己也说：「而在这论争进入于第二个非常严重的阶段的现在，我再来把这个新的形势，作个简单的介绍，应该是那些注意到这问题，然而没有时间读文艺杂志的读者们所乐意的

吧……」。对「文学界」之对「夜莺」和「现实文学」两个特辑的猛烈反攻，与鲁迅，郭沫若，竿有等先生意见的归纳都颇为详尽，可说是介绍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最长的一篇文章。惜未能更进一步，在理论的介绍中和马来亚文艺应跑的路线联系起来。介绍文字若能做到这层，当然更有意义了。十一月三日马达君的「理论以外」，也是响应两个口号的论争的，但却告诉我们一些「理论的斗争」以外的事实，把奴隶总管徐懋庸，为傅东华砍杀周文『山坡上』的『借刀杀人』以及他手下的一群的阴险，卑劣行为，都画出一个轮廓给大家看，亦可算是有意义的一点『余兴』吧。此外，姚寄鸿，谛克等君对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也颇能论列，可说是尽了介绍的任务了。

大概是受了中国文学运动的影响吧，一年以来的马来亚文坛，对『马来亚文学』这一论题讨论得十分起劲，那也可说是一种很好的现象。过去光华日报的『热流』、『每周文艺』、以及『新路』、『晨星』等，有好几篇针对马来亚文学这论题而发的文章。十月三日『每周文艺』南郎君的「南洋文学应以南洋为战野」一文，劈头就说：「以客观的社会环境的突变和要求，在南洋执笔杆儿的作家们，应该是毫无疑问地把南洋文艺鲜明的旗帜竖起来的时候了。……」

作者认定中国和南洋的文艺理论有着很多共通点，主张在「国防」的口号下，写出有战斗的气息的作品来。力生君的「这正是『此时此地』的需要」，主张马来亚文学的写作，应该注重「典型」的刻划，这是很对的。文学是社会阶层意识形态的表露，某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正需要一个「独特」的「典型」去代表这社会群呢。这问题的提出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固有很多重大的意义，但在幼稚地发展着的马来亚文艺界，那是一件艰难的工作，正需要一切写作者去埋头努力。「新路」对马来亚文学这一

论题，也曾有两篇长文发表；一是林曼君的『马来亚文学的正路』。对当前马来亚文学的需要提供很多意见。一是文翔君的『现阶段的马来亚文学』，对过去的马来亚文学先行检讨，认为过去曾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灿烂时期，那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又对当前的文艺运动发挥好多意见。但我们觉得奇怪一点，是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有位自以为文豪的低能文客，悲凉地在『狮声』冷讥了一顿，说过去马来亚文坛并没有现实主义文学存在过。这在表面上看来似很可怜，其实也仅可怜而已，说不到其他的。在「晨星」上，关于马来亚文学也有两篇文章发表。一是保罗君的「马来亚文学试论」，认为马来亚的文化落后，系决定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这观点可说是正确的，但认为用华文写下来的文艺作品，可以暂时称做「华侨文学」，这名词就有着讨论的余地了。好在他自己接着就说：「然而华侨文学是不大会有前途的，她只有踏进了马来亚文学的领域以内才能够长足进展的。……她是沟通各民族的一重障碍，所以她必须去掉这种障碍。要去掉这种障碍，除实际联系外，在文学上推行拉丁化写法的文字是最有效不过的了。据我们所知道的，马来亚各民族如巫人，印人等早已有既成的拉丁化的写法的文字，……所差者只是华人。如今华人也有新文字了，大家努力推行起来，前途自然是远大的。……」作者并要求马来亚文坛和中国的联成一气，『在现阶段，特别要运用马来亚文学来有效地推动华侨的救亡运动，要唤醒其他民族起来援助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但对于提倡「国防文学」者似有一些误解：「我们不必在当地也从国内去搬一块『国防文学』的招牌来挂在马来亚」。

关于这问题，笔者在这里不想多说话，只好让其他朋友去解释。保罗君的「结论」所说的：「目前由各民族的发展到自由久远的马来亚文学」，这点是否有实现可能性，也只好待将来再行

讨论了。其他是十一月二日木鱼君的「关于『马来亚文学』的商榷」，也认为马来亚文学这论题系由中国的影响产生出来的：「由于国内文坛论争着『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而波动及于马来亚文坛的『马来亚文学』与『华侨文学』的争议，可说是盛极一时，但这现象是可看出目前马来亚文学的重要性的……。」但更进一步说：「反战拥护和平，有着它的世界性，马来亚是世界的一个角落，所以，马来亚文学亦应从这一主题来认识！虽然，文学有着它的地方特殊性，但这地方特殊性是有着世界性的共通点，马来亚社会虽是殖民地性质之经济结构的社会，而在这社会的各民族亦是世界一个角落的民族。世界每一角落的民族，安全与灾难，是不能否认与马来亚安全与灾难有着联系。……」这把理论的范围扩大了。但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入继起来讨论，那似乎是很值得惋惜的一回事。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今年的马来亚文坛并不寂寞的，枕戈君的「生活与作品」曾和渔光君展开了一场小笔战。下半年以来，轰动一时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一场大笔战，也称是有意义的一回论争。加入论战的有一礁，马达，黄石，邱家珍，劳先，谛克，杨如等君。初时大家都有一点『意气』的『火种』。但结局大家以诚相见，以劳先君的『原来是一种高度的讽刺』一文作结束。文中对曾君的『自我批判』迅速认错的精神十分钦佩。「让不应有的讽刺，误会，曲解，火气……等长埋在时间的铁塔下，大家睁开双目，正视现实，联络一致，朝着『救亡图存』的目标各尽其力吧。我的『反响』，即止于此。还待大家的指正。」这种坦白的论争态度我们是十分同情的。虽然这次的论争没有产生出什么具体的理论。但对于马来亚文坛的发展却予以很多很好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因「自我批判」间或引起一些「误会」和「火气」之争也是

十分值得的。我们痛恨而惧怕的是低能文客，「节外生枝」乱撒烂污的卑劣行为。经过一次的论争，黑白更加分明，读者大众的视线也不会永远受着蒙骗，而自己的阵容则更加扩展与巩固。

后 记

一年来的马来亚文坛大略有如上述，自然在叙述中间或有错漏的地方，那有待读者的教正的。我们回视这一年的马来亚文坛，虽是没有有什么伟大的作品产生，但也还有林参天君一本『浓烟』在上海出版，算也是差堪告慰的一回事。

历史是不息地前进的，这一年来经了几次的论争，很显然的，这片小小文艺园地也划成两条战线，那正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用不着惊奇和慨叹的。可惜的是，阳光偏照不到满生细菌的低湿的一角，让很多东西在那里蠕动着。但我们相信大海的怒涛终会一天把这污秽的一角洗洁的。我们没有佛家的量度，让蚊虫咬在皮肤上还念着『好生之德』不愿扑毙它们。我们对于歪曲真理者始终要予以无情的抨击的，让人类的同情和真正的友谊筑在争取光明的实践上吧。人类是可理解的，但也有不可理解的。我们只有从真理的斗争中去求取真正的理解。

在这里笔者要连带一说的，这篇文字是在匆忙中络续写成的，在叙述上当然有很多错漏和缺点，在段落的剪接上，也觉得有点不妥的地方。恳希读者谅之。

一九三六年末脱稿。

（载新国民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我的話

汇东君的「怀疑」是有理由的，但我所说的「……大众文学在解释上有着很多困难，在应用上更会发生很多问题，……」是针对我们寄居着的马来亚而发的，并不是否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根本的存在。我在一年来的「马来亚文坛」中也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名词，在字面含义上当然比不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来得明显……」，这几句话拿来和汇东君引用鲁迅先生的话，在原意上也可说是差不多的。我们始终承认，「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瞭性」，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意义上的深刻与明确性；而由于这个缺点，国防文学很容易受「民族主义」的奸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是防卫这种奸污的突击队，两者战斗的目的相同，正可相辅而行的。茅盾先生也说前者不能否定后者，后者也不能否定前者。一个名词的应用，我们当然要顾虑到「应用」的条件和环境。空喊漂亮的口号，固然是很容易，但要想到在实践上遇到的困难。左倾幼稚病的极端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克服的。马来亚有着极端复杂的民族问题，「国防文学」我以为可译作 **National Defence Literature** 或倒置过来多用一 **for** 字。两者都是和平的普通的名词，在原理上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抵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只首四字就带着重大的火药气味，所

谓解释上应用上的困难也尽在这一点。我们既然承认两者可相辅而行合一通用，在这里我也不便多说了。

以上是我答复汇东君的「怀疑」的话。

（新路·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附录〕

读「一九三六年的马来亚文坛」

汇东

润湖君在本报新年刊和发表的「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坛」，对于马来亚各华报副刊及其他文艺刊物之检阅，批判，其眼光之锐利，认识之真确，我们都十分赞同的。

不过，于讨论「国防文学」中有一小节的意思，我却有点怀疑。润湖君说。

「……至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解释上就有着很多困难，在应用上更会发生很多问题……。」

这意思或许是参考郭沫若先生的「蒐苗的检阅」。

可是，我以为不见得，正如鲁迅先生答徐懋庸信中所说：

「……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这是正当的，正确的。……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

总而言之，正如润湖君所说：「我们需要的是实质，不是专在名词上用工夫……」。大家既然目标相同，「国防文学」也好，「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好，什么都好，多一二个名称是不会多余的，冲突的。润湖君的朋友说他「跌入国防的泥坑了」，这正是多余的顾虑了。

鲁迅先生也有说过：「……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也者，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其他如：

(一)丝丝，姚寄鸿，陈建诸君提倡的「马来亚的一日」，我也是十分赞成的。去年没有成功，还希望今年给他成功。真如润湖君所说：「……以蚊虫扰人见称于世的湄江河畔——暹罗文坛，毕竟能够成功『暹罗的一日』的编制，文艺社蓬勃林立，中华民族的巨人鲁迅先生之死，也能开盛大追悼会，若拿来和马来亚文坛比较，真够使马来亚的文艺作者愧煞的。马来亚还没有扰人清梦的蚊虫呢……」。

因为这场运动，就是集体写作试行的初步——合多数人横截描写马来亚各角落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此外还要效上海「大说家座谈会」的好榜样，以坚固集体创作的基础。

(二)新文字运动，真是文人再要紧的工作也没有了。因为别的种种的运动，都多少受到被判死刑而未执行的方块字的拖累，不能得十分普遍，深入，美满的效果。新文字运动，正是基础的运动，比什么运动都要紧，普遍，好效果。新文字运动成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望各华报副刊的编者继续努力，不让荷属棉兰文艺界专美于前。

(三)「读者会」的办法甚好。我还以为无论什么事，施行时，都免不了困难，挫折；但「有志事竟成」，苟能勇敢推行，多少成绩总是有的。望去年的「泡影」就让它去年消逝，今年的新的力量就在今年再生吧！

总之，这许许多多的问题，都非赖当地各华报的副刊的编者推动，各前进文化人共同努力不可。

这样，一九三七年或许有更多更大的成绩出现。
拉杂写来，错误之处定多，希予指正。

（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新路」）



一年來副刊編務檢討

(一) 前語

一年，又是一年了！仿佛正象刚才的事，我们准备度一九三七年的新岁，现在一九三七年已去，一九三八年又来临。时光的流逝，真是给予我们无限的感慨！一年的时光，在整部人类历史中是极端渺小的；在个人的生命史上却是一方叫人惆怅的路碑，标志着我们又走过生活征途的一段。这样一段一段的过去，就是老死的极端。在这样的一段生活征途中，我们替人类、替国家以及社会与自己创造了甚么呢？我们有没有辜负了国家的培养、自己生命的任务？

当前我们活着的是血腥的时代。这时代给予我们的是热泪和愤恨。我们忍受着一切的苦难和耻辱。烘烘的泪洗去了我们的青年人的微笑和青春。但压迫和侮辱却使我们愤怒，燃烧着生命的烈火。于是我们从生活征途获来的是坚强的意志、斗争的毅力。这意志和毅力，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敌人的凌迟。我们于是招集了同样命运的人，联结在一起，结成一条强有力的战线，向着我们共同的敌人进攻。这当中我们又获血腥的经验，增强了我们的愤恨和斗争的意志。但这就是国家给予我们的使命，和自己生命的任务么？我们的斗争打击了我们的敌人，消灭了我们的敌人了

么？我们的敌人又是怎样在那儿设法来杀戮我们？在这新的岁序开始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展开我们的斗争，和凶恶的敌人搏战？

成功不是侥幸可以得来，胜利也非不需代价。我们有的是青春的毅力和沸腾的热血，这毅力和热血正是夺取胜利和成功的利器。我们不怕挫折和失败，我们只怕毅力和热血消逝与冰冷。但我们更要从过去的血的征途中找寻我们的教训。

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但它却给予我们可贵的教训。在这么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从书本上得到的智识只能够作为行动的前导，不能够全般适合和应用的。旧社会之可怕不在它的黑暗，而是在它的弹性。因为它的黑暗是谁也明瞭的了，只有它的弹性最难给人找到进攻的途径。一种新的运动发生的初期，它装聋作哑，没有反应。等到了发展至蓬勃阶段，它就和你妥协了，给你一个小小的存在地位。这对于它好象仅是多添一花样，它的尊严和可憎的面孔一点也没有影响。所以最后的胜利，尚有待于不妥协和不停止之斗争。

我之编副刊，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现在不过一年多。起初我抱着很大的热诚，以为可以借这一个园地，联络一些青年伙伴，干点有用的工作，并以为那是一件轻易的事。但一开手，困难的事情就渐渐来了。编副刊并非一种轻易的工作，联合年青伙伴也非空言所能济事。而在这里且有很多想不到的挫折和丑恶。

直到现在，我深深地相信着，就是将来我也永远自信着，只有险恶的环境，才能锻炼斗争的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怎样也不会给险恶的环境征服。从对险恶环境的斗争中，我们可把一切的缺点改正了。这叫做经验。

（二）从新路到新光

新光的前身「新路」，创刊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停刊

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差一个星期就满一年。在这短暂的生命过程中，它遭受了很多的苦难。这苦难的历史，我相信我们将有可坦白记载的一天。

新路现在算是成为过去了，一经检阅，真是使人感慨万千。当时我们只是希望它能够「尽一点忠实的贡献，我们不害怕幼稚，我们痛恨的是下流与无耻」。但它却在这情形下完结了生命。在它的斗争过程中，其他的我不敢说，「忠实的贡献」这一点，却是完成了几分。它没有戴上高帽子，亦没有用白手套，不怕绅士严酷的裁判，不管卑劣者的侧目，活泼地健壮地向着它既定的路向前进。它虽然「不拘于某个固定的主题，只要有明确的观点，透彻的见解，不论什么体裁的文章，它都容纳」，但在它创刊的初期，它却着重了理论这一方面。在创刊的那一天，除了编者的一篇「献词」和一篇使人「头痛」的散文外，就是慕珍的「文艺三谈」，和姚历山的「文学界第三号的特辑」，都是理论之介绍和讨论。当时正当联合战线诞生的前夜，中国文坛上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正入剧烈的阶段。「文艺家协会」正抬着「国防文学」的高牌，由周洲的「文学界」，洪深沈起予的「光明」，和侯枫的「东方文艺」等刊物作战场，向「中国文艺工作者」强烈进攻。这边却由「夜莺」「文学丛报」「现实文学」等刊物应战。辩论之广泛和激烈，在中国文化史上确是划时代的一场论战。

这激烈的论战的波浪，急速冲击到我们这小小的文学界来，各方引证国内文化人的理论而加以检讨的极多，但多系仅作理论上的介绍，对于本地的特殊环境倒很少论及，于是引起了一般人的不满，惹动了一番很大的辩论。当时国际形态和现在不同，救亡方面并没有象现在这么自由的说话，「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很多人是用几个×号去代替，为着适应这情况，新路就着

重提倡「国防文学」，但绝对没有奚落或轻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表示，而主张把这两个口号统一起来。于是惹出了一点可笑的误会。但那是近视浅狹得很，说「国防文学」是文艺作家协会所喊的口号，而文艺作家协会和中国官场有相当关系，新国民日报是党报，党报的副刊正应该和官场文化阵线接近呢。当日的情形，给予编者很多难堪，但我却还这样的挨下来。

这两个口号的理论，经过了相当时期的论战，大家都认为可以并存，谁也不违背谁。所以另外的一个这里自制的『反封反法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的新提出的口号，就没有人去注意了。这以后，便入于创作的实践时期。

在这时期，我们的工作着重提倡理论之建设和不正确理论之清算。比较完整而可以代表当时「新路」的态度的是，笔者用林曼的笔名发表的「马来亚文学的正路」，共分为二段——

一：文艺批评的建设，我们需要有严肃的态度，冷静锐敏的头脑，正确精湛的理论，和科学解剖能力的批评家，而且是宽宏的，不要用中国文坛的尺度作为衡量这里的文化的尺度。

二：我们需要甚么题材的作品。指出在这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我们不能够有专业的写作者，散漫和幼稚，是不能避免的。只要不是卖弄风骚，不是民族的窃贼，一切追求光明的作品，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话到现在虽说过了一年了，但还可应用的。我们现在还需要这种象慈母提携幼子的批评家。关于清算歪曲理论，当时以第三种人自居的文坛小丑，嚣张地还在作着最后的挣扎，为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的前途，我们不得不用一切力量去进攻它们。这于当时的「联合阵线」的倡议是有多少相触的，所以也就引来一种烦言。但这烦言是多余的，根本误解了联合战线的最高意义。联合战线的「联合」是在于进攻共同的敌人的战斗，并不是取消了一切的战斗，情感地苟安下去。当文翔君的「现阶段

段马来亚文学」及用夏田笔名撰写的「从中国文化界的不平衡发展说到马来亚的报纸副刊」发表后，就引来了难以宽恕的讽刺，这讽刺只经我们小小的回击就宣告死亡了。现在这小小的文艺园地得告渐趋统一，那时大家的劳绩是不小的。

译文方面我们认为有提倡的需要，但在新路却少得可怜，这大概和这里的社会结构有着莫大的关系的。计自创刊到现在，除南行由世界语翻译出来的屠格涅夫几篇作品，及其他几篇由新文字译成汉文的东北奴隶呼声外，比较成形的翻译，仅有流浪译的「一个卖淫的女子」，陈淑译的兆洛特的「帐中絮语」，和笔者译的美国普罗作家MGOLD作的「煤山之夜」。此外则仅有介绍李青崖译的莫泊桑作品和须旅译的高尔基作品，黄莺译的翟列兹诺夫的「我的恩师高尔基」和小骑士译的短诗等而已。这一方面显示这里干翻译的人少。一方面表示我们的翻译者工作不够努力。

翻译的作品，在文化程度低落的区域里，虽然有一部份人看不惯，但那也是灌溉文化园地的肥料，建设艺苑的栋梁，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语汇，增强我们的思想，还能够使我们思考严密。因为我们自己固有的文化，太稀薄太松懈了。我们需要接受外来的培养。所以在将来关于翻译这方面，要请大家帮助提倡和建设。

(三) 杂文

杂文方面，寄鸿君在二月十六日发表的「我们需要的杂文」，系响应郭安君的「主张不无聊，针对敌人进攻，肃清南侨帮派思想」，这主张是很对的。在危急的时代，智识份子的精力应该不要有一点浪费。文人的笔头更不要再替个人写生活起居注，而要在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上去努力。斗争的方式是多样的，只要我们的有一个最高的原则，不论用什么方式，都能够表现我们的力

量。杂文，这斗争的短剑，虽然曾遭受某部份人的奚落，但在文化领域里，它永远放着光辉和锋芒。在急剧变动的现实领域里，它的力量并不下于长篇巨制。在南洋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正需要匕首式的杂文来警醒一般阿Q的迷梦。

其实，南洋各报登载创作的副刊，杂文占七八十巴仙，不着边际的自然有，但坚实的斗争的也很多。技巧熟练姿态强悍的要推老陈（即陈子遗）和马达（太阳，丘康），这两位又有若干不同的地方。老陈近于破坏，马达多系建设。其他常在新路及新光上出现的如黄石、何许、力余、梨青、许静、克鲁、村人、啸平、在干等，以及常在狮声、晨星、星火、槟风，大众副刊与最近创刊的马华日报副刊前哨等写作的诸位，亦是杂文努力的很有希望的写作者。在新路发表的老陈的「一件小事」，太阳的「娱乐的意义」，英英的「药茶」，黄石的「说人情」，何许的「先武装你的头脑」，邓匡君的「说到潮剧」，我以为很合于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在平凡的题目下，展示着刚强的斗争的姿态，用平淡的题材表现了愤怒和英烈的斗争。我认为写杂感文，最要紧的是新的题材，拿社会新的事象来作材料，用精悍活泼的笔调表现我们的情绪。

我认为最适合此时此地的需要，还是要推精练的杂文。所以我们还是向着这方面努力。

（四）小说创作

在芦沟桥战幕未揭开之前，新路颇着重短篇创作，以及速写报告之类。因我们认为登载不平的呼号和生活实感的作品，比较空洞的游记和不着边际的小品来得有意义。有一个时期，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有一篇发表，其中描写教育界形态占大多数，如王汇东的「视学官」、绍汉的「浮世绘」、「榴槤上市」，林声的

「危」等都是反映了南洋教育界的黑暗面，在封建势力统御下的教员们的可怜的痛苦形态。在技巧和意识上虽然免不了「幼稚」的毛病，但在暴露现实这方面却尽了作者的任务。在南洋，因为社会文化水准的关系，能够在副刊上写作的，据调查所得，教育界占百分之八十五，然而反映教育界悲惨形态的小说虽有人写，「教育小说」方面的创作，却少得很。一年余来，据我所知，仅有王汇东的一篇速写「秀芳」，是以新文字教学作背景的，可以勉强算作「教育小说」。这也是这里文艺界之一缺点。不过我们要承认，教育小说很难写得好，在中国写得最成功的，仅有叶圣陶一人。但我们要知道，教育小说在这里也是很需要的，我希望将来有人在这方面多努力点。

有一时期，这儿的副刊，老是跟着中国的杂志跑，当「文学」喊出儿童文学的口号后，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这里也介绍了一点点，但创作却很少。当时有一篇「加东海岸的风」在「星火」上出现，算是应时之花絮。这徒尚空言的缺点，我们也应该克服过来的。在新路上描写儿童生活的作品，字数比较长的是江郎的「马路英雄」，其他如吴谦裕的「野孩子」，和发表于四月三日儿童节特刊上的以今的「孩子们」以及蔡厚道的「孩子们悲痛的苦诉」等，也是属于这一类，题材大多是殖民地儿童悲惨生活，但「马路英雄」是属于讽刺的。翻译的仅有介绍冯夷汉的高尔基的「早晨」，那是一个童话。

和创作小说同一范畴的历史小品，新路上发表的很少。英英的「崔莺莺」是讽刺的。比较有点意识的是呆的「博浪沙」。此外介绍丁楚的「奔」、「当炉」、和芷夫的「王宝川」，都没有什么作用。写历史小品最成功的当然要推鲁迅、沫若、茅盾诸先生，他们的主题都是讽刺的。但现在讽刺的对象和先前的不同了。应该转向讽刺敌人和汉奸贼奴那边去。但在急迫的现在，它

的力量似乎比较小点。因为现在是明枪的搏斗时代，不是应用暗箭周旋的时候了。

关于创作小说的作者和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白荻的「他乡」、「灰色的家」和「山村之一晚」、「母子之间」。他有相当熟练的技巧，丰富的生活实感，但他的笔调近于纤弱的，缺少刚毅的斗争气息，这是他的缺点。

丁香君在「读了『灰色之家』后」说：「朋友，你是变得这么忧鬱，你是深深地陷在悲观的泥潭里了。」是的，他就是这么纤弱，和「忧鬱」。灵根（即以今）的「到天堂里去」、「厄运」、「叔父」等篇大体上是成功的。他的长处是热情的洋溢，和笔调的灵活。由上海寄来的时玳的「打胎医院」、「惨痛的一夜」是散文小说。时玳是位女子，在流浪的生活征途上，造成她强烈的正义感和澎湃的热情，可惜我们得到她的稿子很少。除这两篇以外，仅有一篇散文「饿俘」。

在新路上写短篇创作，技巧比较老练的，东去（即南行）是其中的一个。如「一块大洋」，是描写中国农村破产的悲惨情况，技巧上是达到成功的水准的，但他写散文的技巧高于他写短篇小说，这留在后面再说。字数比较长的是绍蒙的「沉沦」和准盾艺的「憨憨别传」。但这两位都是初学写作的，在技巧上免不了很多缺点。倘再努力，这缺点自有被克服的一天。但在这里笔者要指出，象这两位的新进作者，最大的毛病，是喜欢把作品的字数和文句拉长，致使结构散漫，叙述的系统上重复。这，我们的初学的写作者应该要注意的。最要紧的是一篇创作完成后，重读一遍，精密地考虑，把不需要的文句章节，毫不爱惜地割掉。这方面，象苏联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和很多文艺理论书籍，都讲得很详细了。据我个人的观察，新进作者多是很富于热情的，都有着一颗可爱的殷红的跳动的心。倘能够把自身的生活

经验、亲身经历的事迹写出来，并不会怎样见不得人。如尔特的「阿肥子的难关」，是写一位本地咖啡店头家，年关到了，被债主包围的悲剧。巨星的「卖花声里」（散文小说）是描写本坡牛车水一个卖花少女的遭遇。因为所写的都是熟识的人物，激于正义与热情，而代为呼号，所以达到相当成功了。新学写作的，最容易失败的是：「好高骛远」，描写他们不知道，不曾深切观察的东西，致写得十分离奇古怪，不知所云。象在这里而写东北义勇军，中国学生的救亡，地痞贪官的纵横，很少能够写得成功的。

在新路及新光上，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就是有几位作风笔调很相象，而且极富创作力，很有希望的作者，象林敦与吴谦裕。四月十五日林敦的「两个不同的时代」和七月十三日吴谦裕的「阿三嫂」，笔调和作风上都有很多相象的地方。此外李鸿机、黄慎之、和林声（即阿林），笔调和作风亦极相似，健康与活泼。他们据说都是新进作者，思想健康，写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实在人物。在技巧上，他们皆近于「平铺直叙」。但长处也就在这一点。新进作者最危险的是爱学「老作家」的古怪笔调和用语，有时写出来，恐怕连自己也许莫明其好处。所以我认为初学写作的，应该朝向「平铺直叙」这条康庄大道走去。他们这三位中值得一提的作品，林声最成功的要推「新客」、「残」、和上面说过的「危」等。黄慎之的是「李德盛」、「疯妇」和「火山」。其中尤以「火山」在意识和技巧上更完美，描写一位新时代的青年，为追求未来的光明与幸福而出亡，象「火山」似的爆发了。李鸿机的「梦醒以后」、「夜」、「瓷瓶里的玫瑰」、「退进山芭里」、「断绝了的友情」，和最近的「奸商的作风」等篇，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但在一个新进作者却是可喜的收获。她是一个女子，因生活和环境的关系，在题材上免不了公式化，这

又是她的缺点。

在芦沟桥血战以前，我们的斗争方式，是近于「暗箭」的，缩在某一角落里架起枪，瞄准我们的敌人，挂上桥把弹子发射过去。到了芦沟桥血战开展以及上海大战和现在的全面抗战，我们的战斗，已一步一步入于「明枪」，以堂堂旗鼓向我们的敌人进攻了。这在新路以至新光就换了一副新的战斗姿态。八月六日七日炼晶的「祖国的消息」，用报告的方式报导了海外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听到了抗战的消息以后的欢踊和希冀：「前线的战士们！愿你们将华侨的愿望收下吧！……努力向前，不要后退，奋勇杀敌，收复失地……我们海外千万的华侨，愿为你们的后盾。战吧，不要动摇，放心战吧！」「丢那妈！系个汉奸……张自忠，忠什么来，卖国贼，这名改做张自奸倒是合适！」这种呼声，正是千万不愿沦为奴隶的海外华人的呼声。文艺作者，创作的活动应该和现实配合起来，才不会浪费与落空，才能发挥紧密的策动力量，这新的发展的姿态是颇为可喜的。八月九日寄鸿的「现阶段写作者的任务」和十日凡人的「南侨文化界的责任」就要求把笔尖「反映民族危机，鼓动侨众对民族革命战争的情绪」。抗敌战争一天一天的剧烈，我们这里的文化思想也一天一天的扩展。九月三日六日吴谦裕的「太平洋底故事」，是描摹敌人国内的悲惨情形和反战情绪，虽然近于假想，但技巧上却很成功。这里的文艺作者就是这样渐渐明朗地向敌人进攻了。九月三日辉晨的「买布」已跨上抵制仇货的阶段。十三日许静的「捐」是一个速写，把山芭里劳动群众爱国的热情报导给我们。

抵制仇货和捐款援助抗战，原是海外华人救亡主要任务。但说到捐款，又使我们感觉一阵痛心与愤恨，新路就曾因鼓励捐款，惹动了一场风波。但这正是我们的历史，历史永远存留在人间，我们还是朝向进攻汉奸和鼓励捐款这一方面努力。木公的「韩

水头家」，阿林的「日本货商」，秋朦的「商人日记」，华光的「检查仇货记」，村人的「奸商」，啸平的「失火」，以及林潮水的「扩大抵制日货运动」，「奸商的秘密」，十二月十一日钱棍的「其肉可食」，笑萍的「乌油之外」等七首式短文，都是真枪实弹向无耻贼奴进攻。此外象梨青的「扑灭汉奸」、小丹的「关于汉奸」，虽然是短文，但对于奸商也是一把利剑。据我领略到的经验，副刊上最有力量是这类刻划汉奸的丑脸，揭发日本帝国走狗无耻行为的文章。它们常能够有反响，就是显示出其力量。至少给予这班人面东西一记闷棍，叫他们知道人间尚有正义之存在。

(五) 散文与诗

散文方面，从新路到新光，已有相当的收获，而且有几位很有希望的作者。张曙生、锺斯末、呢喃、尼嘉，绍蒙和绍汉也很合于写散文的，只要能够努力。我以为，写散文要有熟练的技巧，清新俊丽的文词，悲郁的情绪，或澎湃的热情。在这几位中张曙生是近于悲鬱的，象「琴的回忆」，「车」，「山芭里」，都有着一一种被抛弃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和忧鬱。锺斯末，据他写信给编者说他是个初学写作的人，但他写散文的技巧很熟练，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作者。他有着澎湃的热情，象九月二日的「祖国底怀念」，廿二日的「广漠的原野上」，廿三日的「彩票」，十一月一日的「山芭底火烟」，在南洋都可以算是成功的作品。他的笔调和作风很象老陈，他的诗也写得不错，若再努力，前途有着无限的光辉，可以算是我们的收获。意识和技巧都达到相当水准的有：白苹洲的「秋的怀念」，欧阳寒吟的「池塘」，东去的「关老师」，「五月」，陈如旧的「我怀念着婆罗洲的原野」，「梦境的破灭」，华尼的「窗前默语」、「窗前忆语」、「窗前诉

语」、「红」、「绿」，南行（即东去）的「忆砂陇村」，时玳的「饿俘」，野风的「祖国的天野」，曾艾荻的「散文二章」，沙田的「梦一般的三年」，张曙生的「这一夜」，和上面介绍的几篇。八月九日欧阳必克，即田舍郎的「某二夜」，亦是值得一提的作品。虽然是那么短短的成千字，但在这中间，却替在狂风暴雨下殖民地讨活的人们，划下一个历史的轮廓。

踵武的散文，象八月十日的「色情线」，笔调很轻飘俊丽，但纤弱，爱用艰深字眼，这是他的缺点。我们希望他，在抗战的烽火中健全起来，把缺点克服过来。

诗的方面，不但新路和新光，全南洋的副刊，诗作园地都是很荒芜，花卉仅是偶尔的出现着几朵，这有待于我们的诗作者的努力开垦的。但我们要指出，新学写作的小毛病，是误认诗容易写，所以爱写。据我个人的经验，每十篇稿子中，平均有三四篇是诗，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不良倾向。

新路和新光上，小小的收获亦是有的。东去的「食风处」，是写南洋头家的外契的，取材和技巧，都很适合这里的需要。呢喃的「静静的星洲河」，萧丽的「巴生河」，张曙生的「异国望风」、「赶市」、「火阳下生活的人们」、「怀吾乡」，都是采取本地风光人物为题材；那是很对的。这儿正是一个诗材丰富的处女地，要发展这里的诗，也只有从这一方面去努力。

此外六月廿六日，白琳与杨荣合作的「修道女」，开了集体诗作的先河，很值得珍惜的。

抗战爆发后，我们的诗作者的笔尖，朝向进攻敌人和鼓励抗敌那面去。张曙生的「摇动吧，你的笔尖」，颜锐华的「中日之战」，呢喃的「给在逃的人们」，白天的「我们的觉醒」，旋风的「抢救我们的祖国」；炼晶的「把敌寇滚出边疆」，黄慎之的「民族进行曲」，隐怜的「我要回去」；潜流的「保卫我们的华

南」；谦裕的「给」，田夫的「勤捐曲」，小丹的「归去啊乡亲」，郭一冰的「打倒皇军」等，都是以抗战为主题。

是的，我们的诗人，正要从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烟中长大的！

(六) 书评

新路创刊之初。我们很想在书评方面出点力，以帮助落后的大众。但这方面的工作，因有种种的关系，我们做得很少，除了寄鸿亦克和编者自己介绍外，很少外来的投稿。但这中间很多还是刊物之推荐，算不上书评。比较有系统点是二月五日亦克评「鸛鹭湖的忧鬱」，四月十九日寄鸿的「王萍草的牧女」，和七月八日陈狗的「不祥的」，这些也是文艺时评。完整和周密的分析书评，我们完全没有做到，这是很值得惭愧的一回事。

(七) 剧本

这方面我们得到的收获，仅有三月十三日北望的「出嫁」独幕剧；六月三日张曙生的「黄昏」独幕剧，七月九——十四日爱青的「神像」集体创作；十一月十四日——廿一日黄石的「觉悟」。「出嫁」描写的是封建剥削制度，富翁抢夺小家碧玉的野蛮行动；题材似嫌旧一点，技巧方面亦有很多缺点。「黄昏」，是以本地社会生活为题材，描写一由中国杀敌受伤归来的人，有点救亡的意识；但有些勉强。「神像」和「觉悟」，完全是以抗战为主题；「神像」；是描绘本地封建家庭之思想冲突，这种取材是很值得提倡的；「觉悟」；是以肃清汉奸为目的，在霹雳方面曾经上演。

戏剧最重要的是实践演出，我希望努力编写剧本的朋友注意到这一问题。在抗战剧烈的现在，戏剧所负的责任是十分重要的，最近南岛话剧运动的崛起，且有很多珍贵的收获，戏剧的前

途一定很光明的。

(八) 今后的态度

「新光」今后的编辑方针和态度，在这里也顺便作个简略宣布。

我们明瞭人类历史的必然进展，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新生，最后定是我们胜利，所以我们反对一切动摇和妥协。

因此我们要抨击妥协和的歪曲言论，尤其是日本帝国和法西斯的国际特种奸细，托洛斯基极端派的烟幕和言论，我们更要尽一切能力去肃清。

海外华人的救亡主要任务是出钱援助政府抗战，作经济绝交运动紧制敌人的死命，所以今后我们还要乘着过去的精神，鼓励捐款，无情地进攻汉奸以及揭发替敌人作走狗，贩卖仇货的无耻贼奴。

中国只有在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层的一致团结之下，才能击退当前凶暴的敌人；夺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永远拥护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左右倾言论，反对「清算主义」清算旧账，挑拨政府与民众感情；所以我们要肃清一切包着糖衣的清算主义的近视浅薄言论。取稿方面，我们暂时不接受长篇，或三千字以上的大著，但打击汉奸理论阴谋者除外。在现实剧烈变动的危急的现在，我们要求有精悍的匕首式的短文，象啸平的街头杂写，和阿林的街头杂记，以及速写与报告，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作品。

我们不摆架子，不怕绅士侧目，壮健地活泼地昂首进前，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尽我们应负担的任务。

一九三七，除夕之前

(载一九三八年「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



published & printed
in Singapore

\$5.50